学者小品经典

邹韬奋

中国人的责任



主编：季羡林

学者小品经典

（第一辑）

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著
人间词话　王国维著
民治起点　蔡元培著
人生真义　陈独秀著
真正的解放　李大钊著
容忍与自由　胡　适著
中国人的责任　邹韬奋著
湖楼小撷　俞平伯著

主　编：季羡林





邹韬奋

中国人的责任

主　　编：季羡林
执行主编：傅光明
编　　者：唐文一

新世纪出版社



学者小品经典(第一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4印张　1,300,000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405—1815—4/I·218
定价(全八册):76.80元　本册:9.60元

阅读大师经典，普及精英文化

——编者的话

从世纪初的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之等学术大师，一直到虽已耄耋之年，可仍在学苑耕耘的费孝通、季羡林、王朝闻等学界泰斗，对我们年轻后学来说，他们的功业和奉献，他们的人品和文品，都已臻至极境。他们是支撑着20世纪中国的“脊梁”，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然而，也许是“曲高和寡”吧，大师们的道德文章并不为一般读者所知晓。为此，我们选择大师们的小品文作为中介，以期在学术大师和一般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之能进行精神的对话和交流，力图使“精英文化”走下“神坛”（学术圈），为全民素质的提高聊尽绵薄之力。

那么，什么是“小品”呢？我们这里的“小品”是

个内容宽泛、边界模糊的概念，大致包括散文、杂文、随笔乃至篇幅不大，却写得轻松活泼的学术文章。我们觉得，体裁的划分是人为的，因此这套《学者小品经典》不拘体裁，只要是形制短小、生动有趣的文字，都在我们称之的"小品"之列。

概而言之，本丛书所收"小品"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学者散文。"学者"本来各有专攻的领域，但有时也跳出专业的"小天地"来写写轻松的谓之"散文"的文字。学者散文凭借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即便是写身边烦事、花鸟虫鱼，也会旁征博引，写得别具一格。(二)学术随笔。指的是学者们在其专业范围内所写的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短文。例如胡风的文艺随笔，宗白华的美学随笔，就是学术随笔的典范。这些大师级的学者用生花之笔在其专业范围之内驰骋，更是厚积薄发，左右逢源，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应该说，这类文章最耐读，最具可读性，常常是读者最为受益的文字。

总之，《学者小品经典》的最大特色是：大手笔，小文章。这里探讨的也许是深邃的哲理，但大师们举重若轻，把看似高深的东西阐述得妇孺皆知，这正是大师手笔。读着这些朴实、亲切的文字，会在无形中丰富你的学识，提升你的品位，达到一个新的精神高度。

目　录



前言 …………………………………………………………………唐文一

课外阅读 ……………………………………………………………1

写作的尝试 …………………………………………………………4

初出茅庐 ……………………………………………………………7

外国文和外国教师 …………………………………………………11

几个原则 ……………………………………………………………14

我们的“家长”

——沈钧儒先生 ……………………………………………………17

“难兄难弟”的一个

——章乃器先生 ……………………………………………………22

"难兄难弟"的又一个
——李公朴先生 ……25
"难兄难弟"的又一个
——沙千里先生 ……28
"难兄难弟"的又一个
——王造时博士 ……31
一个"难妹"
——史良 ……34
"生活"在抗战期间贡献了什么? ……38

无所不专的专家 ……41
道听途说 ……44
自觉与自贱 ……46
能与为 ……48
呆气 ……51
冯玉祥与缎鞋 ……54
硬吞香蕉皮 ……56
三层奴隶 ……58
滑稽剧中的惨痛教训 ……60
废话 ……63
国事紧张中的言论自由 ……65
群 ……67
国际闻名的黄柳霜 ……70
领导权 ……72
糟蹋 ……75
个人的美德 ……78
"生活日报"创刊词 ……81

大赦政治犯的基本认识 …………………………83
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 …………………………85
简易文字与大众文化 …………………………88
民众歌咏会前途无量 …………………………90
悼世界文豪高尔基 …………………………92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94
从现实做出发点 …………………………97
地位 …………………………100
苦闷与认识 …………………………103
从心坎里 …………………………105
青衣行酒 …………………………107
人圈 …………………………109
中国人的责任 …………………………111
轰炸南京 …………………………113
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 …………………………115
惨痛的牺牲 …………………………117
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 …………………………119

贞操 …………………………122
凶悍泼辣 …………………………127
戏问 …………………………132
期望 …………………………136
学生救亡运动的缺点 …………………………141
几个疑问 …………………………146
谋生与屈辱 …………………………151
热血沸腾的时候 …………………………155
自己不做人家做了又嫉妒 …………………………158

兴奋与苦闷 ……161
职业妇女的苦痛 ……165

离意大利后的杂感 ……171
出了世界公园 ……176
巴黎的特征 ……180
瑕瑜互见的法国 ……184
操纵于资产集团的巴黎报界 ……188
纸上自由 ……192
游比杂谈之一 ……196
游比杂谈之二 ……202
所谓领袖政治 ……208
工资、工作时间和生产力 ……213
谒列宁墓 ……217
言论自由的问题 ……221
从伦敦到纽约 ……225
再经华盛顿回到纽 ……233

前　言

邹韬奋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同时他还是一位学识赅博的学者，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为后人留下了百万多字的精神食粮，影响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青年。

韬奋先生的文章，无论是政论、杂谈，还是随笔、游记，多是精辟生动，言简意赅的短文。他有一条方针："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的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他的政论文章，并非是在那泛泛的空谈理论，漫无边际的瞎侃。而是抓住有意义的事实，有的放矢，加以深入的分析，用简短具有说服力的文字，阐述问题的实质，并指出发展的前途，观点非常鲜明。如对于政权和武装问题，他在《劲儿多好》一文中，极简明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除非把政权

和武力放在民众手中，或放在确能为民众奋斗的集团手中，绝对没有其他便宜的道路走。”三十年代中，韬奋先生在考察西欧及苏联等国后，写了许多文章，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分析了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指出中国应该走苏联的路，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不能依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应以苏联为盟友。韬奋先生的随笔写得更是洒脱自如，生动活泼，充满了文采。比如描写阅读课外书受益时，他是这样写的：“我所看的书……看过了就好像和它分手，彼此好像都忘掉，但是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只要用得着任何文句或故事，它竟会突然出现于我的脑际，效驰驱于我的腕下。”读者读来，自然会引起联想，一点也不觉得乏味。这就是韬奋先生质朴的文风。

从文章中，还可以看到韬奋先生求实和平易近人的为人品德。他本着求实的态度治学，一丝不苟，没有半点虚假。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为了拉拢他，两次派高级官员与他谈判，他非常坦然地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不为国民党的威胁和利诱而放弃自己的主张。韬奋先生在写文章之前，总要虚心征求朋友们的意见，然后要看大量的参考书，才动笔。在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由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说过：“作者自己和自己作前后的比较，自觉思想上的方向日趋坚定，读者于前后各文中或亦可看出一二。”他的思想完全是向读者敞开的。一旦认定了正确的观点，便会再而三地撰文阐述，使其日臻完善。他始终关注着民众的喜怒哀乐，在办《生活周刊》中，开辟了“信箱”专栏，针对读者来信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逐篇的作耐心细致的解答，为民众排忧解难。他从不摆出一贯正确的样子，不投机取巧要花招蒙骗读者，而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与其共

同探讨，与他们交朋友。所以“信箱”专栏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本书力图从各个角度精选韬奋先生的文章，向读者介绍他的人品和文品。然而水平与时间的局限，未能如愿，敬请读者海涵。

编　者

1998年9月

课外阅读

常有青年朋友写信问起写作的秘诀,其实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新闻记者,写的不过是平凡的新闻记者所写的很平凡的东西,说不上什么作家,所以对于这种问句,很感到惭愧。不过就我很平凡的一点经验说,觉得在初学方面最重要的不外两点:一是写的技术,二是写的内容。简单说起来,所谓写的技术,是能够写得出自己所要说的话,也就是能够达意。所谓写的内容是有话说,也就是有什么意思或意见要说出来。

我上次和诸君谈过在小学和中学里得到良师教授国文的情形。但教师尽管教得好,实际的领略和运用,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去干,从干的当中得到要诀。这好像游泳一样,只是听了算数是无用的,必须钻到水里去游泳,才有所得。我

当时在学校里所学的国文还是文言文，读的是古文。只靠教师在课堂上教的几篇是不够的，所以对于什么“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所谓八大家的各个专集（尤其是“韩昌黎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全集”以及“明儒学案”等等，在课外都完全看了一下。觉得其中特别为自己所喜欢的，便在题目上做个记号，再看第二次；尤其喜欢的再看第三次；最最喜欢的，一遇着可以偷闲的时候，就常常看。此外如“新民丛报”，梁任公和汪精卫笔战的文字，在当时也是我看得津津有味的东西。还有一部书也是我在当时很喜欢看的，说来很奇特，是所谓“三名臣书牍”，共有四册，是曾涤生、胡林翼和曾纪泽的奏折和信札。我却不是崇拜什么“名臣”，只觉得这里面的文字都很精悍通达，对于他们处理事务的精明强干，尤其是物色人材和运用人材方面，感到很深的兴趣。据说他们的这些文字不一定是完全自己写的，有好些是当时幕府中的能手代做的。我有一天在旧书摊上无意中碰到这部旧书，偶然翻看了几页，觉得越看越有趣，便把它买回来，居然在我的书堆里面占了很“得宠”的位置。

当然，这是当时研究文言文做了的一点点工夫，现在注意的是白话文，研究的人不一定要走这条路，而且时代也更前进了，内容方面相去也更远。所以我和诸君随便谈到这里，并不是要开什么书目供参考，只是表示我们在初学的时候，要想增进自己的写的技术，便要注意多看自己所喜欢看的书。

我当时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我所看的书，当然不能都背诵得出的，看过了就好像和它分手，彼此好像都忘掉，但是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只要用得着任何文句或故事，它竟会突然出现于我的脑际，效驰驱于我的腕下。我所以觉

得奇怪的是:我用不着它的时候,它在我脑子里毫无影踪,一到用得着它的时候,它好像自己就跑了出来。我后来读到了心理学,觉得这大概就是所谓潜意识的作用吧。无论如何,我在当时自己暗中发现了这个事实,对于课外的阅读格外感觉到兴奋,因为我知道不是白读白看的,知道这在事实上的确是有益于我的写的技术的。

我觉得我们在阅读里既有着这样潜意识的作用,对于所选择的书籍的文字(这仅就写的技术方面说,内容当然也很重要),要特别注意。例如有些文字,尤其是所谓直译的文字,写得佶屈聱牙,几十个字一停的长句,看得多了,也要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一个人的写作的技术,写出来的东西也使人看了不懂,或似懂非懂,使人感觉头痛!

当然,看书有人指导是可以省却许多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的耗费。现在的青年在这方面已有比较的便利,因为有好些杂志对于读书指导都是很热诚的。我在当时却是自己在暗中摸索着,但是我自己却也有一点选择的"策略",虽简单得可笑,但在当时确受到不少的好处。我每到书店或旧书摊上去东张西望着,看到书目引我注意时,先在那里看它几页,称心才买,否则就要和它永诀。有些所谓作家,你虽然东看到他的大名,西也看到他的大名,但是也许买到他的大作来看看,却不免感觉到硬着头皮看下去也看不懂,或是味同嚼蜡,看着就想睡觉!

写作的尝试

在国文课上作文，当然也可以说是写作的尝试，但是我在这里指的却是发表或投稿的文字。

我读到中学初年级，几个月后就陷入了经济的绝境。我知道家里已绝对没有办法，只有自己挣扎，在挣扎中想起投稿也许不无小补。但是不知道可以投到哪里去。有一天偶然在学校的阅报室里看到“申报”的“自由谈”登着请领稿费的启事，才打定主意写点东西去试试看。那时的“自由谈”是由冷血先生主编，他自己每天在那上面做一篇短评，其余的文字大概都是靠投稿。

但是我有什么可以写呢？的确踌躇了好些时候。我上次不是和诸君谈过吗？我觉得写作在初学方面最重要的不外两点：一是写的技术，二是写的内容。这两点虽同是不可少

的,但是第二点似乎比第一点还要重要。我这时在写作技术方面比较地有一些把握,但是因为经验的薄弱,观察的不深刻,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可写。于是我想个办法,到图书馆里去看几种英文的杂志,选择一些东西。这选择并不是什么长篇大文,只是几百字的短篇的材料,例如体育杂志、科学杂志等等里面的零星的材料,大讲其健康或卫生的方法,以及科学上形形色色的有趣的发明。这种材料在当时的"自由谈"是可以适用的,可是试了几次总是失败,好像石沉大海,无影无踪。但是我可以勉强抽出时间来的时候,还是试试看。有一天翻开报纸来,居然看见自己的文字登了出来,最初一刹那间好像还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看着题目下的署名,的的确确一毫不差的是"谷僧"两字(这是当时随便取的笔名)!这样陆陆续续地发表了好几篇,到月底结算稿费的时候,报上那个请取稿费的启事里,当然缺不了我的份!我便和我的弟弟同到棋盘街一个刻图章的小摊上去刻了一个,拿到申报馆去伸手拿钱。心里一直狐疑着,不知到底能够拿到多少。不料一拿就拿了六块亮晶晶的大洋!如计算起来,一千字至多不过一块钱,但是我在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样计算过,只觉得喜出望外。我的弟弟比我年龄更小,看见好像无缘无故地柜台上的人悄悄地付出几块大洋钱,也笑嘻嘻地很天真地替我高兴。我们两个人连奔带跳地出了申报馆,一直奔回徐家汇。这在我当时买一枝笔买一块墨都须打算打算的时候,当然不无小补。但是钱到了手,却也就学了一点坏!回校的途中经过了一个卖彩票的店铺门口,和弟弟两个人商量一会,居然土头土脑地下决心掏出一块大洋买了一张彩票,后来这张彩票的结果和我最初若干次的投稿有着同样的命运!

不久我又发现了一个投稿的新园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记得当时在这个杂志里投稿最多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杨贤江，当时他还在师范学校求学；一个是萧公权，他的底细我不知道，由他文字里看出他似乎是四川人；一个便是我。我的文字虽常常也被采登，但我自己知道都不及他们两位的好，因此愈益勉力求进步，好像暗中和他们比赛似的。在这个杂志里所投的稿不像在“自由谈”上的只有数百字，一来就是几千字了。所写的内容，大概偏于学生修养方面的居多，这是我在当时的学生群中观察得来的材料(当时南洋公学的学生有千余人，这学生群还不算小)，比以前译述健康方法和科学小品的内容又有不同，在组织材料和构思方面比较地多得一点训练。我从这里又得到一个教训，就是我们要写自己所知道得最清楚的事情，尤其是实践或经验中感到最深刻印象的事情。

但是我在“学生杂志”里投稿也不是完全顺利的，总是去了好几篇才登出一篇。登了一篇之后，好像替我打了一个强心针，再陆续写几篇去，登后再等着多少时候。关于好多没有采登的稿子，我当时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应该埋怨编辑先生，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稿子并不是篇篇都好。我当时虽一点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职业是编辑，但是说来奇怪，对于做编辑的苦衷，似乎已经了解。

初出茅庐

我是在一九二一年毕业于约翰的。向例在行毕业礼的那一天，各同学都一律要穿西装，要罩上宽袍大袖的学士礼服，戴上方帽子。这在富家的子弟，到了这一天，当然可以出钱特制很讲究的西装和礼服，在我这穷学生，却又是一个问题了。学士礼服和方帽子是可以租的，这倒有法可想。关于西装，因为常有西装裁缝到寄宿舍里来兜生意，尤其是在将行毕业礼的前几天。我便和其中一个商量，要暂时赊账，等两三个月以后才付钱。他答应了，我这个问题才解决。

到了行毕业礼的那一天，各同学的家属，老的幼的，男的女的，都跑来凑热闹。他们当然都是笑嘻嘻的、很快乐的。各同学先在草场上列成双人队，由校长和各教授引导着，鱼贯缓步进大礼堂，各家属和来宾们拥挤地围着大鼓其掌。我

此时夹在队伍中，的确引起了异样的情感——与其说是胜利的感觉，不如说是伤感的意味居多。我的大家族住在北平，自己还未结婚，没有什么娇妻，也没有什么爱人，来分受我在这刹那间的情绪上的反应。所以我很觉得好像是个孤零零的孤儿夹在怪热闹的环境中，想到平日的苦忙，想到平日的奔波，想到平日筹措学费的艰辛，想到这一天所剩下来的是三四百元的债务和身上穿着的赊账的西装！这种种零零碎碎的毫无系统的念头，像闪电似的在脑际掠过去，竟使我在那刹那间"生惕门陀"(Sentimental)起来了，眼眶里涌上了热泪——莫名其妙的热泪。但在前后左右都充满着喜容和笑声，独有一个人掉泪，似乎是怪难为情的，所以立刻装做笑容，把那涌上来的热泪抑制着向里流。

大学教育算是告了一个结束。虽然在求学的工具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方面，还只是建立了一个基础，但是学校却不得不离开了。离开了学校，当然要注意到职业界这方面来。

同级的各同学在将毕业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将来职业就已开始打算(其中虽有极少数已决定毕业后到美国去留学)。我本是要想入新闻界的，但是一时得不到什么机会，以前"走曲线"求学，现在又不得不"走曲线"就业了。我说"就业"而不说"求业"，因为在毕业前的一两个月，毕云程先生就对我说，穆藕初先生要请一位英文秘书，问我就不就。当时穆先生正在办厚生纱厂，不久以前正出了五万元资送五个北大学生出国留学，这件慨捐巨款乐育人材的事情，使我对他颇有着好感，便答应了下来。

到厚生纱厂办事没有几天工夫，穆先生创办上海纱布交易所，他自己任理事长，把我调到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其实纱布交易所里面关于英文的信件很少，每天只翻译

几页关于纱市的英文电讯,内容只是数目字的变异,格式都是很呆板的。每月薪水倒有一百二十元,这在我这样初毕业于学校的小子,已不能算少,虽则当时交易所林立,生意兴隆,薪水比任何机关都大,我这样的薪水在比较上仍是很平常的。我倒不嫌薪水小,却觉得我的工作不合于我的爱好。诚然,我也知道初出就业,不能苛求,只得一步一步地干去;也明知重大的责任要从比较小的责任开始。我的不喜欢,不是因为事情的机械,或是事情的小。我后来办理出版业的时候,任何机械的事情或是任何小事情,我都干得津津有味。我只觉得一天那样翻译着几张纱市的电讯,没有什么意义,尤其觉得这是用不着一个什么英文秘书来办的事情。空闲的时候太多,也是使我觉得不安的一件事。

在精神上虽有这样的烦闷,但是因为一方面还没有较适宜的机会,一方面又急于要归还所借的学费,只得打定主意拖下去。

在这样的烦闷的环境中,如果说还有一些愉快的事情,那要算是认识了一位好友余天栋先生。他是东南大学商科毕业的一个英俊焕发、至诚感人的有为青年,这时他在担任纱布交易所的会计科科长,在该所是比较重要的职务。我以前并不认识他,到交易所的第一天,在成立会的会场上遇着,经穆先生介绍后,他那样的和蔼、殷勤、豪爽的态度和待我的恳挚亲切,就已使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值得敬爱的好友。我是一个爽快的人,他也是一个爽快的人。我每遇着我所敬爱而知心的人,就喜欢披肝沥胆地畅谈;他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遇着则已,一遇着了,总是一谈几小时。他为人整洁、敦厚、聪明、正直,而又很富于幽默。在星期日,我们常在一起,每每一谈就谈了半天。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大雨中穿着

雨衣，在四川路一带走着，上面虽有倾盆大雨淋着，我们还是谈笑自若，边走边谈，愈谈愈有味。

我那时因为急于归还学费，每次领薪水的时候，留下自用的钱总是很少的，到了月底，往往只剩几角钱，窘迫得可笑。他的薪水赚得比我多，到了这种时候，他往往自动地一定要把五块钱的钞票塞在我的衣袋里，强要借给我用。

我离开纱布交易所之后，他还在那里做他的会计科科长，一时失却了我，使他感到懊丧万状。后来我们虽因各人都忙，不能常聚，一聚还是畅谈几小时。当我筹备结婚的时候，他也离开了纱布交易所，正在打算赴美再求深造，同时在做标金生意，想多弄得几个钱带出去。他知道我婚费还有问题，慨然代出二百元凑在他一起做一次标金生意，不料运道不好，完全蚀光。他又慨然说，我的费用来源不易，一定不要我还这二百元，所蚀的由他负责付出。虽然我再三婉却，他还是不许。他对于朋友的慷慨义侠，往往如此。

他还未赴美，忽于一个夏天患时疫，上午还是活泼泼的，下午就死在时疫医院里。我知道了好像听到晴天霹雳，泪如泉涌，急奔到尸前大哭一场，已不能和他再谈一句话了。失却了这样的一个好友，实在是我生平的一大损失。

外国文和外国教师

教外国文的教师，最理想的当然是外国人。例如教法文请法国人，教英文请英国人或美国人（英国人的英文和美国人的英文也有差异，尤其是口头语，虽则它们是彼此看得懂、听得懂的）。这倒不是我要盲目地崇拜外国人，却有我的理由。

试以英文为例。学习英文者所学的技能不外三种：说、看、写。教英文的人所应该教好的也是说、看、写。先讲“说”。教“说”的人先要自己说得好；要说得好，最起码的条件是要：（一）发音正确，（二）成语适当。无论发音或成语，都要很自然。这就一般说，只有这语言的本国人才可以无憾，虽则在极少数的别国人也有例外。依我们寻常的观察，往往湖北人有湖北口音的英文，江西人有江西口音的英文（这只是随

便举例，并不是说湖北人或江西人就教不好英文，下例同）。即就更小的区域说，也往往无锡有无锡口音的英文，宁波有宁波口音的英文。我曾在上海看见一个宁波籍的英文教员，虽教了多年的英文，对于教授法不无心得，但说的却是满口宁波音的英文，我就很替他的学生们担心！这并不是说只是中国有这样的情形；英国人说法语，或俄国人说英语，也常有相类的毛病。以他们彼此间的文字相类，还不免有这样的毛病，那末以特异于西洋各国文字的中国，中国人可告无愧了。可是无论如何，教英文的人如把"走样"的英文或语音辗转教给学生去学习，这却是一件很不妥当的事情。例如一个满口宁波音英文的那位朋友，他自己勉强可应用这样"走样"的英语，在需要英语的场所，勉强可以达出他所说的意思，这于他当然比"走样"英语都不懂的好些，可是要把他的"走样"的英语教给学生，以误传误，那就是很难恕谅的另一回事了。

讲到成语，有些人的脑子里不是没有若干成语，但是用起来，叠床架屋，拖泥带水，如由说那种语言的本国人用来，就不是这样的。倘竟大胆把这类"走样用法"教给学生，也很显然是不妥当的事情。我就亲见一个留美学生用这样"走样用法"教他的学生。学生的耳朵平日熟于这种"走样用法"的浸润熏陶，英文是永远学不好的，至少要用很大的工夫才能纠正过来，这是一件多么不经济的不幸的事情！

看的能力和写的能力的严格训练，尤其是后者，要获得"自然"的良果，那也只有请外国人做外国文教师最为妥当。

教会学校诚然有不少的流弊，但是关于这一点，即用外国教师教外国文，却不无它的优点。就是在外国教师教外国文的情况之下，还不免有人在所学的英文中保留着他的乡

音;如果尽由夹着中国乡音的英文教师以误传误,那不是要更糟吗?

有些人到外国去留学,却未先把那个外国的文字弄通,到了外国才开始补习那国的文字。这在经济上固然很不合算,但是有件事实却是无可疑的,那就是在外国环境中,由外国教师教外国文,在效率上确有"事半功倍"的优点。这是在国外求学,对外国文的研究特别注意的人所共同感觉得到的。在德国补习德文,或在法国补习法文,进步的速率,不是在别的地方所能比拟的。这虽不是人人办得到,但哪一国文字最好请哪一国人来做教师,却是比较适宜的办法。

不过就中国的情形说,要各校的外国文都请外国教师教,在经济上也许是不可能的。既是在事实上不可能,我竟说了一大堆的话。不是辞费吗?却也不然。我所以特别郑重先把这一点提出来,是要特别注重英文教学法的根本问题。倘若教英文的人,不得已而求诸中国人,即由本国人教外国文,对于这一门课程的知识技能,也须努力有充分的修养,也须努力求得和外国教师差不多,否则便不免要"误人子弟"!

几个原则

现在有些朋友想起办刊物，往往联想到"生活"周刊。其实"生活"周刊以及它的姊姊刊"新生"、"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刊"，都是有它们的特殊时代的需要，都各有它们的特点。历史既不是重复，供应各时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粮食，当然也不该重复。但是抽象的原则，也许还有可以提出来谈谈的价值，也许可以供给有意办刊物的朋友们一些参考的材料。

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

可。试以“生活”周刊做个例。它的内容并非模仿任何人的，作风和编排也极力“独出心裁”，不愿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单张的时候有单张的特殊格式；订本的时候也有订本的特殊格式。往往因为已用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更竭尽心力，想出更新颖的格式来。单张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改为订本的格式；订本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添加画报。就是画报的格式和编制，也屡有变化。我们每看到一种新刊物，只要看到它的格式样样模仿着别人的，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前途了。

其次是内容的力求精警。尤其是周刊，每星期就要见面一次，更贵精而不贵多，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并不是白费的。要办到这一点，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的两三万字的作品。写这样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彻底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一挥而就。这样的文章给与读者的益处显然是很大的：作者替读者省下了许多探讨和研究的时间，省下了许多看长文的费脑筋的时间，而得到某问题或某部门重要知识的精髓。

再其次，要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我在这里怕谈的，是关于推进大众文化的刊物（尤其是周刊），而不是过于专门性的刊物。过于专门性的刊物，只要顾到它那特殊部门的读者的需要就行了；关于推进大众文化的刊物，便须顾到一般大众读者的需要。一般大众读者的需要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不当用机械的看法，也没有什么一定的公式可以呆板地规定出来。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

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

最后我觉得“独脚戏”可以应付的时代过去了。现在要办刊物，即是开始的时候，也必须有若干基本的同志作经常的协助。“基本”和“经常”在这里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现在的杂志界似乎有一种对读者不很有利的现象：新的杂志尽管好像雨后春笋，而作家却仍然只有常常看得到他们大名的这几个。在东一个杂志上你遇见他，在西一个杂志上你也遇见他。甚至有些作家因为对于催稿的人无法拒绝，只有一篇的意思，竟“改头换面”做着两篇或两篇以上的文章，同时登在几个杂志上。这样勉强的办法，在作家是苦痛，在读者也是莫大的损失，是很可惋惜的。所以我认为非有若干“基本”的朋友作“经常”的协助，便不该贸贸然创办一个新的杂志。当然，倘若一个作家有着极丰富的材料，虽同时替几个杂志做文章，并没有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虚耗读者的精力和时间的流弊，那末他尽管“大量生产”，我们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还有初办刊物的人，往往着急于销路的不易推广。当然，发行的技术和计划也是刊物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方面也应加以相当的注意。但是根本还是在刊物的内容。内容如果真能使读者感到满意，或至少有着相当的满意，推广的前途是不足虑的。否则推广方面愈用工夫，结果反而愈糟，因为读者感觉到宣传的名不符实，一看之后就不想再看，反而阻碍了未来的推广的效能。

我们的“家长”

——沈钧儒先生①

我现在要谈谈我们的“家长”。

稍稍留心中国救国运动的人，没有不知道有沈钧儒先生其人。我认识沈先生还在前年（一九三五）十二月底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时候。我记得那时是文化界救国会开着成立大会，沈先生做主席。我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年龄，也不详细知道他的平常，只看见他虽有着长须，但是健康的体格，洪亮的声音，热烈的情绪，前进的意识，都和青年没有两样。后来我因为参加救国会，和沈先生来往比较多一些，我更深深地敬爱沈先生的为人。最近因共患难，更有机会和他接近，更加深了我对于他的敬爱。他不但是我所信任的好

① 这里的副标题为编者所加，以下的几篇亦同。

友，我简直爱他如慈父，敬他如严师。我生平的贤师良友不少，但是能这样感动我的却不多见。我现在要很简要地介绍这位赤诚爱国的“老将”的历史。

沈先生号衡山，浙江嘉兴人，生长在苏州。七八岁时入家塾，十六岁进秀才，三十岁中举人，三十一岁中进士。但是沈先生却忽然脱离了科举的束缚，就在这一年到日本去进法政大学求学。他三十四岁时回国，在北京办过短时期的日报，几个月后回到浙江。当时立宪运动正在发展，他便在浙江筹备地方自治，筹备谘议局，当选为副议长。同时兼任浙江的两级师范监督（即校长），鲁迅先生就在这个时候在该校教授理科。后来他加入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后，他担任浙江教育司司长，后来辞职应选国会议员（因官吏不得应选）。袁世凯称帝，沈先生奋起反对洪宪，几为所害，回到南方。广州的护法政府成立的时候，他到广州，任参议院议员，兼总检察厅检察长。后来护法政府取消，北京政府改组，他北上重任参议院议员，兼该院秘书厅的秘书长（时在民国十一年）。后来曹锟贿选，沈先生也是激烈反对的一人。十五年回到南方，参加国民革命，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反对孙传芳。同时冬季受蒋介石氏（这时做总司令）委任组织浙江临时省政府，中经反动的军队反攻，处境非常危险。民国十六年浙江全在国民政府统辖之下，分政务和财务委员会，分科无厅，除主席一人和秘书长一人外，其余四科的科长也由省府委员分任。沈先生当时任政务委员兼秘书长。“清党”后因误会被拘七天，到南京后因谅解恢复自由。回到上海以后，法学院因副校长潘大道被刺，聘沈先生担任该校教务长，直到现在。民国十七年起并执行律师职务，被选任上海律师公会常务委员，已有五年多了。

我们看了这样的经过事实,虽尽管说得简单,但已可看出沈先生二三十年来总是立于国家和民众的立场,作继续不断的奋斗,一直到现在还是丝毫不懈地向前迈进。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参加过护法之役,又参加过国民革命。他曾有过三反: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曹锟贿选,反对孙传芳阻碍国民革命。他在行动上实行这"三反"的过程中,冒着出生入死的危险,都在所不顾。我们一方面感到沈先生政治经验——革命经验——的丰富,一方面感到沈先生百折不回的毅力。现在这位赤诚爱国的"老将",又用着同样的精神,参加当前的最艰危阶段的救国运动了!我们为着民族解放的前途,要竭诚爱护我们的这位"老将"!

我觉得陶行知先生的"留别沈钧儒先生"一首诗,很能说出这个意思,我现在就把它写在这里:

(一)

老头,老头!
他是中国的大老;
他是同胞的领头。
他忘记了自己的头,
要爱护别人的头。
唯一念头,
大家出头。

(二)

老头,老头!
他是中国的大老;
他是战士的领头。
冒着敌人的炮火,
冲洗四十年的冤仇。

拼命争取，

民族自由。

（三）

老头，老头！

他是中国的大老；

他是大众的领头。

他为老百姓努力，

劳苦功高像老牛。

谁害老头？

大众报仇。

（四）

老头，老头！

他是少年的领头。

老年常与少年游，

老头没有少年愁。

虽是老头，

不像老头。

在这首诗的后面，陶先生还加有一段附注，也很值得介绍：

“沈钧儒先生，六十三岁的老翁，上海领导救国运动，亲自参加游行示威，走四五十里路，不觉疲倦。今年一二八到庙行公祭沪战无名英雄，我曾追随先生参加游行。现读‘永生’，见一照片，知为公祭五卅烈士之影，前排有个老少年，仔细看来，知道是先生，回寓即想写一首诗表示敬意。但行色匆匆，诗思不定，到新加坡前一日才写成。现飞寄先生清览，并致联合战线敬礼。”

这段附注里的“老少年”三字，我觉得是形容沈先生的

最好的名词。沈先生这次在上海被捕之后,曾在捕房的看守所里冰冷的水门汀上静坐了一夜——在那样令人抖颤的一个寒夜里!但是这种苦楚在他是丝毫不在乎的。自从我和沈先生同被拘捕以来,每看到他那样的从容,那样的镇静,那样的只知有国不知有自己的精神,我不由得受到了很深的感动;反顾我自己这样年青人,为着爱国受些小苦痛,真算得什么!这样一来,我的心也就安定了许多。

沈先生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很贤孝的,他们父子间的亲爱,也是令人歆羡不置的;沈先生伉俪情爱极笃,他的夫人去世以后,他于慈父之外,还兼有着慈母的职务。他的大儿子是留学德国的医生,二儿子是留学德国的土木工程师,他们两位都在国内为社会服务了;三儿子在日本学习商业管理,四儿子在德国学习电机,女儿在金陵女大理科。以沈先生的地位,尽可以做"老太爷"享福了,但是这位"老少年"为着救国运动,宁愿含辛茹苦,抛弃他个人的一切幸福。

我们不但要学沈先生的为国牺牲的精神,还要学他的至诚的爱;他以至诚的爱爱他的子女,以至诚的爱爱他的祖国,以至诚的爱爱他的朋友,以至诚的爱爱他的同志!我深深地感觉到沈先生的全部生命都是至诚的爱造成的!

我为着中华民族解放的前途,虔诚地为我们的"家长"祝福!

“难兄难弟”的一个

——章乃器先生

除“家长”外，我们还有几个“难兄难弟”，倘若这里所用的“难”字可作“共患难”的“难”字解。他们的尊姓大名，我想读者诸友也许都已经知道了，那就是和我同时被捕的几个朋友。让我先谈谈章乃器先生。

我记得第一次看见乃器的时候还在十年前。当时他已在浙江实业银行做营业部主任，因为想办“新评论”半月刊，由一位朋友介绍他到时事新报馆来看我。我们所谈的全是关于出版刊物的情形，我一点不知道乃器是怎样的一个人。不久他在华安保险公司楼上结婚，特约我去观礼，并临时“拉夫”，要我起来说几句话，这是我第二次和他见面。此后我们很少遇着，直到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以后，我们晤谈的机会才渐渐地多起来。我们的友谊的加深，唯一的媒介

可以说是救国运动。尤其使我肃然起敬的，是他为着参加救国运动，虽牺牲二十年辛苦所获得的行长位置而毫不顾惜。自从他和我一同被捕以后，从捕房的监狱起，中间经过上海特区第二监狱，上海地方法院看守所，上海公安局，以及苏州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我们总是羁押在一起。他所念念不忘的只是民族解放的前途，救国运动的开展；至于对他自身的遭遇，我从未听见过他有一言一语的自怨自怼。我对于他的纯洁爱国的精神，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

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便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

在上海特区高三分院法庭审问的时候，审判长问到他曾否煽动上海的日本纱厂罢工，引起了他的抑制不住的愤怒，他昂首睁圆着眼睛大声疾呼地答道："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的力量还不够！倘若我有力量煽动日本纱厂罢工，我要很骄傲地回答审判长：我曾经煽动日本纱厂罢工！"审判长停了好一会儿，才又问道："你如果有力量，是要煽动的，那你至少是同情的。"乃器又不加思索地高声答道："是！"他接着又发出他的狮吼："中国工人在日本纱厂所受的虐待，和猪猡一样，请审判长问一问全法庭的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本国同胞遭受到侵略者这样惨酷的待遇，谁不表同情！"站在左右的法警弟兄们，听到他这几句激昂慷慨的话语，也不自觉地大点其头！

我和乃器同做了囚犯之后，对于他由穷苦奋斗出来的

经历,也比较地更清楚些。他生于浙江青田的乡间,求学的机会很少,二十岁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就进浙江实业银行做练习生,每月只得津贴两块钱。一年后他辞职往北方入通县农工银行做营业主任。这是一个附属于财政部的小银行,号称营业主任,月薪只有十六元。一年后升任襄理兼营业主任,月薪加了十块钱;但是和当时政府有关系的银行,政局有些变动,办事人的饭碗也随着变动,因此即此月薪二十六元的襄理,他只做了不到一年便滚蛋了。刚巧在北京有美国人和中国人合设中美实业公司,经营贸易和投资,美国人做经理,会计主任请他做,月薪有八十元,而且供膳宿,但是只做了三个月,因为代表美国人利益的洋经理擅用威权,他又愤然辞职。这样一来,二十四岁的章乃器又陷入了失业的恐慌境域,过着半年的很穷苦的流浪生活。随后回到上海,浙江实业银行的当局请他回到银行里去做营业部科员,月薪二十二元。十几年来因劳绩逐渐升任副经理兼检查部主任,后来又兼任中国征信所董事长。现在为着参加救国运动,都一笔钩消了!

从乃器的经历里,很显然地可以看到他办事的勇于负责,更可以看到他的正直的性格是在随处流露着。我尤其感触的是常人在职业上的位置愈高,往往颓唐,暮气愈深,学识也愈退步;乃器便完全两样。我们每读他的文章——尤其是两三年来有关救国问题的文章——没有不感觉到他从实践中得来的学识是时刻在那里前进的。

“难兄难弟”的又一个
——李公朴先生

其次要谈到“难兄难弟”的又一个——李公朴先生。

上节谈过的章先生是银行练习生出身;倘若练习生可算是摩登学徒的另一名称,那末李先生却也有着相类的发源,他原来做过镇江一家京广洋货店的学徒!他原籍常州,生长在镇江,十三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京广洋货店里去“学生意”。一学就学了三年半,除最后一年每月有一块钱的收入外,其余的时候,每月只得到所谓“月规钱”两角!他十六岁“满师”,但是他刚刚“满师”就开始“不安分”了!这个时候他就在“五四”运动的怒潮中发起爱国团,参加抵制日货,攻击店主卖日货,结果被开除!我觉得公朴的最大特点是有勇气,不怕难,就在这个时候已可见端倪了。

幸亏有他的阿兄公愚先生的帮助,勉强入校求学。在武

昌文华大学附中只读了一年半,因校医虐待学生,酿成学潮,开除百余人,他是附中学生代表之一,也被开除,于是被开除的学徒又做了被开除的学生!他只得转学,最后转到沪江大学的附中,总算毕了业;但是在沪大一年级的时候,他又“不安分”了!他加入国民党,参加革命,从广东随北伐军出发,由福建、浙江而到达上海,做政治工作。到民国十八年,美国某大学有给与中国学生奖学金的机会,他便毅然赴美留学。在他动身的前几天,他的盘川还未筹足;可是他并不灰心,还是极力设法,终于得到朋友们的协助,达到他的目的。他到美国以后,很热心地替“生活”周刊写通讯。我和他做朋友,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我替所主持的刊物选稿向来是很严格的,那时的公朴,思想还不及现在的成熟,写作的能力也还不及现在的好,他的来稿并不是篇篇都登得出的。但是他却不管这些,你登,他很兴奋地再写来;你不登,他还是很兴奋地再写来!在这件事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有勇气,不怕难。

他在美国虽有奖学金,仍不够用,所以同时还过着工读的生活。以这样一个穷学生,毕业后居然还心花怒放,要从他的学校所在地的仆特冷(Portland)到纽约去看看!可是没有盘川。他得到一个朋友的介绍,去见一个轮船公司的经理,想在他们开往纽约的货船上做工,免费乘到纽约去。那里的工头们看他是中国人,不肯传达,叫他出去!他过一两天又去问,又被叫着出去。他不怕麻烦,继续着去问了十几次,才碰到那经理,结果许他在船上做些工作。途中湾了许多码头,整整一个月才到纽约。他在船上和水手们同干着笨重的苦工,还偷闲看他的书!这是他有勇气,不怕困难的另一表现!

他回国以来，对于民众教育特别努力。除他所创办的“读书生活”外，尤其有成绩的是他四年来在上海所办的补习学校和流通图书馆。补书学校的数量由一个增加到八个；学生的人数由两三百人增加到四千五六百人。图书馆里的书籍由两千册增加到三万册；登记的读者由两三百人增加到两万人。补习学校的最近的全部经费，每年不及五万元；图书馆的经费最初每年不过五千元，最近每年也不及一万五千元。这些在中国都打破了纪录！在这图书馆里还附设有读书指导部，在中国也可算是创举。这些还是在表面上、在数字上可以看得见的方面。至于经费支绌时的奔走经营，黑暗势力压迫时的艰苦支撑，那却不是局外人在表面上所看得到的。倘若不是有勇气不怕难，这个责任是很不容易担负起来的。

现在公朴已把他的这种勇气和不怕难的精神用到救国运动的阵线里来，这是我们要为救国运动前途庆幸的。

“难兄难弟”的又一个

——沙千里先生

我们这几个“难兄难弟”里面，居然有着三个学徒，这也可算是这几个人的奋斗史的特色。已谈过的两个是乃器和公朴，第三个要轮到沙千里先生。

据千里说，他在民国十八年（距今八年前）就曾经来看过我，那时我在辣斐德路一个小小的过街楼上办“生活”周刊，他已在一家趸批疋头的字号里做账房先生了。这一段故事，以及当时的情景，我已完全不记得。就寻常说，账房先生所注意的只是算盘，他竟注意到“生活”周刊，他平日对于新运动的注意和同情，从这种小事里已可想见了。后来我们就一直没有见过面。直到我由香港回到上海，才在救国会的会议席上遇着。我想千里在八年前来看我的时候，哪里梦想得到我们会住在一个牢狱里？

但是因此我对于我们的这个"小弟弟"的生平懂得更清楚一些,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他是苏州人,生长在上海,十五岁的时候小学还未读完,就被送到一家趸批疋头的字号里做学徒,每月仅得"月规钱"二百文。因为他学习敏捷,办事负责,过了两年多就升任职员,每月月薪四块钱。不久账房缺人,他被请代理账房,后就担任清账房,月薪有了二十元,年龄约在二十岁左右。好些职员在闲暇的时候,喜欢酒食征逐,狂嫖滥赌,他却能利用闲暇的时间来增加自己的知识。他先在补习学校补习英文,喜欢阅看前进的刊物。后来他过着工读的生活;一面做账房先生,一面却在上海法科大学(即现在的法学院)做学生。那时只须考的成绩够得上就行,并不像现在对于升学文凭有着那样呆板的规定,所以千里虽然连小学毕业的文凭都还没有到手,但是因为他平日补习的勤奋,应试的成绩够得上,居然也有入大学的机会,替社会增加了一位能够主持正义的律师。看了这样的事实,为着一般穷苦出身力求上进的青年,我向来积极主张升学应该重视实际的考试成绩而不应死守文凭的主张,更得到有力的证明(为着这件事,在"生活"周刊上曾和朱经农先生有过很激烈的辩论)。

千里不但有强烈的求知欲,坚强而有恒的研究精神,对于社会的新运动也有着深刻的注意和浓厚的同情。在民国十五年的时候,北伐军正在出发,还未到上海,一个账房先生的他,就奋起参加国民党的秘密工作。那时的上海,正是疯狂似的李宝章以杀头残害革命青年的时候。民国十七年,他曾经同几位朋友创办"青年之友",一年半后被禁;前年十二月起主编"生活知识",一年后也被禁。

今日的千里,我看他的求知欲的强烈,研究精神的坚强

而有恒，和他在做学徒的时候没有两样；这只要看他这次在牢狱里还是那样孜孜不倦地研究英文，研究法律，便可以知道的。他在这里还学会了“苏武牧羊”的悲壮歌曲，这是没有听过的朋友们不可错过的！至于他参加救国运动的热烈，更不必我来多说了。

“难兄难弟”的又一个

——王造时博士

我们的“难兄难弟”里面有一个胖弟弟——王博士。这个胖弟弟的样子生得那样胖胖白白，和蔼可亲！他的性情又是那样天真烂漫，笃实敦厚！凡是和我们这个胖弟弟做过朋友的，想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吧。

我第一次和造时见面，比认识乃器的时候迟了一半，是在五年前；但是他来看我的情形，却有些和乃器的相类。那时他正在光华大学做文学院院长，为着要替他所办的“自由言论”半月刊登记的问题，特到生活周刊社来和我商量。后来在蔡孑民先生等所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开大会的时候，才第二次和他见面。此后没有机会碰着，一直到前年（一九三五）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他扶病到会，刚巧坐在我的旁边，我们才第三次见面。他对我说，国难

严重到这样地步，他虽有病，也不得不勉强来参加。他在会场上还起来说了几句激昂慷慨的话；他说要起来组织救国会，先要有准备进监牢的决心，现在他自己果然进监牢了。

造时是江西安福县人。在我们这几个“难兄难弟”里面，他得到比较顺利的求学机会，因为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就考进了北平的清华。那时这个学校是官费留美的预备学校，他进了这个学校，由中学而大学，由大学而出洋，出洋后由学士而硕士，由硕士而博士，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却不是没有逆境，却不是没有需要艰苦奋斗的逆境！那是他参加救国运动的方面。他十六岁在清华求学的时候，因为参加反对巴黎和约，要求罢免卖国贼曹、陆、章，就两次被捕过。第一次因领队到东安市场演讲被捕，第二次参加代表团向徐世昌请愿被捕。所以最近一次的被捕，在他算是第三次了。他回国后担任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等学校的政治学教授，并加入“新月”杂志担任撰述。一年后“九一八”国难发生，他又被卷入了救国运动的漩涡！当时他发表了不少关于对日抗战的主张。后来被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因反对限制讨论范围，代表平、津、沪国难会议会员和行政当局交涉无效，拒不出席。同时他发起上海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和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以号召民主，主张抗日，援助上海抗战军队为主要任务。不久他又加入蔡先生等所发起的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上海分部执行委员。结果被禁止教书，不能再做教授了。于是他开始执行律师职务，并从事译著的工作。但是一年后他又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重振旗鼓，努力于救国运动。最近又第三次被捕了。

王博士具有演说的天才，尤其是在广大群众的大会场上，他能抓住群众的心理，用明晰有力的话语，有条理的说

法,打动他们的心坎。

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这是很值得敬佩的。

一个“难妹”

——史良

和我同时被捕的几个“难兄难弟”，关于他们的生平，我已和诸君谈过了。最后要谈到我们的一个“难妹”。这个名词似乎很生，但是既有“难兄难弟”，为什么不可有“难姊难妹”呢？男女是应该平等的，救国运动也应该是男女都来参加的。现在有了“难妹”，正是中国妇女界进步的象征，所以我用这个名词，很觉得愉快。说“难妹”而不说“难姊”，这是因为和我们同时被捕的那位史良女律师，在我们里面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在这次同患难的几个朋友里面，我和史律师见面得最迟，虽则她在律师界的声誉，以及她参加救国运动的英勇热烈，都是很早就知道的。她思想敏锐，擅长口才，有胆量，这是略有机会和她接近的人就可以看得出的。我觉得她尤其

有一种坚强的特性，那便是反抗的精神——反抗黑暗的势力和压迫。这种精神，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流露了出来。例如她在十三岁的时候（民国六年），在本县的武进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求学，做高三的正级长，就领导同学驱逐一个才不胜任的算术教员，掀起学潮，罢课三天，结果终于达到掉换教员的目的，虽则因为她是这次学潮的首领，被记了一次大过，作为这个教员下场的条件。又例如她在十七岁的时候（民国十年），在女师本科三年级，因为同学们不满意颟顸的校长，她又领导同学驱逐校长，罢课示威，向南京教育局请愿，大闹县公署，包围县长三小时，围困教育局长十三小时，结果胜利，达到掉换校长的目的。当时她担任女师学生会会长，同时担任武进学联会评议部主任。

她二十三岁（民国十六年）毕业于上海法科大学。在随后五年里面，她担任过的职务有：南京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少校指导员，江苏省特种刑事法庭临时地方法院书记官，江苏省区长训练所训育员，江苏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兼总务主任，青岛特别市党部训政科主任。自从民国二十年以来，她开始执行律师职务，在律师界已有五年了，有着很好的声誉，同时对于救国运动，非常努力。

史律师最近的被捕，已是第四次了。她在“五四”和“五卅”的怒潮中，曾经热烈参加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因为演讲和领导的工作，被上海捕房拘捕过两次。她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任职的时候，有某主任追求她，被她拒绝，竟被诬为“共党”，被拘入南京模范监狱十四天，幸由吴稚晖、蔡孑民两先生查明保释。后来她在特种刑事法庭临时地方法院任职的时候，又有某君追求她，五六年未达到目的，又诬陷她和“反动”有关，经该院停职侦查，结果认为毫无反动嫌

疑,宣告无罪,仍得恢复原职。

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她和我们这几个"难兄难弟"同时被捕。第二天由高三分院审问,认为证据不足,准许"责付"律师保出,公安局仍坚向法院请发拘票,她拒绝到案,后以同案六人解送苏州高等法院依法审理,她便于十二月三十日到苏州自行投案。

我曾经征求史律师对于妇女运动的意见。她认为:还在双重压迫下的中国妇女,一方面自应加倍努力,求自身能力的充实,在职业上、经济上力争男女平等的兑现,另一方面,也只有参加整个的反帝、反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才有前途。她又说,她最反对一种以出风头为目的的妇女,自己跳上了政治舞台,只求自己的虚荣禄位,朝夕和所谓"大人物"也者瞎混着,却把大众妇女的痛苦置诸脑后;这种妇女虽有一千人上了政治舞台,也只有一千人享乐,和大众妇女的福利是不相干的。

史律师还未曾结婚,有些朋友问她对于女子独身的意见,她说:"我始终没有提倡过独身主义。我觉得独身并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情;结婚也不是一件低微的事情。高兴结婚就结,不愿意就不结。不过为着要免除工作事业的阻碍起见(如生育与家事麻烦等),结婚就算是私人的幸福,也只有牺牲一点,多做些工作与事业。"

有人问她"嫁不嫁",她反对这个"嫁"字。她说这个"嫁"字明明是重男轻女,把女子嫁给男子;换句话说,还是把女子当作男子的财产;她认为这个因袭陈腐的思想是人们所应当注意纠正的。

史律师的反抗和奋斗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敬重的。我们要提倡妇女解放,"免除工作事业的阻碍"的确是一件很重

要的先决条件。我在苏联视察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对于这一点非常努力进行。可是生育这件事，他们也看作妇女对于社会的贡献，不过要极力造成良好的环境，使结婚不致成为“工作事业的阻碍”。

“生活”在抗战期间贡献了什么？

生活书店在抗战爆发以前，在它所办的刊物上曾经热烈拥护过国民党领导下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伟业，曾经热烈参加过全国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以建立抗战基本条件的伟大运动，这都是国内外千万读者所熟知的。自抗战爆发以来，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对于抗战国策的宣传与前后方精神食粮的供给，只有扩大工作范围，加强工作效率，竭尽心力，不敢懈怠。所设分支店深入战区及游击区，英勇忠贞的同事冒战地危险而努力服务，屡次有同事押运大量书籍，出入敌人封锁线，将数十箱书籍正在匆促运抵岸上时候，就听到敌人的兵船在后追踪而来，在时间上如略有延误，生命即不免遭受惨祸。我每接到他们的工作报告，未尝不惊叹他们拼性命，冒万险，为抗战文化而英勇奋斗，真不愧“文化战士”之

称。有一位同事因忠于职务，在空袭时原已离开工作据点，临时赶回有所布置，不幸惨遭敌机炸毙，尸体分飞，不见踪迹，为抗战文化而牺牲，只留下了一块职员徽章，给与家人及全体工作伙伴以无限的惨痛纪念。在抗战期间，还有几位同事，因力疾办公，在各工作据点奔波辛苦，不辞劳瘁，竟以身殉。

在出版方面，除陆续出版杂志八种，书籍近千种外，曾为一般民众编行“战时读本”及“大众读物”。前者，内容以深入浅出的写法，灌输一般民众关于抗战建国的知识，印数达百余万册，后者为宣传抗战的通俗小册，印数共达三百余万册。这两种宣传抗战国策及建国伟业的通俗书籍，共计总在五百万册以上。加以本店发行网布满前后方，同事服务的切实认真，办事效率的进步，对于抗战宣传的任务，在一个资力薄弱，全靠营养以维持自身生存的文化出版机关，自问实在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此外如广印“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已接连发行了好几版；又号召广大读者捐款，特为前方将士编行“全国抗战”周刊战地版，分赠各战区的战士阅览，很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纷纷来信要求增加数量，由于我们人力资力的有限，不能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感到深深的歉疚。总之凡遇与抗战有裨的文化事业，虽在印刷纸张及运输极艰难的情况中，我们无不全力奔赴。

本店所努力的文化事业既以抗战建国为目标，不但在出版方面竭尽心力，努力奋斗，凡遇党政当局对抗战建国积极方面有所号召，亦无不竭诚响应，不敢后人。试举几个最显著的事实：例如在战时首都，本店在整个首都中第一家奋起响应对于义卖的号召，在结束的时候，并请到党政特派代表莅场监视义卖所得的结算，全数贡献于国家。又例如在前

年五六月间，本店已开始被摧残，分店无辜被封的事实已开始出现，但本店对于当时党政五大机关五十万慰劳信的伟大运动，全体同人热烈动员，由本店单独征得慰劳信十三万余封。此事详情，我曾在“全民抗战”周刊上报告，想读者诸君还能记得。我看到全体同人于辛劳办公之余，用实际的行动来响应政府对于加强士气鼓励作战的号召，几于废寝忘食，乐此不疲，不禁发生深深的感动。他们不但本身努力埋头大写慰劳信，他们的妻子、儿女、兄弟、姊妹乃至邻居、亲友都被他们动员起来大写慰劳信。他们不但热烈推动他们周围的人们，而且组织小队到各商店推动店员大写慰劳信。当时以全国为范围的慰劳信预定的总数不过五十万封，而本店以一个小小文化出版机关，能在短短一二个月的时期内征得十三万余封，这在本店全体同人，在被诬被冤被摧残的惨酷情况下，仍然奋发蹈厉，不断为抗战文化而忍痛努力，虽愧贡献微薄，自问尚可告无罪于国家民族。

以上所述的情形，都是根据具体的事实与准确的数字。参加各种有裨抗战的运动，为全国共见共闻的公开事实，出版各种有裨抗战刊物的数量，亦有帐册及会计师的证明可查。本店同人共同努力于这一个文化堡垒，常以贡献微薄为憾，绝对不敢自满，也绝对无意表功。不过以数百共患难同甘苦的工作同志，经十六年的惨淡经营，流血流汗，艰苦备尝，由此所辛勤培成的一个文化堡垒，××××××××××××，不得不于万分沉痛之中，略举事实，公告同胞。一个文化堡垒被摧残的事小，由此事实所象征的政治逆流中的文化逆流事大，所以不得不唤起国人的注意，以强有力的舆论，挽救政治上的逆流，由此挽救文化上的逆流。记者之意，固不仅为一个文化堡垒有所痛惜。

无事不专的专家

天下无万能的人，也很少一无所能的人（除非自己糟塌掉），倘知各就自己天赋能力的大小及趋向，加以培植，加以修养，加以学力，加以经验，各自用得其当，就所专攻的学识经验以从事专业而贡献于社会，在己则能使固有之天才获最大限度之发展，在社会则能因此而获得最大限度的裨益，此专家之所以可贵。

但在我国往往产生许多无所不专的专家。试略回想从前的政界，有人今日做司法部长，隔几时可以做教育总长，再隔几时又可以做内务总长……各部的什么长，在名称上似乎是各有所专，在别国是要选各得其所的专门人材充任，在我国则凡是做了大官的人就无长不可做；这是无所不专的官僚专家；到现在此种风气还是不免。这种风气之所由

来，当然有很深远的历史背景。我国从前虽有所谓士农工商，但农工商是够不上受人尊崇的，只有“士”是受人尊崇的，所以一钻入私塾，就可听见什么“惟有读书高”的声浪，而所谓“士”者即是无所不专的专家，只要读过四书五经，什么事都可以干！“相”是文的，“将”是武的，而读书人却可以“出将入相”，到了外面可以做将，一到了里面去就可以一变而为了相！医生原是一种很专门的事业，但在“医”字之上却加一个“儒”字，称为“儒医”，儒者是读书人也，于是读书人不但可以“出将入相”，又可以由旁路一钻而做“医”！

到了现在，环境虽不无一部分的变异，而这种深入人心的“遗风余韵”还暗中滋长着，于是往往虽受有专门的教育，而却不安其分，不肯专其所专，却喜欢掮出无所不专的虚浮的花样为，在社会上瞎混！有某君在文学上有了努力，并得到相当的名誉，却抛弃了他的特长和已往的经验而分心于别的不相干的事情。有某君在教育上有过相当的学识经验，不从这方面有所译述，忽然乱七八糟的发表些经济学上的译著，法学上的译著，政治学上的译著，反给真正有研究的人批评得焦头烂额。诸如此类的不经济的行为，不但于社会上是有害无益，而且把本人所固有的多少天赋，也随之埋没，未免可惜。

最好笑的是本国产生了骛外虚浮的无所不专的专家，遇有外国的专家到了，往往也把这样的态度来对他。例如美国的克伯屈博士，他固然是美国教育界的名宿，但他的特殊贡献是在“教育法原理”，不是包办教育上的一切，而到了中国之后，我国的许多大教育家却分列日期，第几日要他讨论大学教育，第几日要他讨论中学教育，第几日要他讨论初等教育，第几日要他讨论职业教育，第几日要他……好像几十

代祖宗在教育上未解决的一切问题都要请他来解决一下！我够不上做教育大家，当时未曾列席，不过我看报上发表了这样的日期表，念他未曾做到“中国特产的无所不专的专家”，颇替他担忧。后来在报上看见他对于各日讨论的无所不专的教育问题，所答的话里面好几处是说：“这个问题，我不敢妄断，你们是要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形去解决的”，这不是这位专家“吃瘪”，实在是他未曾做到我国所崇拜的“无所不专的专家”资格！

中国“无所不专的专家”所以遍地皆是，阻碍真正事业的进步，他们本人不自量，无自知之明，及好出风头，固然是自己害自己，而社会却也不能辞其咎，因为一个人无论你专了什么，一旦成了什么名人，社会上人便当你是万能。这里请你做校董，那里请你做董事；你的文章尽管狗屁不通，有人争先恐后的请你做广告；你的字尽管写成鬼样子，有人争先恐后的请你题签；甚至包医花柳病的文序上，也要拉你写一个尊姓大名！

无所不能的人实在是一无所能，无所不专的专家实在是一无所专，即有一知半解，决难有深入的研究与心得，更说不到对社会有真正实际的贡献，不过把浮薄的虚声，大家骗来骗去罢了。

天下无万能的人，人贵有自知之明，为己身事业计，为社会进步计，这个观念都有认清楚的必要。

（十八，七，七。）

道听途说

最近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在本埠南京路上走,经过一个十字街角的报摊,看见一个穿纺绸长衫的仁兄,倒也衣冠楚楚,大模大样的,手上拿着几份报,正和那位报贩谈得起劲,我听他说各报的来历和营业状况,熟极而流,如数家珍,我自己也是办报的人,当然很注意,所以便被他吸住也立着听他的宏论,后来他讲到了“生活”周刊,指着报摊上那一厚叠“生活”笑着说道:“这家报斜气!”(上海话了不得的意思)我就禁不住从旁插嘴问道:“为什么斜气?”他很正经的回答道:“经售这家报的报贩头已靠此发了财,讨起小老婆。这家报的老板更大大的发了财,现在已经造起大洋房了。”我问他:“老板是谁?”他绝不迟疑而又十分迅捷的回答道:“是个广东人。”我忍着笑赶紧走开,一路笑到家里。

本刊的新社址的确是租用一个似乎可以称为大洋房的一小部分，这所洋房是由董事会设法借到五万圆造的，分十年由租金摊还，而“生活”周刊仍是每月出租金租用一小部分，因为本刊现在是经济自立，靠自己的正当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我们的正当收入在目前约有三途：一是广告，二是发行，三是丛书。收入的用途目前亦约有三条：（一）维持本刊的成立，极力勿使读者的担负加重，例如最近虽金价暴涨，纸价倏增，百物昂贵，维持艰难，本刊仍保全原有的文字篇幅，只从广告方面力谋挹注，不愿遽增报价；（二）优待著作家，稿费较前增至五倍（编者自己文字向不另取稿费）；（三）优待忠实勤奋为本刊办事的职员职工。本刊目前的经济状况只能够靠自己的正当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我在本刊服务的愉快，也因为我明白知道本刊的正当收入是用到本刊的事业上去，不是替什么资本家装私人的腰包。

（十九，七，二十七。）

自觉与自贱

自觉心是进步之母，自贱心是堕落之源，故自觉心不可无，自贱心不可有。本期沧波君自英通讯，提起我国驻外的公使馆领事馆，有的连牌子都不愿挂，国旗都不愿悬，这种习惯是否已普及于我国驻外的外交机关，虽不可知，但有此事实之发现，已足引起国人的注意。我们试分析这种心理，实含有自己看不起自己的祖国，自己不愿做中国人的意味。试再作进一步心理上的分析，便知道是发生了自觉心以后的自贱心。以堂堂代表一国的外交官，乃具有这种自贱心，已属可痛，而依默察一般人所得，深恐这种变态的心理不仅限于所谓外交官也者。这种潜伏的祸根，苟非铲除浮尽，则我们的民族前途实祸多而福少，进步减少希望而堕落的路愈跑愈远。

所谓自觉心，简言之，即自觉有何长处，便当极力保存而更发扬光大；自觉有何短处，便当极力避免而更奋发有为。自觉心所以能成为进步之母者，即在乎此。若自觉有所短而存着自贱的心理，便是自甘永居卑劣的地位，所得的结果是颓废，不是进步。

我国在此混乱时代，当然有许多不满人意的地方，我们所该努力的方向是要靠我们自己群策群力把不满意的地方使它变成满意，否则你尽管不愿做中国人，终究是中国人。不愿挂中国牌子不愿悬中国国旗的中国公使或领事，不见得就因此一跃而为其他什么特别出风头国家的大公使或大领事；不见得就因此可以获得别人的特殊尊重。想穿了这一点，我们自觉之后，只用得着自奋，用不着自贱。我们当光明磊落泰然坦然的做中国人，尽我们心力做肯求进步的中国人。无所用其自大，亦无所用其自贱。

（十九，十一，十。）

能 与 为

“能其所为”与“为其所能”而能合并，在个人在社会都是莫大的幸事；初虽未能，肯学习而做到能，则由“为”而“能”，亦尚可有为；最下者虽“能”而不“为”，或不能而妄“为”。

一人事业上之成就与其能力为正比例；且自文明进步，分工愈精，则能力之专门化亦愈密，能于此者未必亦能于彼，故与事业之成就为正比例的能力，尚须注意其所专者是否适合于其所为。果有相当的能力，而此相当的能力又适合于所做的事业，其效率之增高，业务之发展，实意中事，在社会方面之兴盛繁荣，全恃此种事业获得此种人材；在个人方面之感觉兴味与愉快，亦全恃此种人材有机会尽心竭力于此种事业。此即所谓“能其所为”与“为其所能”合而为一。故

有志于某种事业者，与其临渊羡鱼，毋宁退而结网，结网无他，即当对于此某业所需要之能力先加以充分的准备。昔人所谓“水到渠成”，所谓“左右逢源”，都是有了充分准备以后的亲切写真。

能力之养成，常有待于实际应付问题与处理事务时之虚怀默察，及领悟窍诀。故“学”与“为”常可兼程并进，互有裨益。在此原则下，虽最初有所未能，或能而未精，只须肯存心学习，未尝不可由“为”而“能”，古今来有不少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物，虽未有领受正式教育之机会，而犹能利用其天赋，由困知勉行而卓然有所树立者，都是由这条路上走出来的。不过要走得上这条路，一下走不到康庄大道，必须不厌曲径小路之麻烦；换句话说，即勿因事小而不屑为，当知“百尺高楼从地起”，天下决无一蹴即成之事，亦未有一学即成之业，无不从一点一滴的知识经验积聚而成，若小事尚不能为，安见其能为大事？

尤可悯者为虽“能”而不“为”，一种事业所以能有特殊超卓的成绩，全恃从事者能以满腔热诚全副精力赴之。若因循苟且，敷衍暇逸，即有能力，无所表现，虽有能为之能，等于不能，虽有可能，永为不可能。这种毛病，不在相当知识之无有，实在良好品性之缺乏——尤其是服务的精神与忠于所业的态度。还有一个大病根，便是畏难。这种人仅见他人之成功，而不知他人之成功实经过无数次之失败，实尝过无数次之艰苦。常人但见成功之际之愉快，不见苦斗时代之紧张；但闻目前的欢声，岂知已往的慨叹？任何事业的成功史中必有一段伤心史，诚以艰苦困难实为成功必经的阶段，尤以创业者为甚，虽已有“能”，在创业时期中必须靠自己打出一条生路来，艰苦困难即此一条生路上必经之途径，一旦相

遇，除迎头搏击外无他法，若畏缩退避，即等于自绝其前进。

不能而妄为，其为害超过于虽能而不为，盖一则消极的无所成而已，一则积极的闯祸。此类人既不屑学习，又不自量力，好虚荣而不顾实际，善大言而不知自惭，阻碍贤路，贻害社会，决无自省之日，徒有忮求之心，怨天尤人，永难觉悟。自知未能者尚可使其能，实际无能而自以为有能或甚至自以为有大能，轻举妄动，虽至失败而尚不知其致败之由，乃真无可救药。

(二十，五，九。)

呆　　气

我们寻常大概都知道敬重"勇气"和敬重"正气"。昔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从理直气壮中所生出的勇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有人问他什么叫做浩然之气,他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这是天地间的浩然正气。但是我意以为非有几分呆气,勇气鼓不起来,正气亦将消散;因为"虽千万人,吾往矣"!非有几分呆气的人决不肯干;"以直养而无害",亦非有几分呆气的人也不肯干。试想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不是呆气的十足表现吗?

研究任何学问,欲求造诣深邃者,也不可不有几分呆

气。据传发明地心吸力学说的牛顿,有一天清晨正在潜思深究的有味当儿,他的女仆预把鸡蛋置小锅旁备他自煮作早餐,他一面沉思,一面把手上的一只表放入锅内滚水中大煮特煮,这不是呆气的表现吗?又据传说电学怪杰爱迪生结婚之日,与新夫人同车经过他的实验所,把夫人暂停在门外,自己跑进去取什么东西,不料进去之后,忘其所以,竟在一张桌上大做其实验,把夫人丢在外面许久,最后由新夫人进去找了出来,才一同回家去,这又不是呆气的表现吗?大概研究学问非研究到有了呆气的境域,钻得不深,求得不切,只有皮毛可得,彼科学家思创造一物,发明一理,当其在未创造未发明之前,人莫不讥为梦想,甚乃狂易,认为徒耗光阴,结果辽远,而彼科学家独能不顾讥笑,埋头研究,甚至废寝忘食,甘之如饴,非有几分呆气为后盾,岂能坚持得下去。

委身革命事业以拯救同胞为己任者,也不可不有几分呆气。彼革命志士,思为国家谋幸福,为人民除痛苦,而当其未达到谋幸福除痛苦之前,无一兵一卒之力,无弹丸凭藉之地,在他人见之,未尝非纸上谈兵,痴人说梦,认为必不可以实现,然卒以彼大革命家之规谋计划,冒万险,排万难,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敢为,刀斧不足以惧其心,穷困不足以移其志,置身家性命于度外,而登高一呼,万方响应,翕然从风,固为万流景仰,但在流离颠沛之际,非有几分呆气为后盾,岂能坚持得下去?诚以凡事非有几分呆气来应付,处处只计及一己利害,事事顾虑前途得失,无丝毫之主见,无丝毫之冒险精神,迟疑不前,趑趄不进,永在彷徨歧路之间而已。

此外欲能忠于职务,亦非具有几分呆气不可。在办公室中但望公毕时间之速到,或手持公事而目注墙上所悬时计

者，大概都是聪明朋友的把戏，事业交在这种人手上是永远办不好，这是可以保险的。因为他所缺乏的就是忠于职务视公务如已事的呆气。降而至于交友，也以具有几分呆气的朋友为靠得住。韩退之所慨叹的“士穷乃见节义”，朋友穷了，仍不忘其友谊，此事非有较高程度之呆气者不办！

我们寻常的心理，大概无不喜闻他人之誉我聪明，且亦时欲表现其聪明；又无不厌闻他人之称我为呆子，而并不愿自认为呆子。初不料呆气也有那么大的好处！

（二十，五，十六。）

冯玉祥与缎鞋

据说冯玉祥氏在开封时，不准人家穿绸缎衣服，一见有穿绸缎的，他便要千方百计，使你难堪，有一次他看见自己部下有个兵士穿着一双缎鞋，他连忙上前去深深的一个揖，随着是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不但一次，他接着左一个长揖，右一个鞠躬，把那位丘八先生弄得莫名其妙，呆若木鸡！最后冯氏告诉他说："我并不是和你行礼，只因为你的鞋子太漂亮了，我不敢不低头下拜哩！"那位丘八先生吓得魂飞天外，连忙脱下新鞋，赤着脚走回去。

这样的滑稽剧，冯氏很会扮演，结果听说他的左右往往预备好两种衣服，去见他的时候，便穿上一件蓝土布褂儿，省得他作揖鞠躬够麻烦；出去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不是穿上漂亮的西装，便是穿上讲究的绸衣。

我们承认廉洁劳苦，是革命精神的一个当然具有的部分，但仅仅廉洁，仅仅劳苦，却绝不能就尽了革命的能事。像木偶一般，虽无所耗费，于人何益；像奴隶制度下的劳苦工役，于己于人群何益？（享受剥削所得的主人们当然在外。）所以必须有共同的主义信仰，共同的奋斗目标，积极的进行计划，然后廉洁劳苦始有意义，在这种立场之下，劝导人人共趋于廉洁劳苦之途始有意义。上面所谈的一类滑稽剧，固然是徒使左右多制一套衣服，不过养成虚伪的习惯，但即使不伪，若徒禁小兵穿缎鞋，而不能禁军官之克扣军饷，结果不过使军官更易于多多克扣，顺利剥削，而无数小兵徒作"瘟生"而已！

所以在剥削制度之下，即有心劝人修养，亦苦于无从说起，因为忠实勤苦等等美德用于为大众谋福利上，和用于为少数人增加搜括、增加私利上，性质迥异。

（二十一，七，二十三。）

硬吞香蕉皮

重远先生偶然谈起从前吴俊陞(做过黑龙江省督办)吃香蕉皮的一桩笑话。当时东北对于外来的香蕉是不多见的,所以有许多人简直没有尝过,有一次吴氏到了沈阳,应几位官场朋友的请客,赴日本站松梅轩晚宴,席上有香蕉,他破题儿第一遭遇见,不费思索的随便拿了一根连皮吃下去,等一会儿,看见同座的客人却是先把皮剥掉然后吃,他知道自己吃法错了,但却不愿意认错,赶紧自打圆场,装着十二分正经的面孔说道:"诸位文人,无事不文质彬彬的,我向来吃香蕉就是连皮吃下去的!"一时传为笑柄。其实错了就老实自己承认,倒是精神安泰的事情;文过饰非是最苦痛的勾当。世上像吴氏这样硬吞香蕉皮还振振有词的虽不多见,但明知错了不肯认错,还要心劳日拙的想出种种方法来替自

己掩饰，甚至把规劝他的人恨得切齿不忘，这种心理似乎是很为普遍。这种人穷则独害其身，达则兼害天下！因为他所能接近的全是胁肩谄笑的奸佞小人，所最不能容的是强谏力争的正人君子。

听说最近被刺的军阀张宗昌生平有三不主义，第一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兵”有多少，第二是不知道他自己的“钱”有多少，第三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姨”有多少。所谓“姨”者便是姨太太。据北平传讯，他的棺材运到北平车站的时候，“内眷未进站，挂孝少妇约十六七辈，含泪坐灵棚下，柩至，乃依次出拜，伏地号啕而呼曰：‘天乎！天乎！’十余人异口同声，亦复一阵凄绝，一时哀乐呜呜，与嘤嘤啜泣之呼天声相间杂……少妇装束一致，丧服之内，露其灰色长衫，衫或绸或布，发多剪，留者仅二三人，除‘五太太’外，最长者亦不过二十五六，最年轻有正在破瓜年纪者，然丧容满面，亦皆憔悴不堪”。这里面有一点颇可注意者，这一大堆供作玩物的可怜虫大有舍不得她们所处境地的样子，在旁人觉得她们原有境地的可怜，在她们似乎还觉得不能保持原有境地之为可怜，换句话说，她们似乎情愿忍受。其实我们如作进一步的看法，在这样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之下，她们都是不知自主也无力自主的若干寄生虫而已，说不上什么情愿不情愿。

（二十一，十，一。）

三层奴隶

据北平电讯所述,"溥仪在长春为三层奴隶,百事须秉承郑孝胥,郑秉承驹井,驹井听命关东军",奴隶的生活算是很可怜的,但奴隶之下的奴隶做到三层,在奴隶中的程度可算是超等的了。此处所谓超等,也就是所受的压迫有了超等的资格。这里面的关系并非像直线的那样简单,由关东军压迫驹井,由驹井转而压迫郑孝胥,由郑孝胥再转而压迫溥仪,这似乎是一条直线的压迫系统,但在溥仪受了郑孝胥的压迫之外,同时也不能就可免受驹井和关东军的压迫,这便构成重重的压迫,最低层的奴隶所受的压迫当然是最繁重的。同一电讯里说起溥仪"每于无人时辄自堕泪"。这个可怜虫连"堕泪"都得不到自由了,其苦楚可以想见。

大家听见溥仪做了三层奴隶,以为是很可怜了,其实无

论在哪个殖民地里，凡属外受帝国主义摧残，内受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等等压迫的人民，究竟做了第几层的奴隶，倒也是一个很可研究的问题。就压迫的力量而论，帝国主义者当然是首屈一指，要推它坐第一把交椅，因为它不但能用飞机大炮直接置殖民地的民众于死地，同时还能叱咤风云似的，颐指气使着殖民地的军阀官僚们镇压殖民地的民众，动辄可以把他们捉将官里去，带上极重的脚镣，冤沉海底，哭诉无门。像某处有抗日会的青年学生，据某君最近的调查，饱享这样优遇的就不在少数。第二把交椅当然舍军阀官僚们莫属，尤其是对外不抵抗对内最善抵抗的军阀大人们，他们最显著的本领是随时可以任意奉送卫生丸一枚，干了就算了，谁能动他们的毫末？第三等座位不得不让上仰军阀官僚的鼻息，下吮劳苦大众的膏血的土豪劣绅等等老爷先生们了。所以在这种殖民地里最下层的最大多数的民众，实际上也就做了不折不扣十足道地的三层奴隶。做到了三层奴隶，如只知道“每于无人时辄自堕泪”，那是注定了只有终身在奴隶圈里苟延残喘，永无重见天日的时候！因为奴隶的解放，决不是“堕泪”的一类行为所能有丝毫希望的。

（二十二，二，十一。）

滑稽剧中的惨痛教训

做现代的中国人至少有一种特殊的权利，那就是睁着眼饱看以国事为儿戏的一幕过了又一幕的滑稽剧！寻常的滑稽剧令人笑，令人看了觉得发松，这类滑稽剧却另有妙用，令人看了欲哭无泪，令人惨痛！最近又有奉送热河的一幕滑稽剧刚在很热闹的演着。何以说是"滑稽"呢？

打算不抵抗而逃，这原也是一件虽不光明正大而总算是这么一回事，但心里早就准备三十六着的第一着，而嘴里却说得棚棚硬，别的要人们的通电演说谈话等等里的激昂慷慨其甜如蜜的好文章姑不尽提，也没有工夫尽提，就是这次逃得最快，逃得最有声色的老汤，他除偕同×××、张作相等二十七将领通电全国，说什么"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国图存之计，××等待

罪行间，久具决心……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所以值得加密圈，因为讲得实在不错也！）并堂而皇之的特发告所属将士书，有“吾侪守土有责，敌如来犯，决与一拼，进则有赏，退则有罚，望我将士为民族争光荣，为热军增声誉”等语；后来又亲对美联社记者伊金士说：“非至中国人死尽，必不容日人得热河。”他临逃时还接见某外记者，正谈话间，老汤忽托词更衣，一去不返！

逃就逃，说的话算狗屁，也滑稽不到哪里去，他却逃得十分有声有色，竟把原要用来运输供给翁照垣将军所率炮队的粮食与炮弹用的汽车二百四十辆及后援会的汽车十余辆扣留，席卷所住行宫里的宝物财产，带着艳妾，由卫队二千余人，蜂拥出城，浩浩荡荡的大队逃去！途中老百姓扶老携幼，哭声遍地，有要攀援上车的，都被车上兵士用皮鞭猛打下来！

军用的运输汽车既被扣留着大运其宝物财产，于是只得雇人力车参加征战，听说翁将军在前方迭电催请速运弹药，平方当局不得已，乃以代价雇大批人力车运往古北口，许多人力车前进虽不无浩浩荡荡之概，但和“速运”却是背道而驰的了！敌人以飞机大炮来，我们以人力车往，不是愈益显出了我国的军事当局对于军实有了充分的准备吗？

以号称十五万国军守热河，日兵一百二十八名长驱直入承德，甚至不够分配接收各官署机关，这也不得不算是一个新纪录！

这种种滑稽现象，说来痛心，原无滑稽之可言。身居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氏五日到津，谓“热战使人莫名其妙”，他都“莫名其妙”，无怪我们老百姓更“莫名其妙”了。此幕滑稽剧开演后，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氏发表谈话，谓最大原因为器

械窳劣，训练不良，准备毫无。我们也有同感，所不知者，“准备毫无”，应由谁负责罢了。

我们在这滑稽剧中所得的惨痛教训，即愈益深刻的感到只有能代表民众的武力才真能抗敌，把国事交给军阀和他们的附属品干，无论你存何希望，终是给你一个幻灭的结果。“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中国在“死地”上者决轮不到军阀和他们的附属品，像老汤的“宝物财产”，从前已喧传有一大批运到天津租界（当时有的报上说他此举正是表示抗敌决心），此次还有二百余辆汽车的“宝物财产”可运，至少又有半打艳妾（参看“生活”八卷十期杜重远先生的“前线通讯”）供其左拥右抱，这在他不但是决无自置“死地”之理，简直是尚待享尽人间幸福的人物——至少在他是算为幸福——只配挨“皮鞭猛打”的老百姓，和这类军阀乃至他们的附属品，有何关系？他们的最大目的就只为他们的地盘，私利（老汤从前一面对国内宣言尽职守土，一面对日方表示抑制义军，本也为的是自己地盘，等到地盘无法再保，便逃之夭夭），什么国难不国难，关他们鸟事！

无论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势力，都不过在加紧的自掘坟墓，被他们“置之死地”的大众，为客观的条件所逼迫，必然要起来和他们算账的。大众努力的程度，和他们解放的迟早是成正比例的，中途的挫折和困难，不但不应引起颓废或悲观，反应增强努力的勇气，增加猛进的速率。

（二十二，三，十一。）

废　话

“最爱说废话的，要数一般要人……天天充满报纸的，大都是他们的废话——谈话、演讲、通电、宣言，等等——他们的目的，无非为出风头，表白自己，敷衍人民，攻讦仇敌，或其他私图。所说出的话尽管表面满漂亮——多数是笨的——然而全非由衷之言，令人一见而知其是空虚的，所以不但不能动人，反而使人肉麻。”这是一位先生最近在“独立评论”上“中国的废话阶级”一文里说的几句话。办日报的朋友们最苦痛的大概莫过于天天要把这类“全非由衷”“使人肉麻”的废话，恭而敬之的记着登载出来，替他们做欺骗民众的工具。

“对日抵抗决心，始终一贯”，“抗日大计已早经决定”，这已成为要人们的口头禅了，这一种好像呕出心血说的话；

在充满了苦衷的要人们总常怪“阿斗”们不知体谅，殊不知这个症结所在实际不是“阿斗”们的过于愚蠢，却在今天放弃一地，明天又放弃一地的事实摆在面前，胜败原是兵家常事，本不能即作为是非的标准，也不能作为决心是否始终一贯和大计是否早经决定的测量器，不过在“准备反攻”和“防务巩固”等等话头闹得震天价响的当儿，事实上的表现却是“新阵地”源源而来(所谓“新阵地”者，即每放弃一地之后，退到后面一地的好名称)，非“安全退出”，便是打什么“退兵战”!(这些都是最近报上战讯专电中新出现的新战术名词。)所谓“决心”，所谓“大计”，非废话又是什么呢?话的废不废，最好的证明是拿事实来做证据。我们只须把报上所遇见的要人们的话和事实比较一下，便知道废话之多得可观!

说废话的人也许沾沾自喜，以为得计，其实废话和空头支票是难兄难弟；空头支票所能发生的结果是信用破产，废话所能发生的结果也并不能达到说话人所希望的目的——欺骗得过——唯一的结果也只是信用破产。俗语所谓“心劳日拙”，实可用以奉赠最爱说废话的要人先生们。

(二十二，四，二十九。)

国事紧张中的言论自由

国事越紧张，民众对于新闻的消息和时事的评论也格外地注意，所以因事实上的要求，言论自由也成了很引起民众关心的一个问题。这次"五全大会"对于这一件事的提案有"开放新闻恢复言论自由案"，在题目上有着"开放"和"恢复"的字样，在目前的事实上是什么情形，已可看得出了。据报载这提案的审查意见，认为："一、以后对于宣传方法，力加改善；二、重订取缔新闻营业办法，严订编辑记者之资格，与最低限度之基金。""拟交主管机关，于修订法规时，切实注意。"这样办法，对于言论自由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呢？

所谓言论自由，就新闻业的观点看来，最简单的是真实的消息要让民众看得到，正确的评论要让民众听得到，照现在的实际情形，民众很关心外交消息，而在报纸上就老实找

不到这种消息；民众很关心到底当局对于时局有何办法，而在报纸上也得不到要领。诚然要民众“共赴国难”吗？那至少要让民众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的民众却好像蒙在鼓里，透不过气！结果中国人对于本国报纸的信用简直完全丧失，反而要设法从别方面探听消息，你一句我一句地乱猜一阵；在中国的外国报纸是享有特权的，说来可怜，中国人要寻点真消息，反而要看在中国的外国报上的消息或评论，因此中国报的销路往下跌，而在中国的外国报的销路却突然大增。闭塞中国人民的耳朵眼睛的负责人，徒然间接地替外国报增加权威。当局希望人民“以常识判断谣言，以镇静观察时局”，其实只有“开放”真确的消息，才能使人民知道什么是“谣言”；只有知道真确的策略的人，才有“镇静”的可能。

严格说起来，与事实符合的真消息，和确能反映大众公意的言论，是无法终于压迫下去的。例如德国，对于压迫言论和钳制新闻方面也煞费工夫，但是民众究竟不是可以欺骗到底的，德国的报纸“现在存在的销数，大都跌落过去的一半或不到一半，因为德国的数百万读者，已经不愿阅读那种除掉登载些屡次重复的奴才化的字句别无他物的报纸。现在德国的人民自己都不信任在德国出版的报纸杂志和书籍”（见奥国 Neues Wiener Tagblott“德国新闻业的衰落”一文）。记者不久以前在德国亲听德友说起，要找真消息，只有看外国报。可见任何国的民众对于真确的消息和正确的言论是无孔不入地寻觅着，要把无法压迫下去的东西硬要压迫，这是劳而无功的。

（二十四，十一，二十三。）

群

一个人的思想言语行动，你如果仅从他个人的观点看去，往往得不到彻底明确的了解，因为任何人的思想言语行动都受着他所属的那个群的影响，或受着他所效劳的那个群的影响，你如能注意到他所属的群，“思过半矣”！在国外视察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新闻事业文化事业各方面的实况，仔细分析，在表面上可见的虽是某某个人，在骨子里都不过是这一群的代言人，或那一群的代言人。例如德国的“纳粹”领袖希特勒，有许多人觉得不解，他在党纲里明明说要把大企业归国有，以“国家社会主义”自命，而上台后却一个字不能实现，反而请着十二位剥削系统中的“大王”统制全国的各工业部门，压迫劳苦大众，为资产者群效劳。其实希特勒根本就是这些“大王”的那一群的代言人，为的就

是这一群的利益。党纲上的话不过是在未上台前用欺骗手段，来获得一部分受欺骗的民众的拥护罢了，有什么可怪！墨索里尼的后面有他所效劳的群，包尔温后面有他所效劳的群，罗斯福后面也有他所效劳的群。

资产者群为着资产者群的利益而挣扎，劳苦者群为着劳苦者群的利益而斗争，这在各群里面的人看来，各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在为资产者群供奔走的鹰犬，在劳苦者群看来是该死的家伙，而在他的本群的人看来，却是不折不扣的忠臣！这样看来，抽象地说这个人怎样勤奋，那个人怎样能干，乃至怎样忠实，都做不得标准。因为先要问他所效劳的是哪一群？他所关心的是哪一群的利益？效劳于剥削者群的人愈勤奋，愈能干，愈忠实，在被剥削者群方面却视之为更大的敌人。又例如教育家，大概没有不以“乐育英才”自慰的罢，但是他所“乐育”的是替剥削者群造奴隶或鹰犬呢？还是替劳苦大众造斗士呢？这里面就大有“差以毫厘，谬以千里”的区别了。

苏联在现阶段是工人的国家，这是大家知道的。我在苏联视察各种机关——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等——的时候，最感兴趣的是他们有所谓“社会的组合”(Social Composition)更明白些或可叫做“社会的成分”。例如他们在一地所举出的市政府，或任何代表机关，或一个学校，都要注意其中的成分有百分之七十或八十是工人或工人的家庭出身的，此外有百分之二十几是农民出身，百分之十左右是雇员出身(近于他国的小资产者群)。他们认为在现阶段中这种“社会成分”的工人比率愈高，愈是健全，否则须有整顿的必要。这是他们在现阶段中巩固工人群以执行历史使命而建设新社会的办法。他们这革命先锋的群的组织怎样注意严

密,怎样提防各种机关里"社会成分"的不健全,以免妨碍新社会的建设工作,的确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群的力量是很大的,大众的群不严密,营垒不严整,反大众的群为着他们本群的利益便要乘机破坏的。

(二十五,一,十一。)

国际闻名的黄柳霜

在美国献身银幕的中国女明星黄柳霜女士最近从美国初次回到祖国。美国的影片风行全世界，因此好莱坞的明星是全世界的电影观众所瞻仰的。中国得到一个国际闻名的电影界艺人，原是一件很可欣幸的事情，对她这次回到祖国来，原应该表示欢迎的。但是莫大的憾事是黄女士所演的影片，却是接二连三的侮辱中国的影片，所以她在海外时，中国人对她就没有好感，甚至引起痛恨的情绪。有人说她因为生长国外，对于祖国的情形隔膜，似乎情有可原，但是影片中侮辱中国的意味，是有常识的任何人所能感觉到的，这理由也不充分。例如在她所参加的“上海快车”一片里，侮辱中国的情形令人发指，说她因未回过祖国便不知道是侮辱，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欧美各国的一般人民对于中国，因帝国主

义对于被压迫民族的侮辱宣传,对中国民族的印象已很不好,现在有了中国产的明星加入渲染,他们更可认为是铁证,这是个人对于毁坏自己民族的难以宽恕的罪过。黄女士这次回国,民众方面对她很淡漠,应该可使黄女士得到一个教训,翻然觉悟。我们很诚恳地希望她以后能以国际闻名的艺人地位,替中华民族在国际艺术界上获得相当的光荣,第二次回到祖国时,值得我们的热烈的欢迎。

我们看到黄女士虽得到国际闻名的明星地位,而对于她的民族,——至少在以前——不但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只留着令人慨叹的遗迹。我们不禁想到也有中国的学者在国际学术界上很知名的,不利用他在国际上所获得的声誉,替正在努力争取解放中的中国民族说些有力量的主持正义的话,却发表些灭自己的志气长他人的威风的议论,献媚帝国主义,取悦军阀官僚,这在民族方面是多么大的一个损失!是多么可以痛惜的一件事情!

领 导 权

近来常听见有人提起“领导权”这个名词，也常听见有人说某某或某派要抢领导权云云，好像领导权是可由少数人任意操纵，或私相授受似的。这种人的心目中所认为领导权，只想到领导者，只知道有立于领导地位的少数个人，把大众抛到九霄云外！于是他们便存着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以为领导权是从少数人出发，大众只是受这少数人所“领导”。随着这个错误的观念，他们又有着一个很大的误解，常常慨叹于中国大众的没有力量，梦想着好像可以忽然从天空中掉下来的“领袖”，然后由这个“全知万能”“生而知之”的“领袖”来“领导”大众；以为大众只配受这样高高在上和大众隔离的“领袖”所领导！

其实领导权在表面上似乎是领导着大众，而在骨子里

却是受大众所领导，大众才是领导权所从来的真正的根源。

我在莫斯科时细看他们的革命博物馆，看到革命进程中每一个运动的事实的表现，都觉得领导中心之所以伟大，全在乎能和当时大众的要求呼应着打成一片；换句话说，领导中心是受着大众的领导，也只有受着大众领导的中心才能成其为领导中心。

谁都不能否认列宁和他的一群是苏联革命的领导中心。他在一九一七年发动革命时所提出的标语是土地、面包、和平。当时克伦斯基政府无力应付经济危机，仍和协约国进行帝国主义争夺的战争，对于民生的艰苦，农民土地问题的急切待决，都毫不顾及。而列宁在当时所提出的三大主张：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不参加帝国主义的战争，恰恰反映着当时大众的迫切要求；接着主张"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又是达到这三大主张的唯一途径。列宁在当时能根据大众的真正要求和可以达到这真正要求的途径努力干去，这不是很显然地是受着大众所领导吗？这不是很显然地表示他的领导权不是和大众隔离而是发源于大众的吗？所以在表面上列宁和他一群似乎是在那里领导着大众向着正确的路线前进，而在骨子里却是他和他的一群受着大众的要求所领导而向前迈进着。他的伟大是在乎他能认清大众的要求和用来达到大众要求所必由的正确路线，并不是离开大众而能凭着什么领导权而干出来的。而且在他认清大众的要求和用来达到大众要求所必由的正确的路线后，也还要靠着大众自身的共同奋起斗争的力量而才能获得成功的，并不是抛开大众的力量而能由少数人孤独着干得好的。其实果然能依着大众的要求而努力的，决不会得不到大众的共同奋斗的力量；怕大众力量抬头，用种种方法压迫大众

力量的抬头，正足以证明这些人为的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一群的利益，所以提防大众如防家贼似的！和大众既立于相反的地位，摧残蹂躏大众之不暇，还说得上什么领导大众呢？果要领导大众吗？必须受大众的领导！

（二十五，一，二十五。）

糟　　蹋

糟蹋是反动派的惯技!

例如帝国主义的国家对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便极尽糟蹋的能事。他们当然不是“为糟蹋而糟蹋”，却有他们的动机。他们因为要欺骗麻醉本国的民众，使本国的民众觉得本国统治者群压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行为是应该的，是正当的，是“传布文明”的，就不得不用种种的宣传方法，把那些地方的人民形容得异常野蛮，异常残忍，异常愚蠢，异常可恶。在伦敦有个蜡人馆叫做杜索夫人展览会(Madame Tussaud's Exhibition)，在地窖里设有所谓“恐怖室”，悬有杀头的惨像，上面赫然用大字题着“在中国的杀头”。(该处为伦敦名胜之一，看的人很多。)我们固然不拥护杀头——虽则杀尽汉奸的头却是痛快的事情——可是好像杀头这件事

只存在于中国，用这样的布置来暗示中国人特别残忍成性，显然地存着糟蹋中国民族的用意。我在伦敦时，各报正纷载希特勒杀两个美丽的本国女侦探的头，但是那个“恐怖室”里并不敢悬上一个“在德国的杀头”的像片。似乎只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活该受这类的糟蹋。他们以为尽量地糟蹋被压迫的民族，可以永远使被压迫者处于奴隶的地位，其实被糟蹋得越厉害，力争解放的情绪也愈迫切。

旧制度的国家的统治者群对于新制度的国家，也极喜用他们的宣传工具——报纸和杂志——痛做糟蹋的工夫。你在西欧各国的报纸和刊物上，常常可以看到糟蹋苏联的种种“新闻”。在苏联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集体农场大告成功，农产品日见丰富的当儿，他们竟敢闭着眼睛大造苏联农民整千整万饿死的消息！但事实胜雄辩，到苏联游历的人一天多一天，他们的造谣徒然损失自己的信用罢了！伦敦最反动的报纸之一的“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除常常造谣诬蔑苏联外，还常常登载攻击苏联领袖们的私生活的消息。我到苏联仔细调查后，知道都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谣传，都是有意的糟蹋。其实苏联新社会建设的突飞猛进，苏联领袖们领导苏联大众对于新社会建设的继续努力，都有事实的表现，并不受这样糟蹋的丝毫损伤。

上面所说的是国际上常见到的一种怪现象。但是在一个国度内，反动者群也喜欢用这同样的手段。他们对于新运动，想出种种糟蹋的“新闻”，尽量宣传，使人觉得除了“杀人放火”“洪水猛兽”的印象外，无一是处。他们对于所欲得而甘心的个人，也惯用这同一的“技巧”，由他们直接间接的走狗们造出种种谣言攻击他的私生活；尽瘁于社会事业的人无论怎样艰苦，只须他的事业不便或有碍于反动者群的利

益，他们便可造谣诬他怎样“收入巨大”，怎样“服食华贵”，乃至怎样“举动腐化”。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使他在民众间失却信用，便可替他们的主子拔去一个眼中钉，是多么好的策略！我知道朋友里面因努力于民众的工作而受到反动者群的糟蹋暗箭，不乏其人。糟蹋者心劳日拙，终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其实只须自问没有假公济私的亏心事，自问确是以赤诚努力于所认为有益于大众的事业，不但不怕什么，而且要更勇敢地往前干去。

（二十五，二，一。）

个人的美德

有一位老前辈在某机关里办事，因为他的事务忙，那机关里替他备了一辆汽车，任他使用。有一天他对我说，他想念到中国有许多苦人，在饿寒中过可怜的日子，觉得非常难过，已把汽车取消，不再乘坐了。我问他什么用意，他说改造社会，要以身作则。他这样做是要把自己的俭苦来感化别人的。我说我很怀疑这种"感化"的实效究竟有多少，因为许多"苦人"根本就坐不起汽车，用不着你去感化；至于上海滩上的富翁阔少，买办官僚，决不会因为你老不坐汽车，他们也把汽车取消。就是我这样出门只能乘乘电车，或有的地方没有电车可乘，因为要赶快，不得不忍心坐上把人当牛马的黄包车，也无法领略你老的"感化"作用。他听了没有话说。

就一般说，这位老前辈算是有着他的个人的美德，但他

要想把这“个人的美德”的“感化”作用来“改造社会”，便发生我在上面所说的困难了。他真正要想改造社会，便应该努力促成一种社会环境，使白坐汽车的剥削者群无法存在，劳苦大众在需要时都有汽车可坐，这才是根本的办法；但是这种合理的社会环境是要靠集体的力量实际斗争得来的，决不是像“取消汽车，不再乘坐”的“个人的美德”所能由“感化”而造成的。

有人羡称列宁从革命时代到他握着政权以后，只有着一件陈旧破烂的呢大衣，连一件新大衣都没有，叹为绝无仅有的个人的美德，好像要想学列宁的人只须学他始终穿着一件破旧的大衣便行！其实列宁并非有意穿上一件破旧的大衣来“感化”什么人，他的伟大是在能领导大众为着大众革命，在努力革命中忘却了自己的衣服享用，恰恰是无意中始终穿着一件破旧的大衣。倘若不注意他为解放大众所积极进行的工作，而仅仅有意于什么个人美德的感化作用，那就等于上面那位老前辈的感化论了。无疑地列宁决不是要提倡穿着破旧的大衣，他所领导的革命成功之后，劳苦大众不但无须穿着破旧的大衣，而且因社会主义建设的着着成功，大家还都得穿上新的好的大衣！

我在德国的时候，听见有人不绝口地称赞希特勒的俭德，说他薪俸都不要，把它归还到国库里。我觉得他的重要任务是所行的政策能否解决德国人民的经济问题，是否有益于德国的大众，倒不在乎他个人的薪俸的收下或归还。老实说，像我们全靠一些薪俸来养家活命的人们，便无从领受这样“个人的美德”的“感化”。

我们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个人的美德，更不是说奢侈贪污之有裨于社会，不过鉴于有一班人夸大“个人的美德”

对于改造社会的效用，反而忽略或有意模糊对于改造现实所需要的积极的斗争。

(二十五,二,二十九。)

“生活日报”创刊词

无论办什么定期刊物，或是周刊，或是日报，都有创刊号，在创刊号里都有创刊词，几乎成了惯例，毫无足奇的了。但是我们叙述这篇创刊词的时候，却感觉到非常严重的情绪和非常重大的责任；这是因为本报的产生正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最迫切的非常时期。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凡是中华民族里面不愿做奴隶的每一分子，都有他的对于民族应负的特殊任务，在舆论界服务的报人们同样地也有着他们的特殊任务。

普通社会一般人给与报人的头衔，叫做“民众喉舌”。我们不必讳言世上尽有报人做豢养他的主子的“喉舌”，和民众恰恰立于敌视的地位；但是就原则上讲，报人应该是“民众喉舌”，那却是无可疑的。平时这样，在非常时期更应该这

样。同人愿以自勉的第一义，便是以全国民众的利益为一切记述评判和建议的中心标准。

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

全中国民众在当前所焦思苦虑、梦寐不忘的，是争取中华民族的平等自由，是要避免亡国奴的惨祸。我们做中国老百姓的人们，不管张三李四，不问何党何派；在行动上抗敌救国的便是全国民众的好友，在行动上降敌卖国的便是全国民众的仇敌；今日在事实上表现抗敌救国的是友，明日在事实上降敌卖国，就即时是敌，“敌乎友乎”，全以是否在行动上或事实上抗敌救国为转移。我们认为须用这样的态度，从各方面扩大民族解放的阵线。

其次我们要郑重指明的是民族解放的斗争是大众的事情，不是少数人的事情；和某一国内的少数特权阶层对别一国内的少数特权阶层争夺少数人利益的斗争是不同的，和某一军阀对另一军阀的争夺个人利益的斗争是不同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争取的是民族大众的利益，所以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揭破汉奸理论的麻醉，制裁汉奸疯狂的行为，灌输抗敌救亡的知识，指示抗敌救亡的实践。我们要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广大巩固的基础，必须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使大众集中力量对民族的内外敌人作无情的坚决的猛攻与扫除。

我们要就纯粹民众的立场，力求这两大目的的实现。

（二十五，六，七。）

大赦政治犯的基本认识

据南京电讯，冯玉祥氏前在五中全会所提出通过的大赦全国政治犯案，各方面对此也很表赞同，现在正由司法部草拟办法，完竣后交立法院审核，一经修正，便要交中常会审议通过。但据说孙院长因事件重大，短期内或许还无兑现希望。关于这件事，社友平凡先生已于昨天的本报(按指“生活日报”。——编者)短评里有所论述。我们觉得这件事在当前救国运动中实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全国舆论界应努力督促这件事的迅速实现，所以不厌求详，再就我们管见所及，提出贡献，希望全国同胞，共同起来提倡。

第一，我们要达到抗敌救亡的目的，必须发动整个民族的力量来应付，这个原则，现在已是全国一致的呼声了。因政治活动而得罪的人们，就一般的说来，为的都是国家社会

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私利，所以在国际法的惯例，各国对于别国的政治犯大概都给与保护。而且不为个人的私利而为国家社会利益努力奋斗的人，他们的聪明才智往往也比较的优越。在整个民族的力量里面，人力当然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在中国国难严重迫切的今日，大赦政治犯，使许多热心国事才具优越的人们，都有参加救国工作的机会，这里面实含有很积极的意义，并不仅仅是释放政治犯的消极的意义。谁都知道全国各处的政治犯牢狱里，关闭着不少热烈英俊的爱国青年，这都是整个民族力量里面的一部分的精华，释放之后，对于救国工作必有相当的贡献。

第二，在政治犯里面，有些是没有任何党派关系，只是因爱国活动而得罪的，这固然是应该无条件地释放；还有些政治犯是有着党派关系的，在当局者也许要顾虑到有党派关系的政治犯释放之后，他们又要干起他们的党团工作；但是我们以为在抗敌救国联合阵线的大目标下，无论属于任何党派，无论有着任何信仰，都应搁置一切，共同团结起来抢救中国的危亡，所以就是原来有党派关系的政治犯，在国难严重的今日，在全国民众一致主张联合阵线的今日，也应该无条件地释放，使他们也有机会来参加救国的工作。抗敌救国联合阵线既是全国民众的一致要求，既是中国今日在主观客观各方面所迫切需要的救国策略，任何党派倘若不顾这个铁一般的现实，来破坏这个救国联合阵线，必然地要为全国所共弃，在事实上不会发生什么力量。明白了这一点，大赦全国政治犯便应该毅然地执行而不必再有所顾虑了。

（二十五，七，六。）

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

我在苏联视察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运动大检阅”得到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对于那个“运动大检阅”的“大”字的意义。我是在莫斯科看见的。寻常我们想起什么运动会，注意力只集中于若干所谓选手，选手的数量无论怎样大，只是“小众”，一点寻不出“大众”的象征。我那次在莫斯科看到的“运动大检阅”，便有十几万的男女青年“运动员”参加。整千整万的穿着运动衣的列队挺胸紧步的男女健康青年，使你不得不为之精神振作，想到体育大众化的伟大。他们有大规模训练“运动员”的计划，经过许多类的体育试验及格后，给以 GTO 的铜质徽章（GTO 是俄文“为工作和防卫而准备”的缩写），这徽章是他们的男女青年觉得最大荣誉之一。在一九三二年（即第一次五年计划的末年）他们的这样的“运动

员”有六十万人，一九三三年增加到六百万人，一九三四年的上半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人！依这样大众化的进步速率，最近的数量一定是更可惊的了！

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新时代的最最重要的象征！

我认为这个重要的意义应该运用到大众文化上面去。我们在这样艰危的时代，应该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有一个新的动向，必须有一个新时代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的方式和内容值得我们作更周详地研究和讨论，但是我深信这个新文化必然地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是要大众化，是要不忘却大众，是要切合于大众的真正需要，是要能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转变到一个新阶段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希望全国的文化人以及热心中国文化的朋友们都对这个问题加以严重的注意和切实的研究。

所谓大众的“大”，不是高大的“大”，却是广大的“大”。犹之乎上面所说的“运动大检阅”，不是注重在少数的选手，而是注重在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的广大数量的“运动员”。为大众设想，与其只有少数处于“高大”地位的选手，不如有着满山满谷的无限“广大”数量的“运动员”。在我们的新文化方面，也有这相类的情形。换句话说，我们要极力使我们文化工作能影响到大多数人，影响的范围越广大，文化的功效也越广大。举个最近的现实例子：例如整千整万的大众所热烈参加的民众唱歌团(原名民众歌咏团，陶行知先生建议改为今名，我觉更大众化些)，便会有这样的意味。民众唱歌团便是推广大众文化的一种很好的工具。我们试想，如有几万几十万人，同时参加一个悲壮雄伟的民众唱歌团，这是怎

样伟大的文化工作!

当然,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民众唱歌团,只是大众文化工作的一部分。我以为我们办任何文化事业,都要特别注意广大的群众,都要极力使我们的工作能深入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中国文化界有个很大的危险,那便是"关门主义",守着千篇一律的宗派的方式,隔膜的理论,不顾到中国大众的现实需要和容受的力量,因此把它的影响范围越缩越小,简直和大众不相涉。文化工作是为着少数人干的呢?还是要为着大多数人才干的?我们先要认清这个基本问题!

(二十五,六,二十八。)

简易文字与大众文化

去年逝世的名记者戈公振先生,当他初由苏联回到中国的时候,就和记者谈起他游历苏联远东境内所亲见的奇迹;这奇迹不是别的,就是看见那里的中国人因学习了很简易的新文字,一个很平凡的工人或农民都能做文章发表他的意见,都能阅看他所要看的书报!戈先生和记者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看到他那样眉飞色舞的模样,知道他实在充满着十分惊喜的情绪。他的惊喜,的确不是偶然的。关于我国的一般民众的教育,常常听人说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过了几时,仍听说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我们到国外去旅行,关心中国国民教育的外国朋友总喜欢问起中国是否仍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我们的回答就很难于措辞,因为总是说着百分之八十,不是要汗颜无地的吗?所以戈先生的惊喜情绪,

记者和他是有着十二万分的同感。所可痛的是戈先生还未及用文字或演讲公开对国人报告他所见的奇迹,回国后匆匆不到几天就与世长辞了。

最近看到孟如先生译的“新文字在中亚”一文,又引起我想到简易文字和大文化这个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据这篇文章作者的报告,在苏联有许多原来文字艰难、文化落后或甚至连文字都没有的民族,因为几年来采用了简易的新文字,大众文化已有着空前的进步。据全苏联新文字委员会的报告,一九三五年,在苏联已有三十万万份报纸和三万两千五百万册的书籍杂志,都是用新文字出版的。由这样可惊的数目字里,可以看出苏联大众文化是怎样地在那里突飞猛进着!同时也可以看出得易文字和大众文化的发展是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

记者在上面提起我们在外国旅行,不好意思讲到中国文盲的数量。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俄国也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是文盲,比我国也不高明得多少。尤其是在当时俄国的被统治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是文盲。例如在土库曼,文盲竟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三;在塔吉克斯坦,文盲竟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五!但是经过这些年来的努力采行新文字,土库曼的识字人数已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四,塔吉克斯坦的识字人数已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三了。

苏联采用新文字的方法,到现在还不过七年的时间,简易文字在大众文化方面的惊人贡献,不是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教训吗?

(二十五,七,八。)

民众歌咏会前途无量

我们愿竭诚拥护民众歌咏会！我们希望民众歌咏会无限量的扩大，无限量的推广！我们敬祝民众歌咏会的前途无限光明！我们敬向为民众歌咏会努力的先生们致民族解放的无上敬礼！

香港民众歌咏会于本月二十日夜里在青年会露天体育场举行第一次公唱，参加唱歌的会员四百余人，听众三千余人，采用的歌曲有"自强歌"、"升旗歌"、"中华"、"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国旗歌"、"尽力中华"、"抗敌歌"、"大路歌"、"一二八纪念歌"、"人生要奋斗"、"大家起来"等十八首，由香港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编刊小册子分发。歌声雄壮激越，听众动容奋发。在重重国难中愁云惨雾笼罩下的我们，看着这样悲壮激昂热血奔腾的民众，好像在茫茫黑暗中窥见曙光一线，兴奋和愉快的情绪交并，有非笔墨所能

形容的。当然我们并不是相信只须聚拢来唱唱歌，便能消除国难。但是我们相信整个民族的解放，必须靠全国民众都能明了国难严重的实际情形，能有为国家民族牺牲的精神。这就不能不十分注意于教育民众，唤醒民众，鼓励民众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要积极推广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所谓大众文化，必须领会“大众”这个名词的重要，必须时刻注意到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接受性，同时不要徒然高唱大众文化的空洞名词，必须设计种种具体的方法促进大众文化。民众歌咏会便是很能促进大众文化的具体方法的一种。香港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所编的“民众歌咏会公开演唱”的小册子里的宣言说得好：“我们深信，只要不是哑子，什么人都能唱歌，只要愿意学，什么歌都学得来。我们更深信，雄壮的歌声，不独能够振起消沉的民气，唤醒国民的迷梦，同时更能震惊列强的耳鼓，使他们在忙乱的备战声中，听见我们反抗的呼声。实在的，同胞们！东北沦亡了，冀察又丧失了，整个的华北都要被占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可能再忍吗？……我们要起来，像狮子般的怒吼……来唤起团结的精神。”

其次，这种大规模的民众歌咏会，除有教育民众，唤醒民众的效用外，还可以使民众深深地感到集体的伟大力量。一个人的声音是轻微无力的，千万人的集体声音便要响彻云霄，有着排山倒海的气概了。这足以暗示整个民族一致团结抗敌救国的伟大力量的象征，能够培养并增加我们的艰苦奋斗的勇气。

我们希望民众歌咏会普遍到全中国，我们愿听到十万百万的爱国同胞集体的“反抗的呼声”！

(二十五，六，二十二。)

悼世界文豪高尔基

记者因为写过了二十万字左右的世界文豪高尔基的传记，对于他的生平有过很感兴味的研究，前年在欧洲游历到莫斯科的时候，很想和这位久所钦仰的文坛老将谈谈，不料他正在别处旅行未回，竟错过了这个机会。不过当我在苏联游历的时候，听到许多朋友谈起，知道他真是苏联的"国宝"。你无论遇着什么乡村的妇女，或田间的小孩，提起高尔基，他们都知道，他们都要一团高兴地和你谈论关于他们所心爱的高尔基，都要手舞足蹈地告诉你关于他们所心爱的高尔基的这样那样。这种情形使我愈益感觉到他是大众的文豪，和那些只供少数人消遣的所谓文学家，大不相同。其实他在文坛上四十几年的努力，不但为了苏联的大众的利益，同时也为了世界的大众的利益，所以他不但是苏联的文豪，也是世界的文豪。我们听到他去世的不幸消息，不但为

苏联怜惜这位文坛大将，并为世界悼惜这位文坛大将。

高尔基的一生，最使我兴奋的，是他的始终不倦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五岁便做了孤儿，十龄便投身社会，在一家鞋店里当学徒艰苦备尝。不久他在一个绘图师的家里做“打杂”，他的主人有个母亲，一个长舌的老太婆，一早就把高尔基叫醒，一直使他忙到深夜。他要劈柴搬柴，要烧茶水，要起灶火，要擦地板楼梯，要洗碗碟，要摘菜，要从市面上把菜物搬回来，还要替主人抱婴孩，洗一家人的衣服！这时候，高尔基才十二岁！他又做过神像店的学徒，做过糕饼店的学徒，做过守夜，做过码头脚夫，还做过许许多多下层民众的苦工。他在糕饼店里做工，每日要做十四小时的好像地狱生活的苦工，每月仅得到三个卢布的工资。我们读到他的奋斗史，好像读着不可思议的神话。但却都是事实，千磨百折的可惊的事实。这些事实都不能把高尔基压下去，他终于排除了万难，成了今日全世界大众所敬慕的文豪。

他的原名叫做阿列克塞·皮什柯夫(Alexey Peshkov)。他二十三岁的时候，在梯弗里斯的铁路上会计处做个小职员，工馀自己读书，开始尝试创作，第二年九月(即一八九二年，他二十四岁)，第一次把他的小说“马加尔·楚德拉”发表于当地的“高加索”日报，才第一次用他的笔名玛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这位“下流社会的代言人”的为大众福利的著作生活便开始了。他四十几年的著作生活，作品的丰富，是很可惊人的，继续不断的努力也是很使得我们闻风兴起的。

我最喜记诵他在所著的“鹰之歌”里面的警句：“我们唱着歌，赞美傻子的勇敢！”在中国——这样危迫的中国——我们所需要的是无数“傻子的勇敢”！

(二十五，六，二十。)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总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一个人所承认的理论和他的行为之间有必然关系。这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实践不会和他的理论发生矛盾，却是说倘若这两面有了矛盾，必有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却是和实践有着密切关系的。最简明的例子是说谎。倘若我说我未曾做某事，而在实际上我却做了，那末我的理论和行动之间显然便发生了矛盾。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矛盾？这里面便有着它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却是和他的实践有着密切关系的，不是理论的。任何有意的说谎，总有一个为什么要这样说谎的实际的理由。有的时候，说谎是出于无意的，说出的话不但欺骗了别人，同时也欺骗了自己，通常叫做“自欺”。“自欺”当然不是出于有意或心里知道，却是由于不知不觉中受着自己成

见的影响。受着潜伏着真正的动机所影响。这种毛病，常人是很容易犯的。例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人们对于他们所本来讨厌的人，评判得特别苛刻。他们自己以为在说老实话，而在旁观者清的我们，却知道他们的偏见是受着他们对于这个人的厌恶心理所影响，而他们的这个厌恶心理却是有着实际的理由，不是理论的。所以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并不是说理论和实践总是能彼此融合的，却是说这两面有着必然的关系；倘若这两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必然都有着实际的理由。换句话说，理论常为实践所决定。

这样看来，一个人自己在嘴巴上承认的所信仰的东西，未见得就是真正信仰的东西，甚至有许多人自己还莫名其妙，不觉得自己是在欺骗自己！但是遇着这样的情形，我们怎样能判断这个人究竟真正信仰什么呢？我们不能根据他所说的或是他所想的，必须观察他在行动上所表现的是什么。我们如看见任何人的行动和他所自认的信仰矛盾，便立刻可以判断他并非真正信仰他所自认的原则。你如要知道他真正信仰什么，你必须研究他的行动上的表现，不能仅靠研究他说些什么或想些什么。

这个原则似乎是很简单明了，人人可以同意的。但是我们如把这个基本原则应用于实际，便有很重要的意义。例如我们对于任何政党，或任何集团，或任何个人，不能仅看了他们嘴巴上所承认的党纲或理想，便相信它是真确的，必须坚持地把他们所自认的理论和他们在行动上的表现比较比较。你如果要知道一个政党究竟代表了什么，你必须很不怕麻烦地仔细研究它在行动上的表现究竟是什么。例如有自命什么主义的政党，我们仔细研究它在行动上的表现不但不能实现它所标榜的主义，而且是反而要阻碍这个主义的

成功，那末我们便可断言这个政党不是这样主义的政党。不但如此，我们发现理论实践不符的时候，还要研究这里面所潜伏着的实际的理由。你并且可以发现这个实际的理由总是含着有欺骗的作用，无论是出于有意的、自觉的，或是出于无意的、不自觉的。因为决定这个政党的行动是有它的真正的动机，不是该党所承认的动机，无论这真正的动机是否主持该党者所自觉，但是对于一般人是具有欺骗的作用却是一样的。行动既然决定理论，我们要信任任何政党，我们所要注意的不是他们说要做什么，或想要做什么，却是在实际上他们做什么。不但我们对于任何政党要这样，对于任何集团或个人的观察，都应注意这基本的原则。

实践决定理论，真正的理论也有着领导行动的功用。所谓真正的动机，跟仅在表面上标榜着而实际上和实践不符的理论或动机不同，是指真有领导实际行动的理论或动机，虽则在行动者的本人有的是自觉，有的是不自觉的。倘若一个人不知道他的真正的动机所在，那末他的行动是盲目的，盲目的行动有着很大的危险性，因为理论是实践的眼睛。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理论来做行动的基础，同时要使实践和理论融合起来。

（二十五，六，十四。）

从现实做出发点

“理想为事实之母”,这句话好像是很合于真理的,尤其是因为很耳熟的一句成语,我们往往不加思索地把它认为确切不变的真理。其实我们如仔细思量一番,便知道这句话有着语病,因为很容易使人误会,以为理想是可以超越现实而凭空虚构的,不想是自古以来任何大思想家的理想,都有他的现实的社会背景,都有事实之母,而不是凭空产生的。由事实产生的理想,再由这理想而影响到后来的事实,这诚然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由这样的观点看去,说“理想为事实之母”,这句话原也讲得通,但是还不可忘却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便是要在现实上运用这个理想,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必须顾到当前的客观的事实,不是能够抛开你当前的现实而可以立刻或很顺利地实现你的理想。

哲学家的重要任务是要改变世界，而不是仅仅用种种方法解释世界。人类是能够改造历史的。所以我们要推动历史巨轮的前进，不可屈服于现实，必须负起改造现实的使命，但是要改造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不能抛开现实而不顾，这是很显然的。例如你要改造一所屋子，你必须根据这所屋子的种种实际的情形设计，无论如何是不能抛开这所屋子而不顾的。

我们倘若能常常牢记着我们是要从现实做出发点，便不致犯近视病的苦闷，悲观，为艰苦所克服的等等流弊。

我们闭拢眼睛静思我们理想中的中国，尽管是怎样的自由平等，愉快安乐，但是你要实现这个理想，必须从现实的中国做出发点；现实的中国不能这样完全的，是有着许多可悲可痛的事实，是有着许多可耻可愤的事实，我们既明知现实的中国有着这种种的当前事实，又明知要改造中国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便须准备和这种种事实相见，便须准备和种种事实斗争，这是意中事，是必然要遇着的；从事实做出发点的斗争，决不是没有阻碍的，有阻碍便必然地有困难，解决困难也必然要经过艰苦的历程，这是意中事，也必然要遇着的。其实中国如果是已像我们理想中的那样完全了，那就用不着我们来改造；改造时如没有阻碍，没有困难，那也用不着我们来斗争。倘若你一方面要改造中国，要排除阻碍，解决困难；一方面却因中国的糟而苦闷，悲观，怕见阻碍，怕遇困难；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矛盾所给与你的痛苦，是因为未曾注意要从现实做出发点！如果我们注意我们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我们既不能像孙行者的摇身一变，脱离这个现实的世界，翻个斤斗到天空里去，那末我们只有向前干的一个态度，只有排除万难向前奋斗的一个态度。为什么

呢?因为我们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现实就根本是有缺憾的,必然是不完全的,必然是有着许多不满意的,甚至必然是有着许多事实令人痛心疾首的,我们既不能逃避现实,就不能逃避这种种,就只有设法来对付这种种;一个人或少数人来对付不够,就只有设法造成集体的力量来对付。

现在有不少青年有志奋斗,但同时却有许多逃不出苦闷的圈子。苦闷是要消磨志气的(虽则在某一场合也可以推动奋斗),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必然地要从现实做出发点。

(二十五,七,五。)

地　　位

我最感到愉快的一件事是展阅许多读者好友的来信。有许多信令我兴奋，有许多信令我感泣，有许多信令我悲痛，有许多来信令我发指。

最近有一位读者给我的信，劈头就说："你是没有固定的地位的，所以你肯奋斗，这是我所以特别敬重你的缘故。"下面他接着下去讨论些别的事情。

我凝望着劈头这三句话，静思了好些时候。我当然很感谢他的好意，把"肯奋斗"的话来勉励我，虽则我自己是十分惭愧，对社会并未曾"奋斗"出什么好的贡献。他认为一个人肯奋斗，是因为他没有固定的地位，这一点却很引起我的研究兴味。什么是"固定的地位"，这位读者并未加上什么解释。猜度他的意思，也许是指稳定的地位。例如失业的人，他

的地位便不稳定。失了业的人,或是所有的职业已靠不住的人,想法得到职业,或得到稳定的职业,这是人情之常,不但未可厚非,而且是很应该的事情。但得到职业或职业稳定以后,未必就不肯奋斗。所以我转念又觉得这位读者所指的"地位"是会有使人堕落的效用,至少是含有使人保守不求前进的效用。例如做了资本家,做了大官僚之类的东西。倘若这个猜度是对的,那末所谓"奋斗"也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因为未得到这样的地位,所以要奋斗去得到;一种是因为没有这种地位使一个人腐化或保守,所以他能向较有贡献于社会的方面奋斗。前一种的奋斗是不值得"敬重"的,所以我想那位读者所指的是后一种的奋斗:即不是为着自己的地位干,是为着社会的或大众的福利干。

倘若我们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个人的地位原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尤其在中国现在所处的地位,我们尤其要撇开个人地位的私念,同心协力于增高国家民族的地位。多在国外游历的人们,对于这一点应该有更深刻的感触。无论你怎样神气活现,无论你在国内是有着怎样高的地位,他们看去都是中国人——本来都是中国人——他们若看不起中国,任何中国人当然也都不在他们眼里。华侨的爱国心比较热烈,这便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只要想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怎样,个人的地位就更不足计较了。

当然,我们所努力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增高并不是要步武侵略国的行为,并不是羡慕侵略国的国际地位。我们要首先努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努力使中华民国达到自由平等的地位。当前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是我们做中国人的每个人心坎中所明白的;当前什么是我们民族解放的大障碍物,什么是我们国家自由平等的刽子手,是我们的中国

人的每个人心坎中所明白的。说得实在些,中国在国际上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了地位!你看见哪一个独立的国家可以坐视敌人的铁骑横行,宰割如意,像现在的中国吗?你在各国报章杂志上看到批评中国的文字,总可以看到“中国”这个名词是常常和世界上已亡的国家相提并论的。我们看着当然是要气愤的。在这种时候,谁的心目中都只有“中国”这个观念,都只有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怎样的念头,至于个人的地位怎样,是抛诸九霄云外的了,但是徒然气愤没有用,我们现在必须集中火力对付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的残酷的侵略;这是当前唯一的第一件大事,是要我们全国万众一心,勇往奔赴的。只须这第一件大事成功之后,什么其他的问题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到那时我们的宪法里也尽可以订有:“中国对于因保护劳动者利益,或因他们的科学活动,或因争取民族解放而受控告的外国公民,都予以庇护权。”

这是我们的民族国家未来的光明的地位,是要我们用热血作代价去换来的,是要我们肩膀紧接着肩膀,对准着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作殊死战去获得的。

让我们抛开各个人的地位,共同起来争取中华民国的自由平等的地位吧!

(二十五,七,五。)

苦闷与认识

在现在的中国里，除汉奸卖国贼外，大概都不免在苦闷的气氛中。尤其是热情横溢的青年，他们特富于敏锐的感觉，纯洁的心情，每日展开报纸所看到的记载，尽是民族的敌人横行无忌，激进侵略的事实，悲愤的情绪，实有难于抑制之苦。想不干吧，做了中国人，逃不出中国的现实；你有眼睛，所看见的无法逃避中国的实况，你有耳朵，所听见的无法逃避中国的实况。要干吧，又苦于满地荆棘，不知道从何着手。这样处于不干不是干又不得的苦境，当然要感到难于摆脱的苦闷。这种苦闷已普遍于一般人，尤以青年们为尤甚。

极端苦闷的结果，大概不外两途：一是由苦闷而更努力于寻觅出路，终于得到了出路；一是索性颓废，自暴自弃。当然，这里所谓寻觅出路，指的不是个人的出路，一则在现状下，整个民族没有出路，个人实在无法觅得出路，二则看到

整个民族到了这样惨痛的境地，个人的出路也不是值得十分注意的问题。所以大家所注意的，都集中于怎样使整个民族可以得到出路。

谈到这里，便要牵连到认识的问题。认识不正确、不清楚，还是要钻到苦闷的牛角尖里去。为什么？因为一个民族的出路，在时间上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全达到的；在人力上也不是由一两人或少数人所能单独完成的。所以就是你看清了整个民族的出路，在目前，至多是你在工作上有了一个灯塔，知道向什么方向干去。在你干的历程中，还不知要经过多少的艰苦困难，要受到多少的磨折麻烦！你倘若经不起这样的艰苦困难，经不起这样的磨折麻烦，你根本就未曾认识这是在干的历程中必有的阶段，就要因此仍然感到苦闷。这是先要弄清楚的第一点。其次，民族解放的工作是要靠大众来参加共同奋斗，不是可以像“英雄主义”的幻想，可以由一两人或少数人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我们的工作要注意于说服多数人，推动多数人来参加我们的阵线；这是需要很忍耐的，很坚毅的，很不怕烦的实际工作。倘若你未认识这是在干的历程中必有的阶段，也就要因此仍然感到苦闷。这是要弄清楚的第二点。最后，有些人希望在这种现成的理想的环境中干自己所要做的救国工作，以为非舍去原有的职业是无可为的；倘得不到，又在苦闷上加上苦闷！其实这也是由于认识的错误。救国的工作是由各种各样工作配合而成的，各人应就各人的力量和境地，从现实做出发点去干的。倘若希望有个现成的理想的环境，那是只有到乌托邦去，那只有始终在苦闷的气氛中翻斤斗，交臂失去了许多可以干的机会，这是多么可惜的啊。

（二十五，六，十四。）

从心坎里

鲁迅先生逝世和殡葬的情形，还历历如在眼前。我们回想到整千整万的群众瞻仰遗容时候的静默沉痛，回想到整千整万的群众伴送安葬时候的激昂悲怆，再看到全国各报和刊物上对于他的逝世的哀悼，无疑地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是民众从心坎里所公认的一个伟大的领袖。我要特别指出："从心坎里的"公认的领袖不是藉权势威胁可以得到的，不是藉强制造作可以得到的，是由于永远刚毅不屈不挠的为大众斗争的事实所感应的。

这种永远刚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民族解放斗士的最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在今日国难严重时期尤其可以宝贵的特性。这种精神和"亡国大夫"的奴性正是立于相反的两极端。在鲁迅先生下土的时候，群众代表盖在他的棺材上

的那面“民族魂”的大旗实含有很深的意义。中国的不亡，就是要靠我们积极提倡扩大这“民族魂”，严厉制裁那些不知人世间有羞耻事的“亡国大夫”型的国贼和准国贼！

鲁迅先生将死前的最后未发表的遗作是关于章太炎的，听说他认为章太炎努力民族革命，曾经入狱三次，还是不屈不挠，这种精神实在是值得我们纪念和崇敬的，虽则章太炎的晚年思想已落在时代的后面。我们觉得鲁迅先生的这种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鲁迅先生，因为他是民族解放的伟大斗士；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位民族解放的伟大斗士，更须永远不忘记他的刚毅不屈的伟大人格。

（二十五，十一，一。）

青衣行酒

小的时候看“钢鉴”看到晋朝的怀帝被汉主刘聪所虏，靦颜称臣，称刘聪为陛下，“汉主聪谓帝曰：‘卿昔为豫章王，朕与王武子造卿（“造”是访问的意思），卿赠朕拓弓银砚，卿颇记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早识龙颜。’聪曰：‘卿家骨肉，何相残如此！’帝曰：‘大汉将应天受命，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这不能不算是极尽委屈求全的能事了！但是刘聪还不够，“汉主聪宴群臣于光极殿，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隽等不胜悲愤，因号哭”。我们古时青衣是奴隶的标志，“青衣行酒”便是做着倒酒的奴隶，庾珉和王隽都是怀帝的旧臣，所以看到这样的惨状，禁不住号哭起来。结果这两位号哭的朋友固然被杀，就是甘为奴隶而不辞的怀帝，仍然被杀。我小的时候虽朦里朦瞳，当

时看了这一段，小小心弦也被震动，感到莫名其妙的悽惨！

最近看到报上的消息，在华北日军进攻北平大演习的时候，遭难的老百姓流离失所，不堪设想，怀仁堂上却特设盛筵欢宴日军司令，“举杯为祝，众皆鼓掌”，并“殿以中西歌曲”，这惨痛的现象，和上面所说的情形，不知道有什么两样！

有朋友由华北来，谁都盛赞二十九军的爱国精神和宋哲元氏的处境困难，但认为非有全国整个的救国行动，华北在实际上是必然要全部沦亡的，尽管在名称上也许还存着多少的烟幕。

历史如果还有教训的话，晋朝的怀帝该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吧！

（二十五，十一，八。）

人　圈

有一个很知己的好友最近由西北回到上海来，我们知道那里是有着时时渴望“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他们里面有的新自东北出来的亲友，和我的这个好友谈起东北同胞惨遇的情形，最悽惨的是我们的民族敌人近来在东北各村里设有所谓“人圈”，把贫病交加的我们的苦同胞，拉到这个人圈里去喂猎狗！事实是这样：因为义勇军的各处潜伏，我们的民族敌人把小村一大片一大片的烧掉，穷苦的老百姓往大村里逃，没有屋子住餐风露宿，病了也没有医药，敌人便仿照猪圈或牛圈的办法，在荒地上用木桩围成大圈，里面放着饿狗，病得未死的人都被拉到里面去喂狗，夜里常可听到惨不忍闻的哀号！

我希望这惨呼的哀音能打动全国每一个爱国同胞的心

弦！我希望全国同胞明白这种惨遇是每一个同胞和我们的子孙的命运，倘若我们还不一致团结起来挽救这个危亡的祖国。

（二十五，十一，二十二。）

中国人的责任

中国人的浴血抗战，抵御日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的当然是要抢救我们的祖宗所遗留下来的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和千万世子孙的福利。只就这一点说，已经值得我们牺牲一切，为我们的祖国而苦斗。

但是我们的责任还不止此。日帝国主义倘若沦亡了中国（这在全中国奋起自救之下，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它的威胁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是更要猖狂的。我们为祖国的生存而战，同时也是为世界的和平和安全而战。我们为祖国驱除我们的民族的敌人，是我们对祖国应负的责任；我们为世界驱除人类的刽子手，也是我们对世界应负的责任。

不但如此。据最近"大陆报"所载，赴日游历乘上海丸到沪的美国某名人告诉该报访员，说日本有知识者都极力反

对和中国作战，他们和美国朋友讲到这件事，都说今日最有益于日本和日本人民的，就是他们的陆海军在中国受到好好的打击；他们都痛恨他们军阀的狂乱行动，但是因为无力制止，只有切望其倾覆罢了。足见中国的制裁日帝国主义，对于日本的大众也是有利的。

我们郑重说明中国人的责任的重大，并不是要制造中国的夸大狂。恰恰相反，因为责任重大，第一，更需要沉着的奋斗和艰苦的挣扎；第二，更了解我们的牺牲，我们的苦难，不是没有代价的；是有着很大的代价，我们虽受尽牺牲，历尽苦难而无悔！我们的牺牲和苦难不但是为祖国，而且也是为世界人类，甚至也是为敌国的大众，那末任何牺牲任何苦难的忍受，都是值得的。我们只有"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只有前仆后继地踏着我们的烈士的血迹前进！我们的行动是有最光荣的目标做前导！

（二十六，九，九。）

轰炸南京

日本帝国主义者用空军袭击我国首都，原已不止一次，最近敌方更有大举轰炸南京的恫吓，由日本驻滬总领事于十九日将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致各国使馆通告，递交驻滬领团通知各国驻华使节，指南京为我军策源地，为早日结束战事起见，将用空军轰炸，限各国使领侨民于二十一日午前退出南京，各国军舰同时离开下关。二十日敌机即到南京肆虐，不下四次之多，共约八十架，平民死伤多人，敌机被我国空军击落五架。

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国，目的要打到中国屈膝，也就是要打到中国跪下来。大举轰炸首都的恫吓，也无非要想吓得中国跪下来。但是我们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日本帝国主义置中国于死地，中国人随时随地都可死，对于死的恫

吓，已司空见惯，不觉得可怕，反而要以不怕死的决心，全国愈益精诚团结起来。和我们的公敌，我们的公共刽子手，作生死的猛烈斗争。我们愈益深信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我们的民族，才能避免我们千万世子孙的惨境。在抢救我们整个民族的伟大生命和保护千万世子孙安全的目标之下，我们任何个人的生命都是可以在这大斗争中供牺牲，至于身外物的财产，那更不消说了。所以日本帝国主义把死来恫吓我们，以为这样可以使我们下跪，所得到的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使我们不怕死，反而使我们更团结，更沉着英勇地抗战！

（二十六，九，二十三。）

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

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的宣言（中央社肤施二十二日电讯）和蒋委员长对于这个宣言所发表的重要谈话（中央社南京二十三日电讯），是全国团结御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是国难愈益严重以来的数年间，全国忧心外患的人们不避艰险以企求的重要主张之一；所以这次中共的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宣言和蒋委员长的“集中力量救亡御侮”的谈话，无疑地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所热烈欢迎的。

中共这次宣言所表示的宗旨是要“挽救祖国的危亡”，是要巩固“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是要“决心共赴国难”，是要造成“民族内部的团结”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个宗旨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所一致拥护

的。

要达到这个宗旨,“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忍不拔的努力奋斗”,该宣言因此特向全国同胞提出三个奋斗的鹄的:第一是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抗战;第二是实现民权政治;第三是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这三个鹄的也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所一致赞助的。

蒋委员长发表谈话,申述“集中整个民族之力量,自卫自助,以抗暴敌,挽救危亡”,这种集中整个民族力量的主张,确是全国人民急迫要求的反映。

这样一来,我国已恢复了民十六年前全民族一致团结以谋民族复兴的精神。这样的全国团结,是保障抗战胜利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大的打击!

(二十六,九,二十六。)

惨痛的牺牲

日本空军最近轰炸广州贫民区，残酷绝伦，据路透社二十三日广州电讯，该社记者亲往被炸地点视察，见死尸堆在地上，如吸蝇纸上的死蝇，残肢剩骸，不可辨认，见妇女一面号泣，一面扒动死尸，以寻觅其亲属；该社记者所到之处，无不哭声震野，而如痴如狂的小孩，奔走呼号他们的父母，闻之尤令人惨切。这是多么惨痛的景象！这是多么的惨痛的牺牲！这种惨痛的景象和牺牲是我们所永不能忘的，永不该忘的。

郭沫若先生在他的"抗战与觉悟"一文里曾这样说过："我们的前敌将士在战壕流了的血是有光辉的，就是我们的许多无辜的老弱同胞受了敌人的轰炸所流的血也并不是全无代价。我们的无辜老弱所流的血，写出了敌人的狂暴……

证明了敌人的兽性，证明了敌人是人道的刽子手，是连禽兽都不如的。……”

这话诚然很对。但是我们无辜同胞的惨痛的牺牲仅仅暴露敌人的兽性，使全世界知道世界上竟有这样兽性的横行，这还不够；我们要努力保持抗战到底，要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要绝灭投降妥协者的抬头机会，使中华民族由这次的抗战终于得到解放，然后我们的将士和无辜同胞的牺牲才算得到了相当的代价，然后他们所流的血才算不是白流的。我们悲愤于这样惨痛的为国牺牲，唯一报答之道，是要努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严厉制裁动摇的分子。这样才对得起惨死的同胞。

（二十六，九，二十六。）

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

自希特勒于本月二十日在国会演说，公然宣布承认伪满，接着英国外相艾登因对意国谈判的意见和首相张伯伦冲突，提出辞职，于是国际风云似乎突然紧张起来。留意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之间的关系的人们，有些感觉到国际形势的恶化，同时感觉到这种恶化的国际形势与中国的抗战是不利的，于是陷于悲观，甚至因此觉得中国的抗战前途的暗淡，这种心理实在是由于不能深刻明了国际形势的真实内容，只凭表面上的一些事实作神经过敏的推断的。这种没有真实根据的悲观心理，倘若纵任它蔓延开来，传播它的毒菌，与抗战的坚持是很有害的，于正确的外交路线也是有着很大的妨碍，所以值得我们仔细的分析和研究，一扫这种有毒害的气氛。

德国宣布承认“伪满国”,公开帮助我们的不共戴天的民族敌人,这当然要引起我们全国同胞的愤怒,但是这件事的发生却不是足以引起我们奇异的偶然的事件,因为德国的人民和在中国有商业关系的德国商人,虽对中国的抗战具有相当的同情,而德国的法西斯政府,尤其是德国法西斯代言人,在我国抗战一开始,就说中国是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屡劝中国走上投降的道路,他的这样的态度并不足奇,因为法西斯的本质就是侵略的,以侵略的本质同情于我们敌人的侵略,这是必然的倾向。这次他宣布承认伪满国,仍然是说中国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认日本在中国的奸淫掳掠,屠杀民众的残忍行为是“远东的安定力量”,这虽是丧心病狂的话,可是依侵略的本质说,是不足怪的。不过在这黑幕未揭穿以前,还有一些人对德国存着幻想,影响到我国所应积极采取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影响到中山先生所指示的“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正确的外交路线。他们终不能认清敌与友的区分,把任何国家都看作“与国”,结果是得不到一个“与国”!现在黑幕揭开,铁的事实摆在面前,对于我国正确的外交路线的推进是反而有利的。

至于英国外相艾登的被迫辞职,也许有人认为这是英国加入侵略阵线以破坏集体安全制度的朕兆,为意德张目,即为东方的强盗日本张目。甚至有人感觉到英德意也许可能集合起来强迫中国对日本妥协。英国在主观上想对日本妥协,想要中国对日本妥协,这是有的,但在客观上英日在远东的利益是无法妥协的,不但无法妥协,而且彼此间的冲突,因日帝国主义的独占侵略,反而尖锐化,所以说在保守党死硬派执政下的英国,因要保盈持泰,避免地中海的危机严重化而对意德有所让步,固是事实,但一方面因在远东英

日利益无法妥协，一方面在英国国内还有保守党中的青年派，各反对党(如自由党、工党、共产党)，各自治领，以及广大反侵略的民众，对于保守党死硬派的政策都是反对的，对于中国的抗战都是同情的，如说英国外交政策就要完全加入侵略阵线，就要在远东与日妥协来强迫中国投降，这是没有什么客观事实做根据的。

中国的解放要靠自身的坚持抗战，这是当然的，但是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同时固要密切注意国际形势的开展，而就当前的情形说，却无所用其悲观。

(二十七，二，二十六。)

贞　操

我国向来重男轻女，相沿成习。对男子取宽大放任，对女子则压迫束缚。男子可以在结婚之前嫖妓狎游，女子是务必贞操自守的；丈夫死了妻子可以续弦，妻子死了丈夫则不能再嫁；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是不许有第二个丈夫的。假使女子有不贞操的，那末不但成为男子的弃妇，并且也是全家的罪人。寡妇再嫁，众人必指为淫荡，积不相容，因此没有生产力的寡妇只有饿死，但是她宁愿饿死，决不堪忍受那种世人的谩骂！然而社会人士对于男子嫖妓，却视为常事；对于鳏夫续弦，或是富翁纳妾，绝不会有一个人加以非议的，不但不加以非议，并且还有许多亲戚朋友来为他称觞宴客，何其堂皇！现在女界受新知识的陶冶，新文化的薰染，已有觉悟的女子起来反抗了；谋自由，争平等。可是我女界同

胞多半不从实际着想，以致妄谈恋爱自由，号称社交公开，而因此失身于恶棍，终身惨苦者比比皆是。闹出了许多花样来，于是一般自命道学先生便有所藉口，肆行攻击；道学先生的脑筋诚然是顽固的，不过“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假使我们女同胞能束身自好，向真正的解放路上走，不问道学先生的脑筋如何顽固，也要使他钦佩，而没有话来攻讦，才是道理。

我以为女子从前受贞操的压迫，是不对的；现在的过形放荡，也是错误的。贞操出于本心，是好事，是美德，不能因为男子用贞操来压迫女子，就根本的打倒贞操主义。我更希望男子也同样地遵守，因为贞操不是单单对于女界的名词，男女界要实行真正的平等，是要把坏的改好，不是把好的改坏，当现在的潮流，我说这种话，难免没有人说我腐化，或是不合时宜，不过我凭我的良心来说几句，他人的毁誉是不关的。如有高明之士，加以指正，我很愿意领教。

严秀芳

最近听见有人说道：“贞操两字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余毒，在现时代是没立足的余地的。”现在据严女士的来信，她的意思似乎又觉得贞操两字在“现时代”还是有“立足的余地”。我们要谈谈这个“性道德”问题，先要彻底了解贞操所含的正当的合理的意义，然后再贡献我们的意见。

英文字里的 Chastiry 和东方的贞操两字相当，作清洁解。这种清洁的意义，用到“性道德”方面去，常人往往以童贞和处女为主体，以为“破操”者，不过是指破坏童贞或处女而言，照这样说，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尽可以自由与夫妇以外的异性发生性的关系，而结果也不能算为失贞了。其实贞操的意义，决非如此狭隘。所谓贞操者，是关于性(sex)的德

义，“明白地说，就是对于异性的性关系，在法律和从来的习惯上，只能适用于有契约的夫妇间，夫妇以外之性的关系，是绝对的罪恶的。再进而言之，所谓贞操也者，就是巩固一夫一妇的制度，遵守一夫一妇的制度，使不至与其他异性发生性的关系的代名词。夫妇间之性的关系不得谓之破操，而非夫妇或夫妇以外的性的关系，方可以说是破操。”(见日人泽田顺次郎所著的“贞操问题”)至于未婚的男女，虽未对任何特殊异性负此责任，但为尊重自己人格起见，为将来的配偶而保守贞操，拒绝与任何异性发生性的关系。泽田顺次郎把未婚者的贞操称为第一义的贞操，把既婚者的贞操称为第二义的贞操。他又说“未婚时代的贞操是偏面的，结婚后的贞操是相互的。所以就责任上来讲，既婚者的贞操，比未婚者更为重大，因为经过了婚仪以后，夫有保护妻子生命和身体的责任，而妻也有保护和安慰丈夫的义务；丈夫不应……破坏他对于妻子的贞操，而妻子也不应……违背她自己对于丈夫的贞操；换言之，他们俩应当严守一夫一妇的制度，双方须相互的尊重两者间之贞操。”所谓贞操，既是关于性的德义，所以夫妇任何方面不幸有一方早逝，缺了一性，性的关系既中断，性的德义随之俱消，只要能于再嫁或再娶之后，在再婚间的夫妇关系过程中，保守这再婚夫妇间的相互贞操，便不能加以无节操的恶名。泽田顺次郎把这样的贞操称为第三义的贞操。

又如夫妇既已离婚，彼此便中断所应互守的关于性的德义，我们对于任何方面不能加以无节操的恶名。所以离婚的女子再嫁，于贞操毫无问题。只要她再嫁后，在再嫁的夫妇关系继续成立中，能对再嫁的对方守贞操，便是她对于性的德义无缺憾。

这样看来，贞操的合理的意义，不应该是男子强迫女子的偏面的观念，应该是实行一夫一妻制度里，在夫妇关系继续成立中，相互遵守的关于性的德义。我们既明白了贞操的合理的意义，便须再进一步研究人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关于性的德义。我们以为如果一夫一妻的制度无提倡的价值，便无须有什么贞操（一夫多妻制的偏面贞操，当然和此处所指的合于意义的合理的贞操不同），如认一夫一妻制有存在的价值，那末上面所述的合于正当意义的合理的贞操，似乎不能武断的说"在现时代是没立足的余地的"。

于是我们不得不进而研究一夫一妻制是否有存在的价值。我们以为一夫一妻制虽不能说是绝对的好制度，但除人口女多男少，或女少男多的地方外，为社会秩序计，为个人幸福计，为种族繁荣计，一夫一妻制可谓比较好的制度。所以"人类婚姻史"作者韦思特马克曾经说过："文化发达至相当程度时，婚姻殊易于采取一夫多妻之形式，然过此而往，则无不以一夫一妻制为指归，亦不得不以一夫一妻制为指归。"一夫一妻制既有提倡的价值，合理的贞操便有存在的价值。

我国向所注重的上门守节及青年守寡便是不合理的贞操主义，因为贞操既是关于性的德义，性的德义是随着两性而存在的，对方异性已死而不在了，何以不可以再加上一个异性？

贞操既是关于性的德义，有意去败坏这种德义的才有责备之余地，才发生道德的问题，否则如有女子不幸为强暴所辱，或不幸为人用伪善手段所骗，她的心地原是光明的，原是无辜的，都不应加以失贞的恶名。所以在西方即有这样不幸的女子，只要有人爱她，就娶她；在我国则认贞操全属

肉体的关系，与精神无与，所以不幸的女子就终身不幸。在西方虽属寡妇，也只要有人爱她，也就娶她，在我国既贞操全属肉体的关系，与精神无与，所以不幸的寡妇也就终其身不幸。这种不合理的贞操观念，我们以为是应该打破的。

严女士以为贞操不应打倒，我们以为此处贞操两字须有相当的界限。就是旧礼教中的惨无人道的贞观操念宜打倒，只有合于新道德的合理的贞操观念才有存在的价值。

编　者

凶悍泼辣

我是个世界上最可怜的弱女子，从小时候，不幸父母就相继丧亡，靠着舅氏过活，在那去年春里，舅父忽然听信了一个害人精王婆式媒婆的话，把我许字了一家黑暗的大家庭中，当时我也没有知道仔细。后来慢慢的晓得那家人家，家道小康，翁是没有了，只有一个继姑，凶悍泼辣，兼而有之，常常把前姑所生的子，加以虐待，如同眼中钉，殴打谩骂，无所不至，还有三个小叔，两个姑娘，是她自己生的，性情也是凶悍蛮猛，同母亲真是一般无二。

当时我知道这种情形以后，就恐怕后来的结果不十分好，便悄悄的告知舅父，哪知舅父是个旧礼教而犯烟癖的人，这时已受了彼方的信银，便怒冲冲地说道："我们是守礼教的人家，现在木已成舟，米已煮饭，照你这样，难道要赖婚

吗？我看你没有父母的人，富贵人家有谁要来娶你，我养了你十多年，费了许多心血，这一些事我不好做主吗？”言时声色俱厉，我知无可奈何，不觉放声大哭！后来被舅母听见了就多方来安慰吾道：“嫁人嫁婿，只要他好就是，你何必去管他继姑凶、姑娘恶呢？”当时被她解劝之后，就不由我叹了一声日后之幸福，付之命运之神吧，此去岁香飘桂子时的事情。到了今年三月，完婚了。过门后，他待我尚好，不料那继姑因我舅父争了一些聘礼，就迁怒于我，说我的妆奁破呀，旧呀，不值钱呀……种种挑剔，吹毛求疵，百般辱骂，起初我还忍耐，后来使得我忍无可忍了，便插嘴道：“娶媳娶人，我家本贫，事前何不考虑……”那继姑听了我的话，顿时面上现出青赤色，恶狠狠地向前将要用武的样子，这时恰巧我的他从店里回来，继姑一见了他，不问情由，便放声大哭，倒卧床上，装腔作势，说我如何如何的忤逆她，唠唠叨叨，说了一大篇的话，硬逼他同我滚出去，吓得他连忙请罪，一方又说了我许多的不是，一场风波，暂告平息，可怜我这时虽有百喙也难以辩明了。

他是在一爿小京货店做小夥计的，月入甚微，那继姑毫不明白这层道理，常常说他完全给了我了，总在我面前说不堪入耳的话，我听得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得以泪洗面。她这样的常常闹着，还有姑娘辈，从旁撺掇，挑拨是非，胆小如鼠的他，素来畏狼如虎的，慑于这种权威之下，又想起了自己没父母的苦，正是和我一样，想到这里，同病相怜，我两人的泪不由的如珠断线的一般夺眶而出。

我是素有肝胃病的人，经此剧烈刺激后，最近有一夜胃病大发，虽有他煮了热茶给我喝，可是痛仍旧没有止，痛得厉害的时候，好比刀割，在就床上乱滚，急得他手忙脚乱，没

法可施。

翌日，他因急须返店，无人照拂，即致书我舅父，由舅父雇舟来候，因我患病，寄居舅处，许多不便，不得已暂赁某姓余屋，组织一简陋的小家庭，以为养病之所，不料淹滞床上，一月有余，出门时未拟久住，所有衣服统未带出，近因天气渐寒，雇舟去取，不料入门后，不问情由，大肆咆哮，势将用武，扣不放取，我以众寡不敌，只得牺牲舟资，空手而返，这样已好几次了。

使得我经济上精神上受莫大的损失(每次至少三四元)，我虽愤怒之至，但是我是一个女流，也没有法想，旁观的人叫我用法律解决，我一来没有钱，二来也不知道诉讼顺序，并且从小懦弱的，这种抛头露面的事，我委实做不来的，还有人叫我告诉党部和妇女协会，不知有用没有用?请指教。

还有一件事情要请教的，他的生母有奁田若干亩，继姑常常对人说："他的母，我子亦母也，她的奁田，我子亦应有份，他日亦须匀分之。"不知依法律上讲来如何?乞指教。

前天，我再和一个尊长，又叫了船去拿，一入了门，不是开口就骂，便是动手就打，空费了一番喉舌，结果仍旧没有拿到。在外开支很大，长此以往，将何结局，我为了这件事情，受了不少经济和精神的损失，一个也没有帮我的人，与其活在世上受累，倒不如抛却一切的干净，几次要想自杀，被他劝解而罢。他呢?畏娘如虎的并且店务很忙，没有空工夫去干这件事，现在我的叔父想进行诉讼，不知好不好?

附奉邮花十分，回玉请从挂号寄下。如先生以为有公开的价值，把它登出来，千万不要把我真姓名和住址写出来。

章芙娴

凡是大家族，十八九都是乱七八糟的，像这封信里所说的情形，也是“守礼教的人家”所干出的好事！我至今还常常听见许多所谓“老前辈”也者，说起我们“国粹”里的大家族制度，还是津津有味，觉得有许多许多说不完的好处，我没有工夫遍打他们的嘴巴，但希望他们不要闭着眼睛说话！

擅自代人误订婚约，既打听到了对方大家族里的黑暗情形，在未嫁之前还不赶紧设法救出火坑。人还未嫁，竟说得出什么“木已成舟，米已煮饭”，这简直是疯狗狂吠，哪里是人说的话！

事已糟到了这样的田地，骂两句本已没有什么用处，我们看了不得不污着笔墨骂他两句，也无非希望将来这类疯狗可以少些。就章女士的来信看，已绝对不必作大家族同居的念头，因为再同居就等于再入地狱。如有家产可分，当然是最好能做到分家。依法律上的原则言，父母在世，倘非发动于父母，子女是不能要求分产的；不过有特殊情形时，却未尝不可要求，像那样“凶悍泼辣”的“继姑”，既有种种苛虐的行为，仍得依法提出要求的，分产的手续可先请族长出来说话，如办不到，只有依法起诉，不过要求分析祖产的起诉，一定要章女士的丈夫出面。倘若他没有决心，此事便办不了。如章女士的叔父肯出面替女士进行诉讼，只能依法索取她自己嫁过去时带去的“妆奁”，这是女士自己应得的东西，依法是可以索取的。但是这“妆奁”索得之后，是否够“在外开支”，倒是一个问题，如其不够，而女士的“他”又那样无用，则又奈何？（不知女士能自己寻事做否？如有服务社会的能力，当然较易解决。）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说动“他”下决心要求分家。如“他”能有决心，仍可由女士的叔父从旁帮忙。至于“生母有奁田若干亩”，如她并无遗嘱分配，依法只

得归在祖产里一起公分。

章女士问“告诉党部和妇女协会不知有用没有用?”这要看该处(即女士的本乡)的党部和妇女协会是否公正,是否热心。如是公正热心,当然可有一种很有力的帮助,“助进女权之发展”原载明国民党政纲的对内政策里。

编　者

戏　问

韬奋先生：我是“生活”的读者，也可称得先生的同志。我平日对于先生的思想言论，非但表示钦敬，而且表示十二分的同情。先生最近的思想言论，确是一贯的，并且是很切合现在中国的环境，如果实行起来，简直可作救国的对症良药。

我现今在这里幻想着：假使先生一旦丢了笔杆，踏上那政治舞台，或者自己不愿，强被人家拥护上台，到了那个时候，必定有一番大大的工作，像你思想一般的生动，像你文笔一般的刚劲，不过恐怕在工作不久以后，即被宵小包围，利欲所薰陶，而立刻腐化起来，一切举动，便和从前的言论思想矛盾起来，那时虽有良友诤谏，虽遭舆论攻击，只作不闻不问了。这虽然是我的幻想，未免“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

心”，但是我从各报上，看到现代得意的党国人物中，有许多文人，在革命时期和未上政治舞台以前，他们的思想，何等的纯正，他们的言论，何等的尖锐，可是一登舞台，就顾不到以前的言论和思想了，只求腰包充满，亲族显贵（其实族中还轮不到），人民的痛苦，哪里还记得呢！所以人民也就因此大失信仰了（当然还有许多党国文人不是如此的）。这是事实告诉我们，无可为讳。我现在所深虑于先生的，就是将来先生得意了，难免不蹈覆辙，因此戏问先生上台以后，究竟怎样？请你忠实的宣布！

末了，我要郑重声明的：这封短简，完全是理想的，带有滑稽性质的，请阅者诸君千万不要误会！并请先生在“生活”上明白答复，那是很盼望的。此颂笔健！

杨佩玉　二，二二。

记者承杨先生谬加推重，非常惭愧。杨先生的“戏问”，既是属于将来的性质，记者此时无论作如何“忠实的宣布”，还是空口说白话，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这是全须将来的事实为证的。不过撇开个人的立场，专就杨先生所提出的——或所暗示的——要点谈谈，也许还有讨论的价值。

（一）为社会改革而努力的人，大目标尽可相同，而具体的事业却须各就所能地分工做去。主持“思想言论”是新闻记者的事情；“踏上那政治舞台”是政治家的事情。为甲种社会制度而努力的有新闻记者或政治家；为乙种社会制度而努力的也有新闻记者或政治家。各有各的效能，似不限于“踏上那政治舞台”的事才算“工作”。试再举一二例以阐明此意。例如戏剧，有戏剧家，有观众，有评剧家。评剧家是以客观态度批评戏剧的，他可以使实际上台做戏的戏剧家知

道自己做得怎样，可以使观众知道怎样欣赏或认为无足欣赏。又如文学，有作家，有读者，有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家的效能也和评剧家相似，不过一为戏剧，一为文学而已。能做评剧家的未必即能做戏剧家，犹之乎能做戏剧家的也未必即能做评剧家。关于文学批评家及作家，也有同样的情形。新闻记者——尤其是委身言论方面的新闻记者——应看清客观的环境，消极方面尽量暴露社会的矛盾黑暗，积极方面指明社会走得通的出路。倘若他所指明的社会出路是正确的，是走得通的，明白的人多了，加入向前走的人多了，便发生伟大的社会的力量，便易于达到目的地。新闻记者在这方面的工作自身也就是他向前走的工作里面的一部分。如果社会的力量督促他于研究宣传之外还须做别的工作，而为他的能力所能胜任的，到那时他当然要于原有的工作之外，或“丢了”原有的工作，抛掷他的全力到这新的工作上面去。倘有人能做评剧家而又能做戏剧家，他当然可以兼而为之，但这不是说非能做戏剧家就不能成其为评剧家，犹之乎不是说非能做作家就不能成其为文学批评家。因为在分工上面，各有各的效能——尽管在一个大目标下共同努力。

（二）杨先生提及“强被人家拥护上台”一句话，这要看所谓“人家”是什么。例如有新闻记者某君，在摇笔弄舌时代，在表面上看来是积极主张大众做政治中心的，但“被人家拥护上台”之后，“一切举动便和从前的言论思想矛盾起来”了，这是由于“拥护”他“上台”的“人家”，并不是大众，他的“上台”，根本就和他“从前的言论思想”脱离了关系，这是因为他脱离了从前的大众而转到另一方面去了，何必等到“上台”之后才“矛盾”起来呢？又例如美国总统的后台老板——也就是“拥护”他“上台”的“人家”——同属美国华尔街

银行家及工农业资本家，无论他嘴上说得怎样天花乱坠，终究还是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前提的，因为他的“人家”是资产阶级，他所代表的利益是资产阶级，“拥护”他的是资产阶级，你怎能希望他替大众干出什么奇迹来呢？你又怎能希望他会言行一致呢？

编　者

期　望

韬奋先生：

在前天的报上，看到先生编辑“大众生活”的消息，使得我快乐到万分。回想先生以前编辑的“生活”周刊，我从第五卷起，没有一期未曾读过，后来“生活”被停止邮寄了，想了方法请上海友人按期买了转寄给我，直到“生活”被迫停刊时为止，因为那时我还在故乡盐城读书呢。同时我所知道“生活”的读者是各界的人们都有的，不像现在一般刊物的读者仅仅限于学生，故“生活”可以说是极普遍的大众读物。自“生活”停刊了以后，一般大众和失去良师一样的悲痛；然而考究“生活”何以使人如此的爱护呢，在我的意思，不外下列的几个原因：一，文字生动精警而有趣味。二，各项重要问题无所不谈，但不趋专门化。三，诚恳的暗示人生修养。四，

积极的促进社会改造。再加上先生公正精透的“小言论”,人生百面镜的“信箱”,因此风行海内,畅销寰宇了。最近我常和同学树君说:“‘生活’停刊以后,上海的周刊旬刊虽多,没有够得上称为‘大众读物’而具有以前‘生活’一样价值的,很希望现在有类似‘生活’的刊物出现,使大众再得到适当的良好的读物。”这话说了不久,就看到“大众生活”出版预告的消息了,可以说是我的希望实现了,该是如何的快乐呢!

看到“大众生活”这个名辞,谁都知道一定是大众化的读物。再看先生所述“大众生活”的目标是在根据现代中国的急切需要,“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的确,民族解放是现代大众所急切地需要的;封建残余不铲除,社会无法改造;个人主义不克服,社会事业无从发展,由此可知“大众生活”和以前“生活”的主张没有多大出入的,只有更加具体化一点了。而“大众生活”所用的工具还是“通俗生动的笔调”也和“生活”一样的。至于“大众生活”对于大众的希望是仅在“引起对于时事及重要问题的特殊注意与研究兴味”,我觉得还有点“美中不足”,我更希望“大众生活”使大众再得到人生修养的暗示,这就是先生以前办“生活”时所主张的。因为现代大众受到的教育,水平还是很低的,对于人生修养的训练,非常的浅薄,他们认为人生的娱乐,是打牌宿妓;他们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升官发财,因此弄得社会上乌烟瘴气,没有升平之日。我很希望先生继续依照“生活”时代的服务社会的精神,使大众由“大众生活”得到做“人”的方法,做“人”的训练,这样造福社会,更非浅鲜了。

其次我还希望“大众生活”对于读者信箱,最好还是设

置，因为信箱的内容，确可顾到极有价值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而先生对于每一问题的解答，更足供若干人的借镜，由生活书店编印之“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和“迟疑不决”等书的风行海内，就可知大众对于信箱内容的重视了。国内外各地通讯，尤请特别注意，从这里才寻得出铲除封建残余的方策呢。

最后我对先生还贡献一点刍荛，就是在现代的中国，言论自由仍是一个梦想，我希望先生以极慎重的努力，把“大众生活”慢慢培育起来成为良好的大众读物，切勿使它中途夭折，因为现在创办刊物的，任你是光明磊落，往往遭到意外的无理的摧残与压迫。

我上面说了许多话，难免“野人献芹”的讥笑，然而我对“大众生活”的期望过殷了，忍不住不得不讲几句话。最好请先生替我修正刊载出来，给我一个解答。专此即请
撰安!

徐凤石上　十一，十二。

凤石先生：

承蒙你恳挚的奖勉，非常感愧，先要谢谢你的厚意。本社同人只有愈益奋勉，永不辜负诸位好友的期望。

不幸夭折的“生活”，在现在看来，感觉到有许多的缺点，但仍承蒙许多读者好友垂念不忘，这也是使记者很感愧的。倘若诸友认为“生活”在当时对于社会不无一点点的贡献，我觉得大概是因为它的愚诚，是在能反映着当时社会大众的公意，始终不投降于黑暗的势力，始终坚决地不肯出卖社会大众给它的信用。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坚持到底的。

但是时代的巨轮是向前进的，“大众生活”产生的时代

和“生活”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了。记者出国两年多，回国后最深刻感觉的一件事是读者大众在认识和思想上的飞跃的进步。关于这一件事实的最显明的佐证，是有好些刊物因为歪曲了正确的认识和思想，无论在宣传和发行方面如何努力，还是没有人睬它。这是就一般说。讲到“大众生活”，我们不但希望它能避免“生活”的缺点，保留“生活”的优点——倘若有一些些的话——而且要比“生活”前进。试举一二例子来说：例如先生所提起的“各项重要问题无所不谈，但不趋专门化”，社会是一天一天地在前进着，有许多在从前认为是“专门化”的知识，也许到现在却应该是一般化了；我们要尽力使原来是“专门化”的，现在要在文字的写作技术上使它大众化起来，由此提高一般的知识水准。我觉得为大众的利益方面着想，以后任何专家都须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一个条件也是很重要的，这条件的重要不仅在消极方面，尤其在积极方面。阿比西尼亚在军事上的失败，有种种错误所致，不知运用被侵略的弱小民族最重要的抗战方式——大规模的游击抗战——和不知运用下层民众的坚强组织来严酷的制裁阿奸，也是很重要的失败原因。制裁汉奸卖国贼最基本的力量，是在下层民众的广大的坚强的组织。汉奸卖国贼活动必须先有容许他活动的环境。殷汝耕之流之所以敢横行无忌，就因为在现状下，汉奸卖国贼，反而被优容，受保护，民众救国运动反而是有罪的；这样一来，民众的制裁力量被压倒的蹂躏摧残，弹冠相庆的汉奸卖国贼当然要大展他的出卖民族利益的伎俩了。所以这件事——严惩汉奸卖国——和民众救国运动的开放也有连带的关系。因为在全国救国民众有组织的制裁之下，在救国怒潮狂发的紧张情势之下，汉奸卖国贼是很难得到容身之地的。

最后,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要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不但要倾全国的力量来抗战图存,同时也要运用国际上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目的的各种力量。全世界弱小民族和我们是有着共同的利害,这是很显然而无须多所说明的。此外我们在这抢救民族一线生机的最危迫的时候,所要切实注意的,是我们要集中一切实力对付民族最大敌人的侵略,同时对于其他各国当极力维持乃至增进友谊的关系。例如英、美、法、苏联等等,只须他们同情于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此时要集中火力于对付疯狂地要断绝我们民族生命的那一个唯一的侵略国。我们对于其他各国都要建立友谊的关系。讲到在远东国土毗连的苏联,尤其和我国有着共同利害的关系。为什么呢?日本要进攻苏联,必须先灭亡中国;日本若灭亡中国,对苏联的进攻当然有更严重的威胁。所以从实际环境的共同利害上说来,苏联可以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过程中的一个友军,一个国际上的好友。当然,我们同时也不要忽视了英、美、法等国的友谊关系。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因为我们决没有陷害他国的野心,只是要抢救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所托命的国家生命,只须我们能联合团结起来自救,必然地会得到国际同情的。

我们当尽量运用全国英勇悲壮的共赴国难的一切力量,全世界对我们为正义而艰苦奋斗的同情的力量,把中华民族从惨痛的陷阱中救出来!

编　　者

学生救亡运动的缺点

韬奋先生:

我从上海回到南方来,第一个给我觉得愉快的印象,是贵报(按指"生活日报"。——编者)的猛进,当然,我们希望"生活"由大众来推进到最高的阶段。所以,我也很想给贵刊写一些稿子,现在想先谈谈我所亲历的关于学生救亡运动的缺点,希望你指教。

这里所说的情形是指我在的这个中学,但其他的中学,在救亡运动中,还是推这个中学做中学校的领袖。在半年前,这中学的一千多个学生在严重的国难底下,如汹涌的洪水一样的的泛滥着,由这个中学的救亡运动而增强了全市的救亡运动,这是无论如何都保留着学生界的光荣的。而过去的最有能力的六七个学生,是主持全校的学生运动的人

物，这些都是属于有学问成绩的，所以很能够号召一般低级的同学，就是得到群众的信仰，所以大有一动即发的可能性，虽然没有达到严密的组织的程度，但是已使学校当局无法应付。后来，这些进步的领袖人物被学校当局逼走，进步的领袖人物一走，继之而起的人又没有号召力，所得的结果就大大的逊色了。

这里，我愿意略略地把半年来这中学的救亡运动的缺点写出来。

（一）领袖人物的学识不够——在过去，还有几个是有学问的领袖人物，所以得到一般群众的信仰，现在，起而继之者却是平日学业不好的球员之类。本来这并非问题，而成问题的是这些出来做领袖的学生的行动过于神秘，不作公开讨论，而自愿与有学业的同学隔膜。不但如此，因为自己找一条孤立的路而致同学不满，所以，这些自认为领袖人物者又指不参与合作者为汉奸，势必致学生运动濒于破裂。不过，所幸者，同学们多有为救国而牺牲的精神，在紧张时亦抛弃成见而成为一种伟大运动。

（二）不了解联合战线——领袖人物既无基本的训练，对救亡的理论也没有什么研究，而却以领袖欲破坏救亡的前途。他们不敢公开联合阵线的方策，而却以个人的意见，党派的成见，以致发生种种的隔膜。

（三）不应以明显的党派作为号召——一些救亡分子亦有参加市上的联合救亡运动，但一切行动犯了关门主义的流弊，以致失去同学的信仰，以为此类分子另有色彩，不足信仰。他们忽略了联合战线的策略，以致一切行为及政策，都带有秘密性，这是最大的错误。

（四）没有组织——领袖人物没有建立巩固的组织，事

实上是这样，一般群众还是缺少理智的，偏于感情的，做领袖者不造成个广大的组织，以致分散力量。

(五)领袖人物胆力不够——凡做救亡运动者，第一要训练成为一个勇敢的先锋，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也不应该害怕，显然，在这儿的救亡运动中有这个毛病。

(六)不应以反对会考为号召策略——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会考虽对救亡运动有阻碍，而这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普通人所知道的生活，我们在救亡运动中，不应去做过分的要求，也不应使破坏救亡运动者有所藉口，因为，真正的救亡运动不是在于会考不会考，这会考问题不过是社会问题下的小问题，因为救亡领袖是球员及平日学业成绩低劣者，如提出这口号，不过使人藉口说是“自私”，而有破坏民众心理的可能性。

以上的缺点，希望我们以后要由于正确的自我批判而改进。我觉得这是学生救亡运动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不知先生以为怎样。祝

努力

季　峰　六月二十日，广州。

季峰先生注重“正确的自我批判”，这个态度是非常对的。我们所以能在实践中学习，用实践来了解理论，用实践来充实理论，都全靠“正确的自我批判”。

季峰先生所提出的六点，都和“领袖人物”结不解缘。我们以为学生的领袖是从学生里面产生出来的，他的重要任务是能代表学生群众的真正意志，用他的比较优越的学识经验和能力，领导着群众向着共同的目标迈进。倘若他不能代表学生群众的真正意志，或没有比较优越的学识经验和能力来执行他的任务，便失却他的领袖效能，学生群众应该

另选一个可以胜任的来代替他。在季峰先生所指的那个学校里，学生领袖是用怎样的手续产生出来的，我们不得而知。依普通的情形说，大概都是由学生群众选举出来的。当然，在选举的手续里面，还有御用的选举和真正能表示学生群众公意的选举之区别。倘若有前者的不幸现象，却也无须失望，因为无论何种运动，都是在种种矛盾中进展着，我们原来就要准备着和种种困难抗斗，想法克服种种困难。克服困难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运用广大的群众制裁力(在一个学校里便是包括最大多数的同学)，突出分化和捣乱分子的重围。

领袖的最大的任务是要能根据群众的真正意志，领导群众共同努力。任何运动都不是几个光杆的领袖所能包办成功的；脱离了群众的光杆，根本已失掉领袖的资格。领袖是要和领导的群众共同干的。季峰先生所说的领袖，显然是已脱离了群众的领袖，也就是不成其为领袖了！“不足信任”的领袖，只有改换之一法。也许季峰先生要觉得以前的进步的领袖人物既被“逼走”，余下来的都没有号召力，似乎“继之而起的”没有人了，怎样能“改换”呢？关于这件事，我们有几点要贡献：(一)我们不要把领袖看得过于超越他所领导的群众。我们在上面不是说过了吗？领袖须能代表群众的真正意志，须和群众共同努力。换句话说，领袖也是群众的一分子，不是高高在上的什么上帝，他的认识比群众清楚些，他的能力比群众大些，他的英勇敏锐比群众多些，但他并不是什么超人。季峰先生说他们现在所有的学生领袖只是“平日学业不好的球员之类”，我们不相信季峰先生的全校同学里面都是“平日学业不好的球员之类”。倘若是这样，那末他们对于现有的领袖也不会发生什么不满，也不会不信任，因

为反正大家都是“平日学业不好的球员之类”!但是据季峰先生说,“同学们多有为救国而牺牲的精神”,可见在全体同学里面不是绝对选不出继起的领袖。(二)领袖的产生不是好像突然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艰苦斗争中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希望凭空有个完完全全的领袖出现,只要在许多“有为救国牺牲的精神”的同学里选出比较有能力和勇气的同学,让他尝试尝试,盘根错节,乃见真材,只要他经过相当的斗争时期,有相当的工作训练,他的领导的力量,可以从实践中进步的。当然,已培养好的领袖,一旦被“逼走”,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但是除非“前进的领袖”有回校主持的可能,徒然着急也无济于事,还是从速设法选出较好的代替人物吧。

关于会考。季峰先生认为“不应以反对会考为号召策略”,这在原则上是对的,因为救亡运动应该以救亡为号召,当然不应该以反对会考为号召。但是我们说不该以会考为号召,却不是说赞成会考,这却也有弄清楚的必要。会考是沿袭科举的恶习,流弊很多,我们是应该反对的。但反对会考和反对考试又当分别清楚,不可混为一谈。我们以为学生可以赞成平日的考试,使教师对于学生平日的成绩有适当的纪录,作为督促学生进修的根据,不必以会考临时的成绩作判定学业优劣的标准。这样只是反对没袭科举恶习的会试,而不是反对平日考察学业的考试,便不致犯着“自私”的毛病,也不致破坏群众的心理,在“平日学业不好的球员之类”的同学们,对于平日考察学业的考试,也要感觉头痛的!

编 者

几个疑问

韬奋先生：

我是一个极力想加入救亡运动的青年，在过去，也未尝没有努力。因为想组织一个有力的集体，所以常常如说教者的对于同事友朋之间去宣传我的私见，我想把每一个青年都养成有志为民族效劳牺牲的决心，然而到此刻为止，我依旧很孤单。我一方面知道我的才识薄弱，没有方法使人信仰；一方面却已生出了几点疑问，现在写在下面，希望你给我一个有力的答复。

（一）需要何种科学？　现在的中国，究竟需要社会科学呢？还是自然科学？这两重思想的对垒，常常在青年的脑际盘桓。我自己也是一个。中国的国势危殆，是大家知道的，然而就个人讲，要负起救国的重任，养成救国的力量，究竟需

要研究何种科学呢?

“中国是产业落后的国家,是大贫小贫的国家,既然是产业落后,那末无论怎样的研究改良政治,也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既然是大贫小贫,那末无论怎样的研究社会经济,平均分配所有,也不能使大家衣暖食足。”有些人这样说。还有些人以为:“自然科学虽能供给我们以力量,供给我们以建设的可能性;但当资本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两层压迫没有解除以前,这个力量不会抬头,这个可能性是不会存在的;就纵令这两层压迫已解除,如果对于中国的现状没有系统的,彻底的明了,俾得定下指导的方针,则这个力量也不能发展,这点可能性也不能实现的。怎样去解除压迫呢?最要紧的是在使大多数民众认识自身贫困的原因,知道斗争的步骤,而起来完成革命。”

前面两种论调似乎都有理,然而不知现在究竟研究何种切近。

(二)谁是领袖? 俗语说:“蛇无头而不行”,关于集体的行动,无论何事,当然需要领袖。

现在迫切的是“救亡”,那末光怀着一颗热烈的心而没有组织,没有人来领导,当然不会生出力量的。那末谁来领导我们呢?领导我们做些什么任务呢?

(三)思想的固执。 “你们尽空谈有什么用呢?你们没有枪杆去抗敌,没有什么效果做出来,你们只是空谈罢了!”

当有这种质问的时候,很难答复,我几乎气馁。“力量”、“效果”、“空谈”很刺耳的!

我固然知道他们的思想不对、固执,然而又太聪明了。可是我也知道:光是摇旗呐喊的宣传,或者有一个组织而作救国的预备,甚至请愿啦,游行啦,示威啦,都不见有何力量

的。

做些什么任务?生出何种力量?会不会有效果?我所知道的是没有效果也要奋斗,团结自有力量,而关于第一点,我自己也很模糊。

我应该对别人怎样解释?劝导?请给我答复。再则,有以上的质问的还是比较明白的,还有人以为:“救国不全是我的责任,有政府,有军队,何况真正救国是有罪的。”还有:“私货进来不在门口阻住,而要待散遍满地后再缉。现在的内地的百货公司,没有仇货决不会赚钱,政府不能助民生产,仇货却会帮商人赚钱!”这些又有什么话好说?

(四)危险。“救国有罪”,的确是幽默而可痛心的。这样,有什么人还敢干呢?

在先,我的朋友们拟组一个文艺社,想出一点小型刊物;我的意见,以文艺范围太狭,必需力求大众化。而他们笑着回答说:“你固然想去感化别人,然而当你言词稍形激烈时,你就有被捕的危险了。”请问有何方法可避免危险?

(五)救国集团的组织。除却无谓的牺牲外,危险不足惧;旁人思想固执,自己可以打定主意;没有领袖,也并非绝对不能干;那末我们一方面研究有裨于国家的科学,一方面作救国的预备,是应该的。

但是如何组织一个团体起来呢?如何宣传?如何组织?取什么名义?做什么任务?如何行动?谨以至诚请详细指导。

以上写得很没头绪,这是限于一个工厂小职员的时间,想先生还看得懂吧?

萧　始上　七,十三,无锡。

萧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有的可以就原则上答复,有的却须根据实际的环境里所有的客观的具体条件,加以考虑,不

是仅从抽象的原则上所能够解决的。

在这里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需要研究社会科学呢？还是研究自然科学？这个问题比较地可从原则上讨论。其实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不是“对垒”的东西；讲到需要，中国在目前都需要的。唯一的问题是要看我们的个性所近和学习的机会怎样。现在似乎有一部分人对社会科学不无一些反感，这里面大概不外两种原因：一种是有一班人把社会科学当“洋八股”读，满嘴公式化的新名词，对于中国的实际问题并不肯痛下切实的研究工夫，结果对于中国的实际问题的解决毫无良好的影响。还有一种原因是社会科学研究愈清楚的人，对于社会现状愈觉不满，在有些人看起来，觉得愈易于“捣乱”，不如糊涂虫的易于服服帖帖。但是这些纠纷，和社会科学本身都不相干。

萧先生所听到的“有些人”的话，也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产业落后，就技术方面说，固然需要有人努力研究自然科学，但和“改良政治”也不是没有关系的。政治不上轨道，产业难于发展，是很显然的事实。例如苏联五年建设计划的逐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已上了轨道的缘故。“研究社会经济”并非就是“平均分配所有”，这也是出于误会的。

第二是关于领袖的问题。关于救亡的组织，有的地方已有救国会一类的组织，主持救国会的人们便负有领导的责任。至于参加者的任务，那是要根据各人的能力和特殊环境而分工的。救亡的工作不是很简单的，需要各种各样的工作，和各种各样能力的人，分头努力，配合而成的。这各种各样的工作里面也有它的领袖，这要看各人所能做的是哪一方面的工作，便可注意哪一方面可以领导的领袖。

第三是任务的问题。“空谈”无用，这是当然的。但是研

究问题,宣传事实,以至工作上的检讨,共同进行的商量,都免不了"谈";"谈"而不"空",还是有效果的。"枪杆"固然是救亡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整个民族团结御侮的工作,并不是除了"枪杆"之外,便无事可做。至于各人所做的任务,那却要根据各人的能力和地位而定的。假使实在没有救亡组织可以参加,自己又没有发动组织的可能,至少也可于遇有机会时和周围的人们讲讲国难的实况,播种解除国难的种子,一旦遇有行动的客观条件,便可一呼百应,攘臂而起。倘若周围的人们渐渐为你所说服,也许有进一步组织一个小小研究会的可能,讨论讨论时事,或报告报告各人所喜看的书报,或把书报里所提到的问题共同研究。有些时候,也许还可酌请一两位外面的朋友,尤其是比较可以佩服的朋友,来参加研究或指导。这都是要看客观的现实而斟酌进行的,很难有一个呆板的公式。至于"想出一点小型刊物",如有已成熟的好意见供人参考,固是好事,否则似乎不必急急。

第四提到危险问题。在全民族团结御侮的整个局面未开展以前,往往有无谓的纠纷或误会,这也许是事实上所难免的。但这些困难只得用种种避免纠纷或消除误会的方法去克服它。有用的言词,也不一定要"激烈"。

第五是救国集团的组织,在"大众生活"上有好多文字研究到,这事也要看主观的能力和客观的环境,要根据实际的特殊情形酌定的。

编　　者

谋生与屈辱

韬奋先生：

我有一个穷苦的然而思想很前进的青年朋友，最近在生活上发生了一个难解决的问题，这问题经过好几个知己朋友的缜密的探讨，但是无论怎样，都得不着一个比较适当的办法，现在提出来想请求你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解答：

他的父亲在三年前跌入了失业的队伍里，三年来一家六口在穷困中挣扎着，不用说，我的朋友当然也跌入了失学的队伍，后来他好容易在一个商店里抢到了一个低微的店员的位置，月入十八元。他便把这十余元全数交给家里。在这生活高昂的都市里，这几个钱哪能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呢！于是借债、恳助，能走的路子都走到了，只能在忧愁与苦恼中慢慢的度过了一些岁月。到现在，这位朋友的低微的位

置也将不保了，因为过分的忧虑损害了他的健康，他的红润的两颊变得憔悴而苍白，活泼的动作变成迟钝呆板，因此，也就妨碍到他的工作，店里已对他下过好几次警告，他虽努力克服这些客观环境造成他身体上的许多缺陷，但主观的力量竟敌不过这强大客观力量的压迫，如这状态再延长下去，他恐怕也不免于跌入失业的队伍。

较后的事与更大的不幸我们且慢谈它，因为在这个不幸的社会里，一切的事都难以预想得准确。拿目前的事来谈谈，在目前我这位朋友的一家生活已极难维持，债台高筑了，借也无处去借，恳助也无处去恳助，十几岁的弟弟和妹妹站在面前，他们只认识几个有限的方块字，吃饭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教育问题自然无从谈起，然而，这种种恰好在吃饭问题的周围团团地凑成了一个严重的不能解决的问题。

他有一个亲戚，很有钱——是在旧军阀时代从民众身上刮来的，前些时也曾帮助过他们一些的金钱，但我们知道"为富"者往往都是"不仁"的，他们根本就把穷亲戚丢在脑后。最近这位朋友觉得实在过不了，就又写信去请求他帮助，信去后，接得他的一封回信，然而是空的。那信里说：你们穷我是很知道的，我也不会忘掉你们，我也愿意补助你们，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得服从！什么条件呢？说来令人又要气又要哭，他说：你的母亲必须与我住在一道，这封信是他这位有钱的长辈——姨父——直接寄给我们这位朋友的母亲的，朋友的母亲已经四十岁了，他的姨父已经五十余，现在他的姨母还在他家里度着姨太太的生活。

起始看到这封信，朋友认为是笑话，是侮蔑朋友，他母亲却一把眼泪鼻涕的诉起怨来了："不是开玩笑，是真话，这老鬼已经不止向我表示过一次这样的意思了，十年前他就

羡慕我，但那时因为你的父亲还做官，也有钱，我们和他一样，所以他不敢下手；现在，我们穷了，他的钱多了起来。我们求他帮助，他就用这个条件要挟。”母亲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朋友后，便坚决地表示了自己的主张：“我的儿子已经这么高这么大，我这一身就为了你——儿呀！不然，我老早就和你爸爸离婚了。我没有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儿子，现在我虽然穷，没有饭吃，为了儿子的体面，我不能再嫁任何人，我要为儿子的前途打算！”

朋友听完了这段话，呆若木鸡，不知所答，跑来和我商量，我又拿去和另外几个朋友商量，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吃饭与贞操”的问题。顾全了贞操与“儿子的体面”，朋友只得和他的母亲商量准备一家六口同时投江自杀；若要还在这人世间生活下去，而且朋友还愿意做一个变革社会的工作者的话，那末，只得恳求他的母亲“屈辱”一下。我们为朋友找出的路线只有这两条，然而，我们以为这绝不是完满的办法，也不知道究竟哪一条路线为对，认为有请求先生的解答必要。此颂

撰安！

王卓夫谨上　十，三，南京。

再：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答复请尽可能地快！

读“生活星期刊”第十六号，知道你们开始建立读者通信网，我愿自动担任一个通信员，上信就算作第一次通信吧。

又及。十，四，镇江。

王先生所提出的这个问题，还不纯粹是“吃饭与贞操”的问题。如果他的那位朋友的母亲真真是爱上了一个男子，

决意另嫁，这应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不应引起什么贞操问题。现在那位很有钱的亲戚却是要凭藉他的几个臭钱，强迫那位朋友的母亲出卖灵魂，这是最卑鄙可恶的行为，我们绝对不赞成她屈服于这种卑鄙的压迫。而且这种卑鄙龌龊的东西绝对不会有信义的，就是她自甘“屈辱”了，和那个狗东西“住在一道”之后，不见得他就真肯顾到她后面所带去的一大拖人的生计。

就一般说，经济问题是和社会问题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在社会问题没有得到“完满的办法”以前，个人的经济问题实在无法得到“完满的办法”，只有就个别的特殊环境努力实行可能的办法。像王先生的那位朋友，既有“好几个知己朋友”，这“好几个知己朋友”应该多方设法，把那位朋友的“十几岁的弟弟和妹妹”分别安插到可以吃到一口饭的工作处所，就是做些粗工，不拿钱，渡过目前难关，缓缓再想其他办法，也是一时的救急处置。如能使“弟弟妹妹”勉强做些粗工，混得一口苦饭吃，剩下父母两人是比较易有救济办法的。或由“好几个知己朋友”每人每月勉力凑出一些，也不无小补。同时这“好几个知己朋友”还应该常常劝劝那位朋友，思想前进的人对于现状的愤懑是免不掉的，但是如能这样勉强布置一下，就只得勉抑“过分的忧虑”，否则徒然“损害了他的健康”，于事丝毫无补。

我们不知道那位朋友的详细的具体的环境怎样，所能建议的只不过如此；倘有读者能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很愿意负转达的责任。

同时我们特把这封信公布出来，也是要显露社会上穷苦状况已到了什么地步，希望由此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编　者

热血沸腾的时候

韬奋先生：

我首先来替我自己介绍一下，我是一个知识幼稚、能力薄弱的女子。站在救亡运动的立场上，望先生根据我个人的能力和处境，来指示我怎样做一点救亡工作。

我从前因为向真理的追求，引起家庭的不满，乡里的仇视，在封建压迫重重的包围中，在旧礼教的势力下受尽了亲友的咒骂。使我这重受创伤的心灵，一变而为热狂，以致和家庭断绝了关系。我的丈夫，亦因为为大众奋斗而牺牲了，遗下未满周岁的孤儿，我为了生活的鞭笞，携着她到处飘泊，苦度着流浪的生活。在这含酸茹苦的生活中，现实告诉我，悲观颓废是无济于事的，我要以我这一息尚存的躯壳，为未来的希望，在人类最后的决斗的火线上，尽一点力量。

尤其当目前中华民族危急到最后关头，救亡运动的责任在每一个中国人热血里沸腾着的时候，我恨不能马上跑到前线上去，做点我所能做的事情，我相信我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但一个缺乏处事能力的我，始终为不能解决的问题束缚住：就是在这救亡运动的工作中，我怎样去做点工作呢？以我自己的处境和薄弱的能力，又能做些什么呢？这一个问题，在我脑海里日夜考虑着苦思着，始终想不出一个较好的办法。

因此我才敢冒昧的写这封信给先生，望先生介绍我同救国会发生关系，并望指示我一点办法。专此敬祝
刻安！

张海萍谨上　十一月六日，上海。

我看完张女士的这封信，对于她的在艰苦患难中的为国的血诚，十分感动，我要对张女士致无限的敬意；同时更想到无数的和张女士具有同样志愿的男女同胞，我独自发怔了好多时候。中华民族死里求生的大变动，显然不久一定是要到来的，我们的赤诚为国的满腔热血不怕没有冲洒的机会！

张女士提起"恨不能马上跑到前线上去"，我以为在中国，实际上已分不出什么前线和后方，因为我们民族敌人的魔手已伸到我们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讲到救国工作的危险，随处都有，所谓后方，并不减于所谓前线，虽则前线在有形的枪林弹雨之下的牺牲，是比较的易于看得见的。当然，我们倘有机会到前线的军事上去服务，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倘若机会还没有，或是这种机会一时还未到临，那也不必以此为恨，因为救亡的工作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努力，不一定要上前线去，而且讲到分工合作的原则，如果大家都

往前线跑，后方的工作没有做，也要影响到前线工作的进行。

至于每个人的工作，要看他的社会的关系，周围的情形，以及个人的能力，很难有一定的公式。我以为只须根据自己的能力，时刻留心国事的发展，和救亡运动的开展，随时随地都有救亡工作可以努力的。我希望张女士只须密切加以注意和考虑，不可过于灼急，因为我深怕过于焦急要急坏了身体，或甚至损伤到精神，这一点是很要注意的。关于救国会的事情，可径至本埠（按指上海。——编者）白克路大通里六号沈钧儒律师处接洽。此外如张女士有具体的问题，可以详细写信来，我们当竭尽所知奉告，如果我们的力量不够，也要代向其他朋友或专家商量。

编　者

自己不做人家做了又嫉妒

韬奋先生：

我是一个小学教师，我们的学校，在距离县城百五十里的乡镇上，虽然交通不便，可是在×县说来，算一个有名的乡镇，镇上有区署、民众教育馆和我们这所完全小学，拿文化来说，可算相当发达的乡区。

自抗战开始以来，敝校同人等有见于救亡工作之重要，对于宣传一项，推行不遗余力：组织新剧团，利用假期到各乡镇表演；平时在赶集的时候，经常的举行各种不相同的化装讲演；并且又把学校图书馆，辟为救亡室，订购民众需要的书报杂志，欢迎民众来校阅览；在校门外添设黑板两巨幅来写俗体的新闻和民众知识；并在课余，教师和学生都相率到田间去帮助农人作工藉以宣传，可是，这样一来，倒遭了

民教馆很大的嫉妒——尤其是这个馆长,在他的意思,似乎以为我们有点多事,这是他们的工作,我们帮他做了,对自己太失面子,所以由嫉妒而设法来危害我们的团体,利用种种手段来分散我们同事间的和好,用津贴来买动一个同事来捣鬼,又用美人计来破坏我们团体的名誉。有一次,我们学校里的劳动服务团到市面工作,发现该馆门前不洁,当然我们服务团就一视同仁地尽我们应尽的职责——代他扫除,谁知道这位馆长跑出来大摆其架子说,他的馆门口不要谁来管;我们的服务团员——这些小先生们,又气又恼,无可如何,只得罢了。在目前,许多民众教育机关,仍是保守成法!馆内摆几份报纸,写几句专电标题式的简报,一逢赶场,站在凳子上讲几句话就算完事,管你老百姓听不听,听了懂不懂,也不计及的,并且丝毫不设法改进或谋深入民间。除了一点表面工作之外,窥其内部,或减少员额,以图中饱,或则专门位置自己的亲属、朋友,一个民众教育馆的经费比一个完全小学并不少些,尤其是图书设备费,总在我们的二十倍以上,然而里面的书报呢?恐怕很多地方不及学校多(当然,办学校的人,也不完全是不弄钱的人)。先生,我相信这种现象全国还多着呢!这种久已潜伏后方的重大的危机,如果不加举发,不谋整顿,则抗战前途,何堪设想?我希望先生对于这方面发表一点意见,对这些负民众教育专门责任的人服一剂兴奋剂,给这些自己不做人家做了又嫉妒的人,以迎头痛击,来挽救这个危机。

谨致

民族解放敬礼!

杨 前谨上 五月十三日。

“自己不做，人家做了又嫉妒”，这是杨前先生在这封信里所大声疾呼的最沉痛的一句话。在我们负着言论责任的人，只能把这封信的内容公开宣布出来，一方面希望这类误己误国的人有机会看到，稍稍唤起他们的羞耻之心，更希望他们能痛自悔改；另一方面尤其殷切地希望对于这类人所把持的机关的上级机关，能加以切实的调查，执行切实的整顿。

我们在上面特别提起“误己”的字样，似乎还需要再加一些解释。这种人的误国，是很显然的，但是由他们自己看来，也许私心以为在他们个人是很可得意的，是很有利益的，因为——至少他们这样想——凭藉他们的势力抑制了别人的工作，使他们自己的缺点或“饭桶主义”不致暴露，这于他们自己似乎是很可得意的，是很有利益的，但是世界是在向前发展的，历史的车轮是向前推进的，只有在进步的大道上向前努力的人才有光明的前途，凡是违反历史规律而打倒车的人都只是自掘坟墓，必然是要在向前进的历史巨轮下被淘汰的。所以这类人不但误国，而且在实际上也误了自己，虽则后一点在他们是不自觉的。他们所走的是死路一条！

编　者

兴奋与苦闷

韬奋先生：

我是一个中学毕业生，曾在××机械学校里受了短期的训练，现在做一个航空低级技术工人。在科学竞争的今日，能够做一个技术工人，觉得非常地荣幸，尤其是航空事业，全世界认为最进步最科学的事业，同时中国的航空方面，比较别的还算有点进步，所以我做一个航空工人，虽不能说对国家出了怎样的力，然而能够参加抗战工作，自身觉得格外的兴奋。可是我常常感觉到有些苦闷和悲哀：

（一）科学的发明，应当有丰富的学识和老练的经验，同时还要有试验的耐心，百屈不挠的精神。记得某次在××工厂里工作，有一位同事，因为他平时对于工作，非常感觉兴趣，他于是利用他的脑筋，把几种工具改造一下，结果，制造

出来的东西，比较要精确、迅速，后来被一位主官知道，不独不鼓励他，而且还要沉痛地责罚他，说他不应该用这种脑筋；又说："你凭什么资格来改造、发明？简直是妄想，没有高深的学识，根本谈不上！假如这样容易的话，那我主官可让你做了，真是笑话！……"可是事实已经做出来给大家看了，都认为有采用的必要，而这位主官反拿这种态度对待人，是不是应该的？我认为他根本就不配做工厂厂长，徒然尸位素餐，于国家有害。本来，科学的进步要靠大家互相研究、试验和天才的发展，岂可以说没有高深的学问，就没有改造的能力呢？

（二）在科学昌明的大时代里，工人是重要的骨干。看看我们的友人——苏联，就可以知道了。可是在我们这里事实恰恰相反，不独不提高劳工地位，而且用种种手段来压迫劳工，使你不能和他们反抗。（因为他们是高级技术员或者是与技术无关的官长，他们利用官的势力，来压制你，侮辱你，假如稍为不对，就要拘禁你，使你敢怒而不敢言，终日沉于痛苦悲愤之中。）终日虽是仍然在工作，但精神上已受了莫大的痛苦。这样，能够使得工业有进展么？我非常悲观。

（三）在××机械学校里读书，因为有初级和高级的分别，于是校里的图书馆，又分起阶级来了，初级的学生，简直没有读书的权利，因为高级学生是高等的，看初级学生不当做人，认为初级学生没有阅读高深图书的资格，我真不明白，在任何一个机关，没有说图书馆还要分等级。我可以说办学校的人，根本不明白教育原理，这样不是在贻害青年么？使青年不能利用充分的脑筋去读书，不能发展他的思想和天才，这简直是摧残教育，太危险了。虽然一再和学校交涉，但总是拿"官"的威权，来压服你，还有什么理讲？

以上不过略举数点，不仅是我个人认为苦闷，而且我敢大胆地说一句：全国的××低级技术工人都认为苦闷。可是，这种苦闷又向谁诉说呢？谁又来同情你呢？

韬奋先生：我是你的忠实的读者，希望你不要讨厌我，来指示我脱离了这个苦海，那我感激不尽了！耑此，敬请
撰安！

读者李寿田上　八，二十六。

李先生在这封信里所举的几件事实，当然都是不合理的。第一，关于发明的事业，一定要有什么资格才行，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们在欧美的许多发明家，尤其是在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所倚靠的许多发明家中，就可寻出不少工人出来。最近的例子如苏联的斯达汉诺夫，他只是一个开煤矿的工人，但是因为他发明了特别有效率的采煤方法，苏联全国把他视为英雄奉为至宝，热烈欢迎与鼓励，可谓空前，他不但震动了全苏联，而且震动了全世界，谁不听到所谓“斯达汉诺夫运动”这个含义深远的名词！但是他只是一个煤矿工人，却能成功“主官”所不能成功的伟大事业！“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每一个工人都能尊重及宝贵他的创造力，都能时常留心运用他的创造力，不仅以有了一个斯达汉诺夫为满足，要产生无数的“斯达汉诺夫”。在那位“主官”的荒谬态度之下，不但不能鼓励有创造力的工人如斯达汉诺夫之类，而且要忍心摧残有创造力的工人如斯达汉诺夫，这真是倒行逆施的行为，为我们所当鸣鼓而攻的社会蟊贼。

第二，我们不否认工作纪律的重要，但是工作纪律是要用教育和说服的工夫，是要使工作者彻底明了，而且参加工作纪律的规定，由此产生自觉的工作纪律，才能增加工作效

神，绝对不是“主官”们摆臭架子的机会，更不是“利用官的势力来压制你，拘禁你，使你敢怒而不敢言”的勾当！

第三，图书馆里的读者或研究者要依“资格”分什么等级，这也是一种创闻，不知是哪一位“主官”运用他的创造力创造出来的！诚然，研究自然科学的，有相当的阶段，读过第一阶段的才易于接读第二阶段的内容。但是学生们尽可以依他的能力，随时作进一步的研究，不必在图书馆里剥夺他的“阅读高深图书的资格”；而且真没有“阅读高深图书”能力的人，也不会白费工夫来借阅“高深图书”，捧着出神，所以在事实上也没有剥夺任何学生“阅读高深图书的资格”的必要。这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还要用什么“官的权威来压服”，真是何苦来！

但是我们却不赞成李先生要“脱离这个苦海”的态度；我们对于不合理的社会，要用种种方法克服它，而不应逃避它。李先生要继续他的航空技术工人的光荣的任务，有志改造或发明工具的人要继续他的努力，对于种种不合理的待遇要用种种合法的、诚恳和平的方法争取改善。在未达到目的以前，决不灰心，决不逃避现实，只是继续不断的向前努力。

编　者

职业妇女的苦痛

韬奋先生：

我看到“全民抗战”第一三一期“论坛上一个新被注意的老问题”和同期社评“法国妇女将以生育为专业”一文，不禁感触万端，尤其是看到这篇社评里的这一段话：“生育是妇女为人类社会尽的一种神圣的任务，我们不但不轻视，而且异常尊重，但是正为着妇女为人类社会尽着这个神圣的任务，我们应实行种种方法，减少乃至消除妇女在这方面的痛苦与负担，使这件事不致妨碍到她们在事业上的工作与成功。”我原是一个职业妇女，结婚以后，因家庭简单，我的丈夫有他的职业，我也保持着我原有的职业，各尽各的力量为社会服务，我并没有因有了小家庭而抛弃我的职业，但是最苦痛的事不久就来了，那就是在我生育了一个孩子之后，

简直没有办法再继续我的职业!在吃奶的时期,二三小时即须吃一次,我的办公的地方又没有可以让我喂儿的余地,时间上也不许可。请奶妈吧,物色了好几次,要请医生验一下,她们都不肯,但是不经医生验一下,我又不放心,因为我曾有友人请奶妈不慎,无辜的孩子染着了梅毒,发觉后已经害了孩子的一生,这是我所无法容忍的残酷的危机。于是我不得不长期请假了,因为在我们这样单纯由两个人组成的小家庭,这个可怜的孩子,除了我自己看护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嘱托代理的。我起先以为这是暂时的性质,所以也只得安之,但是祸不单行,第一个孩儿尚未尽离乳期,第二个孽种又来了,这样拖下去,我的“长假”便“长”到今天,大孩子两岁多,二孩子一岁多,都须要我看护。交给老妈子吗?我看到友人家里的孩子交给老妈子,都远不及母亲的周到,甚至使孩子受着不应受的苦,看了就不禁替孩子叫屈。我当然要想到托儿所,曾经由友人介绍去参观过一次。托儿所已如凤毛麟角,不易找到,找到了去看看,我对于他们的看护也不满意,甚至感觉到和交给老妈子也不会好多少。于是我又踌躇了!

我不是没有服务社会的能力,也不是没有职业的机会,更不是不愿意为社会服务,但是事实逼迫我不能跳出当前的苦境,这怎么办好呢,我现在只有于两条路中选择一条:要末不顾孩子的福利,忍心抛开他们,恢复我的职业;要末为着孩子的福利,苦痛地抛弃了职业,安心看护我的可爱的两个孩子。我正在忧心如焚地为自己考虑这个问题。我的丈夫赞成我为社会服务的志愿,但同时也极爱我们的两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想不出完全可以兼顾的办法。我自己有着这样的苦衷,看了“论坛上一个新被注意的老问题”和“法国妇

女将以生育为专业”后，更不胜其悲愤，为什么“老问题”尽管拖着不能解决呢？顺颂着安！

王惠娟上 二十九，八，十七。

王女士在这封信里所提出的问题不只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妇女界的一个待决的问题，再扩大点说，也可以说是一个待决的社会问题。王女士很亲切而沉痛地告诉我们她的经历的苦况，已经够使我们注意与深思。但王女士的苦况并不是仅有的例子，只是许多职业妇女所感到的苦况之一个例子。依记者个人所接触到的事实，就不可胜数。有一部分的职业妇女生育了孩子，除把乳期缩到极短外，就把看护之责推给“老家”——推给阿婆或外婆。老太太总是爱孙子或外孙子的，所以推给她们老人家，比较是相当稳妥的，虽则有的老太太溺爱过甚，又缺乏新的常识，仍不无流弊，但一般地说来，总还是职业妇女脱身的一个办法。提倡妇女就业，却须靠着不就业的老太太来“救济”，这已是很矛盾的现象，而且下一代未见得仍有这样的老太太，那又怎么办呢！这且不去说他，即这样的“老太太救济”，仍然不是第一个职业妇女可以得到的，小家庭与老太太往往不同在一地，生了孩子要派专差送到老家去，不是都能办得到的事，有的干脆没有了老太太，于是仍然发生问题。我亲见一个职业妇女因为忙于喂儿，办事效率大减，被她的职业机关停了职。又亲见一个职业妇女因就业的地方离家较远，把不到一岁的孩子扔给她的丈夫，丈夫没有办法，带到办事处的寄宿舍里，暂时放在同事的床铺上，他隔几时就须跑到那里去把婴孩抱到外边来“把”屎尿，可是照料难周，不时的屎尿已把同事的床铺弄得一塌糊涂。“天怒人怨”，他的“办公”因被“办私”

所分散，他的职业机关对于他的感想如何，那更是不得而知了！旁人看到这种情形，都怪他的夫人太忍心不顾孩子，但是她为着了事业，又何能怪她呢？我们当然不是说这个做丈夫的所感的麻烦，他的夫人就应该不认为是麻烦，我们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这类的麻烦必须有个办法来解决，不应一面高呼妇女应该走出家庭就业（这事的本身当然是对的），一面却无视职业妇女的这种事实上的困难，社会方面不负起合理解决的责任。又亲见一个职业妇女，她是一个青年寡妇，因为要保持自己的职业，在重庆一个乡间，多方寻得一个托儿所，一个孩子每月要三十元的费用，她把一个二三岁的孩子送去了。最近她抽暇去看看她的十几天未看见的孩子，不料所看到的是一个满头生满热疮哭丧着脸无人理会的苦孩子，该所既没有医生，也不打算把孩子送医生处诊治，也不写信通知家属，她忍着泪说不出话，抱着孩子就走，至今不知道怎样办法好！这种情形使我们感到即令有了托儿所还不够，还要办得过得去，肯负责任，使做父母的勉强可以放心，否则身在办公室，心飞托儿所，还是要影响到工作情绪的。

上面随手拈来的几个例子，只是千万事中之一，如果搜集这类材料刊印专集，一定是洋洋大观。因为在事实上有着这类情形的存在，所以一般职业妇女结婚后最怕的是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就要妨碍到她的职业。有的生了孩子并不把孩子当作一回事，不把孩子的福利放在心里，死活随他去，马马虎虎处理一下，或放弃责任，就算了事。（这当然只是举出客观的事实，不在责备这类职业妇女的本身，因为这种情形必有客观的缺憾促成的，我们如不注意客观缺憾的补救，尽管责备个人是没有多大效用的。）前者的流弊是妇

女职业愈发达，国民的生育率愈减低，为害于国家民族是不言而喻的。后者的流弊是即令生育了新国民，由于得不到相当看护与教养，得不到健全的国民，对于国家民族也是有害的。我们在这里所得的结论，当然不像顽固派所主张的，所谓"生育为妇女的事业"，我们在这里所要郑重指出的是：如果真正提倡妇女职业，这种困难是应该迅速设法解决的；否则所谓提倡妇女职业，提倡妇女为社会服务，都是空谈！

这种困难并不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多多创办负责的托儿所便是一个现成的办法。苏联是真正实行妇女解放的一个地方，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而在苏联随处可以碰到的是托儿所。你在那里的工场，农场，办事机关，乃至学校，乃至火车站，都可以看到托儿所！他们在托儿所中请有专科医生，请有训练过的女看护，对于儿童吃的奶都须按孩子年龄，加以科学方法的规定，有各种各式为孩子设备的游戏，不但消除了职业妇女的牵累，而且还同时大大地增强了下一代新国民的身心的健康基础。在他们，托儿所的大量设立与积极经营，虽只是减少或消除妇女困难，增加妇女福利的一种设施，但是对于职业妇女可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贡献。

"有一件事是我们所应彻底了解的：苏联对于两性平等的全部方式，和资本主义国家里女权主义者对于此事（按指育儿）所采的方式不同。苏联对此事的注重点是：两性须有平等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权利及机会，同时应以特别的权利赔偿由生育儿童所引起的任何负担。在别方面，在像英国的这一类国里，因历年的失业，发生各种'人口过剩'的理论，通常所注重的是主张妇女有生育儿童的权利，视为两性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见拙译"苏联的民主"一五五页）三民主义的中国，对两性平等的原则，载在中山先生的遗教中，

在理论上是不成问题的，现在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必须在事实上真能设法消除妨碍两性平等的弊病，然后才能真正实现两性平等的希望，在这方面，广设托儿所，为职业妇女减少痛苦，实为极重要的一件事情。大都市如重庆，托儿所屈指可数者不过一二个，且都不满人意，至于稍稍偏僻的区域，更连影子都看不到。

以上都是对整个妇女劳作对象而略加讨论的，因为我们认为王女士所提出的问题，实属有关整个妇女界的问题。至于王女士个人的问题，在比较可以满意的托儿所(及幼稚园)出现以前，是很难得到圆满的解决办法，不得已而求其次，也要看王女士的具体情况及环境而尽可能设法，我们很难凭空代为设计。现在姑就悬揣所及，举出下列几点，以助商榷：(一)倘若经济上可无问题，是否可以请一个保姆代为看护孩子，使自己可以抽身出来做自己所能做的职业；(二)如保姆请不起，是否可以物色到比较聪明清洁的阿妈，代为照顾，自己于业余也略作督察的工夫；(三)倘若这两层都办不到，余下的只有再打听打听看有没有托儿所比前进步一些，虽则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比较可以满意的托儿所可供介绍；(四)倘若这一层也办不到，我们当然不敢主张把孩子抛在马路上，可是也再想不出王女士怎样可以脱身的其他的办法！

如有其他读者能根据实际的经验指出其他的好办法，希望让我们知道，除为转告王女士外，还可以刊载出来，以供其他有相类苦况者的参考。

编　者

离意大利后的杂感

记者上次通讯谈到离开那不勒斯时为止。我们于八月十五日晨离开那不勒斯，当晚九点左右到意大利西部的比萨。该处最令人留恋的是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研究"引力定律"(Law of Gravitation)所在的斜塔。该塔为十二世纪遗物，高一百七十九尺，斜出十四尺，全部用石造成，中心是空的，最外的墙和中心周围的墙的中间，有螺旋式的石级可以上去，有二百九十六级。我们都跑上最高的一层，可望见全城，在中学时代读物理学就耳闻这个斜塔，不料现在得亲历其地。此外还看了许多排列着的十三世纪遗下的石造的古棺和棺外的许多古雕刻。

我们十六日下午离开比萨到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产生所在的热那亚，仅略作游览，并瞻仰哥伦布的石像，即赴在

意大利人口最多(八十六万余人)的米兰,也是在意大利最繁盛的一个商埠,丝业市场占欧洲第一位,且为意大利法西斯的老祖宗墨索里尼的发祥地,一九二二年他率领十万"黑衫党"向罗马出发,就从此地作出发点。该地的新造的大火车站,就是为着纪念他的。全部用钢铁镶着厚玻璃造成,高有两三百尺,上面也用钢铁及镶以厚玻璃作大半圆形的盖,里面容下了十几个月台及轨道,出口处的大柱及石级都是用大理石制成,堂皇得很,据说可算是欧洲最大的火车站。该城的街道很像上海的南京路和静安寺路。

我们于八月十七日下午十二点十八分离开米兰,两点钟火车开进了瑞士国境的齐亚索(Chiasso),便和意大利告别了。记者草此文时(八月二十二日)已身在日内瓦的一个旅馆的房间里,但关于瑞士的印象,当另文记之,此时请先述我离意大利后的杂感。

关于意大利的政治和民生方面的观察,上次通讯里已略有提及。关于一般人民的习性方面,印象也不见佳。记者所有机会接触的大概偏于城市的人民,乡村方面怎样,未敢妄断;且无论何国,均属良莠不齐,其间不过程度问题,故亦未能一概而论。但就所觉察者而论,意大利人的做事马虎,实随处可以看出。在意船上剪发,即已觉得,很卤莽地几下一剪,就算完事,同船的旅客戏呼为"杀头",记者也这样地被杀过一次头,破费四先令六辨士,合华币三块半大洋!有某君"杀头"之后,发现两边太阳穴的发脚修得一高一低,大家看见了,戏称为一九三四年的新式!后来我在那不勒斯的旅馆里又"杀头"一次,也是受着同样的待遇,甚至没有把布围着胸部和背后,他就要"开刀",幸而我自己留神,赶紧把房间里的白色洗面巾拿来围上。这样在几分钟里开了几刀

之后，索取列拉四个，等于中国大洋一块，但比船上已客气得多了，而马虎的程度却先后辉映，或有过之无不及。试再举一事：我们在威尼斯的某旅行社买火车票，把所经过的地名开得清清楚楚，把这张单子交给该社的一个职员，说明在某处因欲游湖，所以那一段路乘小轮船而不乘火车（该处连票可有这样办法）；他弄错了，在票上写明全乘火车，我们当然和他大办交涉，他说火车轮船不是一样吗，硬要我们马虎，我们坚执不肯，闹了好半天，后来他终于很不高兴地换过一张。在瑞士的火车上贴明"不许吸烟"，即不得任意吸烟，在意大利便马马虎虎，火车的壁上尽管贴着"不许吸烟"的通告，大家仍可马马虎虎地吸着。意大利除极少数的城市外，大概都随处是肮脏的，无他，也是马虎而已。

我在未出国前，到过欧洲的朋友都说游历意大利最不易，因为往往要上当或受欺骗。此次同行中有一位因有事要赶到火车站去一趟，求迅速起见，就叫一辆零租汽车乘去。这种零租汽车上面原有行程表，走了多少路，应付多少钱，这行程表的机械都能自动地载明，照理没有欺骗的余地了，但是那个汽车夫却把这位朋友开到别的地方去，半途停下，假说刚才听不清楚，一看表上已须两个半列拉（一个列拉合华币两角半），这位朋友气极了，打算就付给两个半列拉了事，不再乘了，刚下去兑换零钱后，回头一看，车上的表已被车夫用手法改为三个列拉，这位朋友却也强硬，无论如何，只肯付两个半列拉，车夫无可奈何，拿了钱大骂其日本人！（因为他把这位朋友当作日本人。）这位朋友当然还是吃亏，因为他仍是白付了车费。

不过平心而论，意大利却有胜过中国的地方，最显明的是他们的交通比中国便利得多。记者此次游意，由该国东南

而东北，折往中部，直趋南部，又由南部而西南，而向北，经重要城市八处，差不多在该国东南西北兜了一个圈儿，而实际在火车上所费去的时间不过四十小时左右，两天还不到；比之在中国有的省份要走三个月才能到，而且还要由外国兜个圈子进去(例如云南)，那当然好得多了。虽然中国区域比意大利的大，但他们的铁路网连络全国各城市，路路通，我们却老是这几条老铁路，好像就此终古似的，确是无可为讳的事实。其实我们除开口五千年亘古文明外，现在有什么胜过人家！意大利不过是欧洲各国中的一个“瘪三”，但却仍比我们胜一筹，说来惭愧！

最后还有一件小事，虽非尽关意大利，但也可以附此说一说，那就是游历欧洲，只有英国用得着英文，其余各处，英文随处“碰壁”，法文最便，几于可通行全欧各国，其次要算德文。我只有英文能运用自如，法文虽在学校里读过两年，久已归还给先生了。自从独自一人旅行后，不得不温习几句法语来勉强应付(幸而带了一本法语会话)，但临时抱佛脚，如何够用？故已决意到法国后要把法文弄得像样些，至少要能很顺利的看书报和谈话，否则不但游历各国时处处不便，而且失去不少谈话的机会。例如从佛罗伦萨到罗马的火车中，同车厢里有个意大利女子说懂法文，想和我谈话；从苏黎世到伯尔尼的火车中，有个瑞士工程师想用德语或法语和我谈话；从伯尔尼到日内瓦的火车中，又有两个瑞士老者想用法语和我谈话。这类平民的谈话，就他们各人的地位，可探出不少有价值的材料，但我都交臂失之，真是憾事。(由罗马到那不勒斯火车上曾和一位能英语的奥国大学生详谈，今晨在日内瓦曾和一个苏格兰的大学生详谈，他们都是乘暑期到国外游历的，但这种谈话机会究不及多和本地人

谈。)倘正在大学里的朋友有第二外国语的功课,奉劝用功些,不要效法意大利人的马虎主义,就是不一定到欧洲去考察,多一求知的工具,也是便利的事情。

二十二,八,二十二,记于日内瓦。

出了世界公园

瑞士全国不过一万五千余方哩，人口约四百万。这个小国的风景秀美绝伦，人民都衣冠整洁，似乎都能安居乐业，处处令人歆羡，但近数年来也不能不受到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失业问题虽不及他国的严重，但也很足以使当道者苦于处置了。瑞士的工业出产品，以表为大宗，但自世界不景气以来，瑞士法郎价值又高，国外贸易不免大受打击，因此表厂有不得不停办的；就是规模较大，维持能力较厚的大厂，也不得不减少工人，有的竟减少一半，所以失业工人尤以表业为多。各邦（瑞士的每一个邦，他们称为“Canton”）对于失业工人的救济办法虽非完全一致，大概每人每月可领失业救济费一百法郎左右（瑞士法郎约合华币八角，等于华币八十圆了）。领失业救济费的不许娱乐，例如在戏院中查

出，即须受罚。这种消极的支持办法，数量一天一天地加多，便是一个难题了。此外瑞士既是“世界公园”，公园是要靠有人来游的，然后才有相当的收入。瑞士因是各国人士喜游的胜地，所以旅馆业特别发达。我们游意大利，觉得有三多：教堂多、喷水池多、叫化子多。瑞士至少也有四多：湖多、山多、旅馆多、菜馆多。无论穷乡僻壤，Hotel（旅馆）和Restaurant（菜馆）两个字的招牌随处可以见到，所以瑞士其实也可以称为“旅馆国”。他们有旅馆专门学校，听说别国要开讲究的旅馆的，往往从瑞士特聘“旅馆专家”去设计或主持，其声价可以想见。但自世界经济恐慌以来，各国到瑞士的游客因而大大地减少，虽有“专家”，无可奈何，关门大吉的旅馆也不在少数。

瑞士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在表面上，比起别国来还算好，但在心里如何，有一件事实可以表示大概。有位朋友自德国到意大利，经过瑞士，在火车上遇着一位瑞士商人，和他谈起天来。他问：中国和日本的问题现在怎样了？还在打吗？某君说：在表面上是不打了。他说：日本既已得到了满洲，当然用不着再打了。某君说：中国并未答应日本。他笑着说：日本在实际上既得到，中国不抵抗，何必得到中国口头上的答应？他又接着说：日本人口繁盛，势不得不如此。某君说：中国人也不少，如以此为理由而掠夺他国土地，于理讲得去吗？他回答说：像日本那样的民族应该让他们繁盛扩弃起来，像中国这样的民族，越少越好，至于理由恕我不便奉告了。他的意思显然是说中国是劣等民族，还是减少或甚至消灭了爽快！某君听了大气，和他大辩了一番，结果不欢而散。

这个瑞士人的心理至少有两个要素：一是崇拜强权；二

是老实把中国看作劣等民族,活该受人侮辱蹂躏!真实这不仅是这个瑞士人的心理,据记者出国后所听到国外侨胞的诉说,仅可说是欧洲一般人的普通心理,不过不便在嘴上明说罢了。我常于深夜独自静默着哀痛,聪明才智并不逊于他国人的中国人,何以就独忍受这样的侮辱和蹂躏!

在瑞士的中国留学生从前有六十几人,现在只有二十几人,此外便是来来往往的中国青田籍的小贩约百余人,替中国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瑞士对于外来的小贩原发两种执照:一种是货样执照,每年只须纳费二百法郎,但不能直接售货,只能示买户以货样,有要买的,再回去将货物由邮局寄出,价值由邮局代收;还有一种是直接售货的执照,那就可以直接售卖货物,可是每月就须纳费数百法郎。因此青田小贩只领货样执照,却私下偷售货物,被警察查出后,第一次罚款,第二次驱逐出境,将护照没收。但青田小贩往往能改名换姓,假造新护照卷土重来,又被查出,尝了铁窗风味若干时后再被驱逐。惟瑞士警察当局觉得防不胜防,特定新例,须盖手印。外人对盖手印看得很重,只施于强盗一类的重犯,视为很大的耻辱,但做了中国人有什么话说,要盖便盖就是了!

关于海外青田人的可怜,还有一件事可附记在这里。据一位在德国海得堡城(Heidelberg)留学的朋友谈起,说去年耶稣圣诞节时候,该城有个中国青田小贩演了一幕悲喜剧。他在电车上放着一只箱子在进口处,有碍交通,售票人叫他拿开——他不懂德语,置之不理,票人强他下车,他虽不懂德语,但骂人的德语却学会了几句,下车时便对售票人骂了一句:“你是德国的猪猡!”售票人听了不答应,下来和他办交涉,德人围着看的越来越多,其中有一个很气愤地质问这

小贩，说骂人就骂人，何以要加上“德国”一字？他仍听不懂，只看见许多德国人围着，便索性破口大骂一句：“德国人都是猪猡！”结果大家不答应他，把他捉将官里去，坐了六个月的监牢，但他始终莫名其妙！

二十二，八，二十八，下午，记于巴黎。

巴黎的特征

记者于八月二十三日夜里由日内瓦到巴黎，提笔作此通讯时已是九月六日，整整过了两个星期，在这时期内，一面自己补习法文（昨据新自苏联回巴黎的汪梧封君谈，在苏联欲接近一般民众，和他们谈话，外国语以德语最便，其次法语，英语最难通行），一面冷静观察，并辗转设法多和久住法国的朋友详谈，所得的印象和感想颇多，容当陆续整理报告。现在先谈谈巴黎的特征。

讲到巴黎的特征，诸君也许就要很容易地连想到久闻大名的遍地的咖啡馆和"现代刘姥姥"所宣传的什么"玻璃房子"。遍地的咖啡馆确是巴黎社会的一个特征，巴黎街上的人行道原来很阔，简直和马路一样阔，咖啡馆的椅桌就几百只排在门口的人行道旁，占去人行道的一半，有的两三张

椅子围着一只小桌子，有的三四张椅子围着一只小桌子，一堆一堆的摆满了街上；一到了华灯初上的时候，便男男女女的坐满了人，同时人行道上也男男女女的熙来攘往，热闹异常，在表面上显出一个繁华作乐的世界。在这里可以看到形形式式的“曲线美”，可以看到男女旁若无人似的依偎蜜吻，可以看到男女旁若无人似的公开“吊膀子”。这种种行为，在我们初来的东方人看来，多少存着好奇心和注意的态度，但在他们已司空见惯，不但在咖啡馆前，就在很热闹的街上，揽腰倚肩的男女边走边吻，旁人也都像没有看见，就是看见了也熟视无睹。但我们在“繁华作乐世界”的咖啡馆前，也可以看见很凄惨的现象！例如衣服褴褛、蓬发垢面的老年瞎子，手上挥着破帽，破喉咙里放出凄痛的嗄噪的歌声，希望过路人给他几个“生丁”(一个法郎等于一百生丁)；还有一面叫卖一面叹气的卖报老太婆，白发瘪嘴，老态龙钟；还 有无数花枝招展、挤眉弄眼向人勾搭的“野鸡”。有一次记者和两位朋友同在一个咖啡馆前坐谈，有一个“野鸡”不知看中了我们里面的哪一个，特在我们隔壁坐位上(另一桌旁)花了一个半法郎买了一杯饮料坐了好些时候，很对我们注视，后来看见我们没有人睬她，她最后一着是故意走过我们桌旁，掉下了手巾，俯拾之际，回眸对我们嫣然一笑，并作媚态道晚安，我们仍是无意上钩，她才嗒然若丧的走了。她这“嫣然一笑”中含着多少的凄楚苦泪啊！(不过法国的“野鸡”却是“自由”身体，没有什么老鸨跟随着，可是在经济压迫下的所谓“自由”，其实质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听说失业无以为生的女工，也往往陷入这一途。)

至于“现代刘姥姥”所宣传的“玻璃房子”，并不是有什么用玻璃造成的房子，不过在有的公娼馆里，墙上多设备着

镜子，使几十个赤裸裸的公娼混在里面更热闹些罢了(因为在镜子里可显出更多的人体)。据“老巴黎”的朋友所谈的这班公娼的情形，也足以表现资本主义化的社会里面的“事事商品化”的极致。这种公娼当然绝对没有感情的可言，她就是一种“商品”，所看见的就只是“商品”的代价——金钱。有的论时间而计价钱，如半小时一小时之类，到了时间，你如果“不识相”，执事人竟可不客气地来打你的门！不过有一点和“野鸡”一样，就是她们也是有着所谓“自由”身体，并没有卖身或押身给“老鸨”的事情；可是也和“野鸡”一样，在经济压迫下的“自由”，其真义如何也可想见，在表面上虽似乎没有什么人迫她们卖淫，尽可以强说是她们“自由”卖淫，实际还不是受着压迫——经济压迫——才干的？这也便是为民主政治下的藉来作欺骗幌子的一种实例！世间变相的“公娼”和“野鸡”正多着哩！

据在这里曾经到过法国各处的朋友说，咖啡馆和公娼馆，各处都有，不过不及巴黎之为尤盛罢了。

记者因欲探悉法国的下层生活，曾和朋友于深夜里在街道上做过几次“巡阅使”屡见有瘪三式的人物，臂膊下面夹着一个庞大的枕头，静悄悄地东张西望着跑来跑去，原来这些都是失业的工人，无家可归，往往就在路旁高枕而卧，遇着警察，还要受干涉，所以那样慌慌张张似的。法国在各帝国主义的国家中，受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比较的还小，据我们所知道的，法国失业工人已达一百五十万人，但法当局讳莫如深，却说只有二十四万人(劳工部最近公开发表注册领救济费者)，最近颇从事于修理各处有关名胜的建筑和机关的房屋，以及修理不必修的马路等等，以期稍稍容纳失业工人，希冀减少失业人数装装门面，但这种枝节办法能收

多大的效用，当然还是个问题。向政府注册的失业工人每月原可得津贴三百法郎，合华币六十圆左右，在我们中国度着极度穷苦生活的民众看来，已觉不错，但在生活程度比我们高的法国，这班工人又喜欢以大部分的收入用于喝酒，所以还是苦得很，而且领了若干时，当局认为时期颇久了，不管仍是失业，突然来一个通知，把津贴停止，那就更尴尬了。这失业问题，实是给帝国主义的国家"走投无路"的一件最麻烦的事情。

但是在法国却也有它的优点，为产业和组织落后的殖民地化的国家所远不及的，记者当另文叙述奉告。

二十二，八，六，晚，记于巴黎。

瑕瑜互见的法国

资本主义的国家原含有种种内在的矛盾，它的破绽随处可以看见，但是平心而论，它也有它的优点，不是生产落后、文化落后的殖民地化的国家所能望其项背的。例如记者现在所谈到的法国，第一事使人感到的便是利用科学于交通上的效率。在法国凡是在五千户以上的城市，都可由电车达到；在数小时内可使全国军队集中；巴黎的报纸在本日的午后即可布满全国（关于法国报业的情形，当另文记之）；本国的信件，无论何处，当天可以达到；巴黎本市的快信，一小时内可以达到。巴黎的交通工具，除汽车、电车及公共汽车外，地道车的办法，据说被公认为全世界的地道车中的第一。这是研究市政的人告诉我的，我虽未曾乘过全世界地道车，但据亲历的经验，对于巴黎地道车办理的周到，所给乘

客的便利和工程的宏伟(有在地下挖至三层四层的地道,各层里都有车走),觉得实在够得上我们的惊叹。全巴黎原分为二十区(arrondissement),有十三条的地道车满布了这二十区的地下,成了一个很周密的地道网。你在许多街道上,常可看见路旁有个长方形的大地洞,宽约七八尺,长约十二三尺,三面有铁栏杆围着,一面有水门汀造的石级下降,上面有红灯写着"Metro"(即"地道车")的字样,这就是表示你可以"钻地洞"去乘地道车的地方。撑着红灯的柱子上就挂有一个颜色分明、记载明晰的地道车地图,你一看就知道依你所要到的地方,可由何处乘起,何处下车。走下了石级之后,便可见这种地下车站很宽大,电灯辉煌,何处下车。有如白昼,墙壁都是用雪白的磁砖砌成的,你向售票处(都是用女子售票)买票后,有椅子备你坐着等车,其实不到五分钟必有一列车来,你用不着怎样等候的。这种地道车都是用电的,每到一列总是五辆比上海电车大半倍的车子,里面都很整洁,中间一辆是头等,外漆红色,有漆布的弹簧椅,头尾各二辆是普通的,外漆绿色,里面布置相类,不过只是木椅罢了。车站口有个地道车地图,上面已说过;车站里还有个相同的地图,入车站所经过的路及转角都有大块蓝色珐琅牌子高悬着,上面有白字的地名,你要由何处起乘车,即可照这牌子所示的方向走去上车。乘车到了那一站,也有好儿块这样的地名牌子高悬着给你看。在车里面还有简明的图表高悬着,使你一看就知道所经过的各站及你所要到的目的地。他们设法指示乘客,可谓无微不至,所以除了瞎子和有神经病的先生们外,无论是如何的"阿木林",没有不能乘地道车的。有的地方达到目的地车站时,因"地洞"较深,怕乘客步行出"洞"麻烦,还有特备的大电梯送你上去。这种地道

车有几个很大的优点:(一)车价便宜,头等每人一个法郎十五生丁(法国一个法郎约合华币二角,一个法郎分为一百生丁),普通的每人七十生丁,每晨在九时以前还可仅出八十五生丁买来回票(因此时为工人上工时间,特予优待)。(二)买一次票后,只须不钻出“地洞”之外,你在地道里随便乘车到多远的地方都可以。(三)各条地道纵横交叉,你可以随处换车,以达到你的目的地为止。因为车辆多,这种换车很迅速,不像在上海等电车,往往一等一刻钟或半小时。我们做旅客的只要备有一小本地道车地图,上面有各街道,有各条地道车,“按图索骥”,即路途不熟,什么地方都可去得。记者在这里就常以“阿木林”资格大“钻地洞”,或访问,或观察,全靠这“地洞”帮忙(汽车用不起,电车、公共汽车价也较昂,且非“老巴黎”不敢乘)。

除交通便利外,关于一般市民享用的设备,有随处可遇的公园,无论如何小的地方,都有花草和种种石像雕刻的点缀,使它具有园林之胜。马路的广阔坦平更不必说,像上海的大马路,在巴黎随处都是。此外如市办的浴室,清洁价廉,每人进去买票只须一个法郎(另给酒钱约二十五生丁),就可使用一条很洁净的浴巾(肥皂须自带,临买票时如买肥皂,五十生丁一小块),被导入一个小小的浴室里去洗莲蓬浴。这种浴室虽有房间数十间,只楼下柜台上用一个女售卖员,楼上用一个男子照料,简便得很。进去洗澡的男的女的都有。记者在巴黎洗的就是这样简易低廉的澡,因为我过不起阔老的生活。

当然,如作深一点的观察,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常会拿这样的小惠来和缓一般人民对于骨子里还是剥削制度的感觉和痛恨,但比之连小惠都说不上的社会,当然又不同了。

其次是他们社会组织比较地严密。每人一生出来就须在警局注册，领得所谓“身分证”(Carte D'identité)，以后每年须换一次，里面详载姓名、住址、父母姓名、本身职业及妻子(如有的话)等等情形，每人都须随身带着备查。每人的这种“身分证”都有三份，一份归管理户口的总机关保存(大概是内政部)，一份归本人保存，一份是流动的，就存在这个人所在地的警局里，如遇有迁居，须报告警局在证上填注新址并盖印。如遇有他往的时候，亦须先往该警局通知，由该警局把这份“身份证”寄往他所新迁的所在地的警局存查。外国人居留法国的，也须领有这种“身份证”。这样一来，每人的职业及行动，都不能有所隐瞒，作奸犯科当然比较的不容易。在中国户口的调查还马马虎虎，这种更严密的什么“身分证”更不消说了。

不过从另一方面想来，这种严密的办法，其结果究竟有利有害，也还要看用者为何类人。在极力挣扎维持现有的不合理的社会的统治者，反而可藉这样严密的统治方法来苟延他们的残喘。但是这是用者的不当，社会的严密组织的本身不是无可取的。

二十二，九，十五，夜，记于巴黎。

操纵于资产集团的巴黎报界

巴黎是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中心，它的报纸不但执法国全国的牛耳，好像上海的报纸之于全中国一样（虽则天津的"大公报"在华北近已渐占较大的势力），而且是国际上所严重注意的，但是巴黎的重要报纸全在资产集团的掌握之中。这个集团就是法国特有势力的资本家所组织的"铁业委员会"(Comité des Forges)。这个把持法国舆论机关的"铁业委员会"虽号称铁业，并不限于铁业资本家，像香水大王古推(Francois Coty)也是其中重要的分子，这大概是因为最初范围较狭，后来逐渐扩充，而会名却仍旧保存着。

巴黎报纸有一千六百种之多，其中有六十种是含有政治意味的。在这许多报纸里面，最重要的也不过二十家左右。关于巴黎的报纸，徵言先生从前在"生活"周刊通讯里曾

有一文说得颇详，记者现在只谈谈尤其重要的几种报和值得注意的一些情形。

我们在国内即久闻巴黎“时报”(Le Temps)的大名，凡是研究及注意政治的人，大概没有不常看的，它的最大特点就在能做法国外交部的“先声”，每遇法国外交部方面将有什么举动，它就先在外面造空气，所以看“时报”得窥见法国外交的趋势。但是它却又不是法国外交部的正式机关报。据熟悉法国外交界情形的友人说，因有一次该报的主笔是外交界中人，于是因历史的关系，便沿袭下来。又据说法外交部有一特殊情形，即传统的外交政策，很难由一新部长来就完全改变，不随政党进退的部中要员(尤其是秘书长)都有潜势力，对各专门的案件都有一定的态度，做部长的即有所主张，至多只能缓缓地改变。“时报”所造的空气是法国外交部的意思，却不一定是外交部长的意思。其实既以侵略为目的，和缓叫你生肺病，激进叫你生急病，在受侵略者都得不到什么便宜。巴黎“时报”是晚报，很为政界要人所重视，但因为看的多是所谓“上流人物”，销路只有四五万。可见办报必须有其特点，有了特点，销数虽少，还是有它的力量。(巴黎“时报”的政策自是另一问题。)

法国报纸，除左派如社会党及共产党的机关报对中国不说坏话外，其余报纸对中国的态度没有不是坏的，尤其是在“九一八”之后受了日本的收买。像上面所说的“时报”，虽偏助日本，还不怎样明目张胆；还有和“时报”差不多的晚报，名叫“雄辩报”(Journal des Débats)就更公开的骂中国而袒护日本。但“雄辩报”还不及早报名叫“巴黎回音”(Echo de Paris)对中国更坏，在中日事件发生后，该报天天骂中国，把中国骂得太坏了，骂得太不像样了，以致引起一般读

者的怀疑，最后甚至不能相信他们的话！

这都是些有名的报纸，但因受日本“经济运动”的结果，竟颠倒是非，一至于此，岂不可怪！后来弄得就是法国读报的人，大多数都知道此中内幕，成为公开的秘密。社会党所办的“光明周刊”(La Lumière)，老实公开的说法国报都被日本人买去了！这样看来，中国的不争气，固还是铁一般的事实，而日本之心劳日拙，也是很显然的。听说法国只对外如此，对内则须受法律的制裁，不敢这样乱来。不过当十九路军在淞沪血战抗日的时候，事实过于显明，法国报纸也多少变了口吻，无法说谎。当沈阳不抵抗之后，他们的报纸倍加揶揄，弄得不少在法国的中国人没有面孔见人，多不敢外出，到了这短时间内“无法说谎”的当儿，他们才又大模大样的出去。当时十九路军所以得到海外侨胞的热烈尊崇，不是没有理由的。

巴黎报纸销数最大的有四家，都是早报。它们销数所以比别报多，因为不但本埠读者多，外埠读者尤多。一个是“小日报”(Petit Journal)，一个是“小巴黎人报”(Petit Parisiens)，这两家报每天销数各近两百万份。它们的名字上虽各有个“小”了，其实是大报，并非小报，虽则欧洲报纸的形式多巧小玲珑，和美国大而且多的不同。此外有一个是“晨报”(Le Matin)，一个是“日报”(Le Journal)，这两家的销数每天各近百万份。这四家销数特大的报纸都和所谓“铁业委员会”有关系，那是不消说的了。

香水大王古推除参加“铁业委员会”外，还自己出资创办一种早晚报(早晚都有)，名叫“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价钱非常便宜，比别的报纸便宜一半，早晚报合起来的销路已有七八十万份，听说已贴去几百万圆。古推自己常

在该报上大做其文章,最近提出“法国的安全问题”,连日登着,登完后又在组织一个会,以招致同志。有人说他有意入政界,将来也许终有登台的一天。以他这样一个坯子,如有登台的日子,能干出什么政治来,可不言而喻了。关于他,有一点更值得中国人注意的,就是他反对中国很厉害,袒护日本很起劲,而他的“古推牌”的香水在中国的销路却很好,赚中国人的钱来办报打中国人的嘴巴!有位朋友很愤恨地叫我不要忘却在这里宣布一下,我觉得用钱请人打嘴巴确是不很合算,我不买“古推牌”香水者以为如何!

在巴黎报界后起之秀的有个“巴黎晚报”(Paris Soir),在巴黎很盛行,一到傍晚,满街都是“巴黎苏阿”(该报名称的译音)之声,使我想起在上海马路上所听到的“大晚夜报”的呼声同样的热闹。

二十二,九,十九,记于巴黎。

纸上自由

我国俗语有句话叫“纸上谈兵”，我觉得英国和法国的“民主政治”倘若比专制的国家有不同的地方，最大的特点可以说人民的确已得到“纸上自由”了。这所谓“纸上自由”，也可以说是“嘴巴上的自由”。

要明白这特点，需要相当的说明。

法国的报纸，无论极左的报或极右的报，对于政府的批评指摘，都尽量地发挥；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和共产党的机关报，对政府更往往抨击痛骂得体无完肤，从来没有因言论开罪当局而有封报馆、捕主笔的玩意儿。议员在议院里当面斥责政府要人，那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号称“巴立门的母亲”的英国，为欧洲“民主政治”国家的老大哥；关于“纸上自由”或“嘴巴上的自由”，也可算是发

挥到淋漓尽致了。尽管听任你在文字上大发挥,尽管听任你在嘴巴上大发挥,但在行动上,这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好像铜墙铁壁似的,却不许你越雷池一步!

英国自命为“君子人的国家”,有许多报纸上的言论,都是雍容尔雅,委婉曲折的,但是像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报”对于现任首相麦克唐纳之冷嘲热讽,甚至瞎寻他的开心,往往有很令人难堪之处。独立工党机关报之“新导报”和共产党机关报之“工人日报”,对于统治阶级之严厉的评论,明目张胆宣言非打倒现政府,并推翻现统治阶级,一切问题都无从解决。这在专制或军阀官僚横行的国家,直是大逆不道,老早把“反动”的尊号奉敬,请贵报馆关门,请贵主笔大尝一番铁窗风味,或甚至非请尊头和尊躯脱离关系不可!但在英国不但这种报纸尽管继续不断地发挥他们的高论宏议,就是研究社会主义的机关,或共产党的出版机关所编行的书籍,直呼现统治阶级为强盗,也得照常发售,从没有听见政府当局说他们有反动嫌疑,非搜查没收不可。

还可举个具体的例子。英国是个君主立宪的国家,一般人民对于英皇还不得不有虔敬的态度,各戏院里末了时还都须唱着“上帝佑我皇”的歌调。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巴立门”举行开幕典礼,训辞中提到经济恐慌和失业问题,有“我的人民继续情愿忍受牺牲”之语,共产党机关报之“工人日报”在第二日的报上,不但在言论里极尽揶揄,并且登一个恶作剧的插图。把英皇画成一个矮子,手上捧着一大张“皇上演辞”,下面注着上面所引的那句话。英皇后面,一个高大的警察和首相麦克唐纳扶持着一个“失业新律”,是准备在议会通过以压迫工人的,再后面便是一大堆工人群众示威高呼“一致摧毁‘全家总收入调查法’”及“打倒造成饥饿和

战争的政府!”等口号。这种实际情形和“继续情愿忍受牺牲”的“皇上演辞”,“适成相反的对照!尤其是把“皇上”画成那副尊容!但是“工人日报”照常公开发行,并没听见它得到了什么大不敬的罪状。“皇上”的威风比我国的任何军阀官僚都差得远了!所以我说,“纸上自由”可算是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英国“巴立门”里的“嘴巴上的自由”,记者在“巴立门的母亲”一文里已略为提起。上面所谈的最近“巴立门”开幕的那一天,还有一件事情颇有记述的价值。那天举行开幕典礼的时候,英皇在贵族院里刚才把演辞说完,听见有一人大声问道:“关于取消‘全家总收入调查法’和失业救济费折扣两事,究竟怎么样?”大胆这样向英皇问着的是独立工党议员麦阁温(J. McGovern)。他接着喊道:

“你们是一群懒惰好闲的寄生虫,靠着别人所创造的财富过活。外面人民是正在挨着饿,你们应该觉得自己羞耻吧。”

当时与会的许多贵族们和议员老爷们都相顾惊愕,麦阁温大喊之后,从容步出会场,典礼也随在静默中收场。后来这位独立工党的议员还是继续做他的议员,没有听见他得到什么大不敬的罪名。这种新闻,如在我们贵国,早给检查新闻的老爷们扣留,不许刊登,但在英国,各报仍在第二天照事实登出,“曼彻斯特导报”并在社论中警告政府,谓麦阁温的行为虽卤莽,但人民的困苦,实其背景云云。所以我说,“嘴巴上的自由”可算是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这当然是处身军阀官僚横行的国家里面的人民所垂涎三尺的权利,因为在这样的人民,只有受压迫剥削的份儿,连呻吟呼冤都是犯罪的行为!

但是进一步讲，终究还仅是“纸上自由！”在行动上，统治阶级的爪牙——警察、侦探等……也就防范得厉害。有位朋友在伦敦某处演讲，演毕后，有位共产党员顺便开着一辆破旧的自备汽车送他回家，就有警察暗随在后，把他的住址抄下，第二天便向他的房东盘问得很详细。又如在伦敦专售共产主义书报的工人书店，外面就常有便衣暗探注意买书的人的行踪。有一次我和伦敦报界某西友在某菜馆里午餐谈话，我们所谈的是关于英国新闻事业的情形，但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不久就有侍者偷偷地来关照，说外面有警察注意着。他们简直好像布满着天罗地网似的！

二十三，一，二十五，伦敦。

游比杂谈之一

在欧洲的北部海岸，法国和德国的中间，有两个小国家，那就是比利时和荷兰。这两个小国的人口都在八百万人左右，是在欧洲经过战争最多的一块地方，这不但是因为这一块地方的南部(即比利时)是正夹在法德两大国的中间，为这两大国扩充地盘时常争的地带，而且也因为这两小国有了欧洲最重要的几条河的出口，为斗争的媒介。但这两个小国家虽被人加上一个“小”字，在你抢我夺的这块地方上，居然能靠着自己斗争的力量，终于能维持他们的自由平等的地位(当时的国际形势当然也有关系，但根本还是靠自己斗争的力量)，这时来自“大”国的我，来自“大”而任人宰割的中国的我，到这两国里看看，实在没有法子消除我的惭愧的心影。

记者于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九点十五分由巴黎动身，十二点便到了比京布鲁塞尔(Bruxelles)。在火车里遇着一位荷兰老者，和他的妻子同坐在一个车厢里，他们俩的头发都白了，至少都在六十岁以上的年纪，而体格康健，却无异于四十岁左右的壮年。这老者能英语，我和他谈话之后，才知道他在荷兰经营船业已四十年了，听他的口气，好像是一个轮船公司经理。我问他荷兰船业最近情形如何，他说没有一个轮船公司不蚀本的，现在只得勉强维持现状，以待转机。我们知道荷兰的国力，最依靠的是他们的商业，尤其是航业。荷兰的航业到现在，虽远不及十七世纪独执世界牛耳时代，但仍占很重要的位置，他们靠着均衡出入口的差异，这是最主要的要素。但据这个经营船业四十年的老者说，现在却没有一个轮船公司不蚀本的，这也是因为他们逃不出世界经济恐慌的漩涡。

在国外遇着外国朋友，十八九要问你中日问题怎么样了，这个老者也不能例外。他似乎很抱憾地说，中国不能打，最没办法，我便把十九路军在淞沪打日军情形告诉他，他听得津津有味，随听随译给他的夫人听。我想，我们还有十九路军拿来遮遮面孔，但以偌大的中国，只有这昙花一现的十九路军，这面孔还是遮不了！

记者到比国的时候，正值他们一“丧”一“庆”的当儿。我到的那一天(二十二日)，是爬山跌死的比王亚尔培大出丧的日子，也就是他们的国丧；第二天是比国新王利奥波尔第三宣誓登位的日子，也就是他们的国庆。在这两天，满街人山人海，比京附近各城的人都特为跑来看热闹，我就好像看了“比国人民展览会”。在新比王和他的王后的“銮驾”经过街道的时候，两旁挤得水泄不通的人丛中，都挥巾或挥帽欢

呼;有的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一点儿看不见国王或王后的脸,也大脱其帽,这种敬重王室的心理,在我们看来真觉莫名其妙。比王未葬前,陈尸三日,一任人民观看;各处人民到比京列队循序进去观看者,每日十余万人。听说有的看了流着眼泪,有许多情愿饿着肚子,或一夜不睡,列在队中立着,等候进去一看。这里面大概为好奇心所冲动的也不少,不过据说比王亚尔培在国王中算是很忠于国事和爱护人民的,所以确也留下了不少的哀思。

现在比国的政治和外交是唯法国的马首是瞻的,所以法国的政治如果没有什么大变动,比国的政治也就亦步亦趋,不会有什么大变动。比国的政党有天主教党,里面包括的是教徒、农民、资产阶级;自由党,里面包括的有财阀、工商界的领袖和一部分的知识阶级;社会里,里面包括的有工人,由知识阶级中人如大学教授、律师及其他自由职业者做领导;共产党。势力以天主教堂和社会党的为最大,但经济实力操在自由党的手里。现在的局面,是天主教党和自由党联合战线压倒社会党,前两党为在朝党,后者为在野党。在这种形势之下,政治上的大权握在什么阶级的手里,可不言而喻了。共产党在国会里也有两三个议员,当二十三日那天新比王在国会里宣誓时,各党议员呼国王万岁,共产党议员则大呼“民国”万岁,大家也莫奈何他们,这如在以“马氏交通”触犯刑章的国家里,当然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讲到经济方面,比利时是欧洲最工业化的国家里面一个老资格,列日(Liége)的煤,在中世纪就有名的,铁和钢的工业,在十八世纪的末叶就发展了,现在这三种工业仍占最重要的位置。此外关于锌、铅、玻璃、纺织,也有大量的生产。从事农业的人民不到五十万人,从事工商业者却在两百万

人以上。自世界经济恐慌发生以来，愈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倒楣的程度也愈高，比利时虽向来有富庶之称，也不能例外。试看他们的统计：一九三一年工人失业人数为二十万零七千人；一九三二年增至三十五万人了；一九三三年增至三十八万三千人了。所以在比国布鲁塞尔极宽敞平滑的马路上，两旁的洋房和树荫多么美丽，你在这美丽的环境中就可发现着衣服破烂的变相的乞丐。有一个清晨我和老友寄寒伉俪同在这样的一个道旁散步，就两次遇着这样变相的乞丐，手里拿着几根铅笔，伸着手向你要钱。其中有一个还有羞答答的样子，大概是初上任的，还没有得到多大的经验！据寄寒说，这都是失业的工人，在两三年前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

布鲁塞尔有“具体而微的巴黎”之称。居民八十五万人，街道整洁，建筑美丽，市政修明，确很可引起人们的美感，但比巴黎当然尚望尘莫及。建筑物以大理院(Palace of Justice)为最宏伟，价值六千万法郎，占地比罗马的圣彼得教堂的地盘还大。欧洲的宏伟建筑物，最多的是教堂，其次是皇宫，此外则大理院也常夹在里面凑热闹，为游客常到之处。在我国，游客要特跑到审判厅去看看，大概很少。布鲁塞尔比巴黎，“微”则有之，“具体”还说不上。不过有一件事却不很“微”，那就是在热闹街市如 Boulevard Adolphemax 一带，华灯初上，野鸡如鲫，我和寄寒伉俪及王君勤安等顺道过此，目见甚多。据说野鸡之外，还有不少公娼，那更可和巴黎分庭抗礼了！

记者在比虽仅前后四天，除到罗文(Louvain)半天外，承蒙寄寒贤伉俪差不多天天陪伴着游览，所看的地方不少，比较重要的是他们博物馆的设备，国家虽小，对于民众教育的

努力并不小。在同往参观历史博物馆的那一次,在同时游客中有三个美丽活泼的比国少女(依中国女子标准看去有十六七岁,在她们身体发育健全,据说实际都还不过十三四岁),其中有一个尤秀媚,忽对我们几个外国人注意,跟着我们一块儿看,最后临别时,彼此分开了,她们还回过头来嫣然对我们说"再会",我们也欣然还报以"再会",虽心里明知道这"再会"是大概绝对没有希望的,可是那天真少女的美感,至今还萦回脑际。

比国的最大的殖民地是在南非洲的刚果(Congo),在比京时也特地去看了他们的殖民地博物馆,内容是动植矿物的生产之丰富,同时用相片和模型表示土人之野蛮和迷信等等文化落后的情形,受尽了种种的榨取剥削,还落得个不名誉的结果!比利时本国的全部面积不过一万一千余方哩,而比利时的殖民地刚果却有九十万余方哩,大了九十倍左右!

在比京也有所谓"无名英雄墓",即在世界大战中阵亡兵士的坟墓。在马路上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不但走路的人都自动地脱帽致敬,就是在电车里的乘客,也都自动地脱帽致敬,这也可见一般民众教育的程度。记者也路过几次,尤其令人连带回想的是一九一四年蕞尔小国的比利时因德国侵入国境而英勇抗战的经过。德国原答应比国如许他们假道,决不侵犯,而比国毅然不许,当年八月五日,德军开始攻击,比将勒孟(Leman)率领比军抗战四倍人数的德军至四十八小时,最后因避包围,退至 Fort Loncin,仍收拾残军抗战,坚持一周之久,勒孟战倒于残墟中,昏迷失却知觉,被德军掳去,此役比军死亡四万八千人,德政府第二次提出要求假道,仍被比国拒绝,以后的情形,读者诸君都知道,用不着记

者赘述。总之德军绝对不得在比国“不抵抗”中爽快通过，要进一步，便须吃进一步的苦头！当年十月十八日至三十日，德军要通过比国的野塞河(Yser)，被比军作十余日的死抗，比军死亡一万四千人，其英勇尤为历史上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页，比军坚守这一小块仅余的国土，直至一九一八年大战终了时为止，未曾被德军占去，暴敌侵入国境是什么一回事，还有什么苟安图存的余地！比利时虽是蕞尔小国，她所以能卓然立于世界，也全靠这一点英勇抗战令人不敢轻视的精神。当时毅然主持抗战的比王亚尔培和首当其冲而死抗到底的勒孟将军所以能留永思于比国人民心中者，不为无故。

一九三四，五，十一，伦敦。

游比杂谈之二

比利时是在欧洲经过战争最多的一个地方，这在上面已提及。滑铁卢(Waterloo)之战，也是这许多战争里面最著名的一个。记者曾于三月二十三日午后，和寄寒伉俪偕往滑铁卢一游，整整费了一个半天的工夫。滑铁卢是一个居民仅有四千人左右的小村，在比京布鲁塞尔之南十一方哩，由布鲁塞尔去，乘一小时的电车可达。在一八一五年的六月，这是英将威灵顿(Wellington)驻扎抗战拿破仑的地点。拿氏以神出鬼没的战术，怀囊括全欧的野心，几于所向无敌，最后经滑铁卢一败，真是中国话所谓“一败涂地”，皇帝没得做，关到圣赫伦那(St. Helena)岛上去，五年后便以一死了之。在当年六月十八日那天交绥的处所，就在这滑铁卢村上一个小墩名叫 Hougomont 的上面开始。现在仅是一个农场。设有

一个陈列馆,陈列关于该次战争的遗物,在楼上有个圆形的大画室,却很别致,中间一个大亭,亭的周围有围栏,围栏外面离七八丈的周围,便挂着高十余丈的大油画,围着这个亭子。油画的内容是描写当时联军和拿破仑军队交战的情形。油画的下面和亭外的空地接连,在地上使用真草,茅屋,以及逼真的人马枪炮等等的模型布置着,油画的上面是画着蔚蓝的天空,和亭子上面接连着,全部用电灯衬托出来,使看的人从亭子里看出来,好像身临战地似的。除这个陈列馆外,还有一个纪念此次战事的人造的狮子山(Mont du lion),这山是比利时于一八二三年及二六年间造成的,山高约一百五十尺,周围约一千七百尺,顶上中间有个铁铸的大狮子,二十四吨重,从山下可由二百二十六级的石级登到狮子的座子,座子周围及石级两旁都有铁栏杆围着。我们三个人都鼓着勇气爬到最高顶去远望了一番,这附近的四围便是数十万大军搏战之地,便是叱咤风云一世之雄的拿破仑大吃败仗的所在!天已渐渐地阴暗起来,匆匆下山回来,在电车里已是万家灯火了!

看到这个战地,使我回想到历史上关于此役有件趣事,那便是拿破仑自信必胜,唯恐威灵顿乘夜不战先逃!在六月十七日(一八一五年)的那个夜里,威灵顿和拿破仑的两方军队均驻扎在滑铁卢,等天明交战。拿皇帝把胜仗拿得十稳,深恐威灵顿在当夜乘黑暗中逃走,特于这个夜里——已经半夜了——离开他的居屋,只带着柏塔郎大将(Marshal Bertrand)一人相随,步行走出他的禁卫线,竟大胆地走到威灵顿驻扎地的前面周围的丛树附近。这时已是夜里两点钟了,拿皇帝在万籁俱寂中倾听,忽然听见有一队敌兵在黑暗中的步伐声,他想这一定是威灵顿乘夜里黑暗中拔营,这一

营大概是他的最后的卫队了！他此时绝对梦想不到第二天威灵顿的军队会那样的死抗不退。虽以拿破仑的将才，一有轻敌之心，也免不了大吃败仗，这倒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

记者于三月二十四日的上午费了半天的工夫去参观比国一个文化中心的罗文，有“比利时的牛津”之称，由比京乘火车去，不及一小时即到。罗文是属于比利时的卜拉邦(Brabant)省的一个城镇，居民约有四万人，而在该处的罗文大学的学生却有五千人左右，所以满街随处可以碰到男女大学生。他们或她们虽穿常服，却都戴有不一律的制帽，各科各级的学生，都各有其特殊颜色和标志的制帽，使人一望而知，有的制帽像我们所常见的睡帽一样，各学生同时是什么学会或团体的会员，还把许多金的或银的五花八门的徽章插在帽上的周围，很特别。该校虽男女同学，向例男同学和女同学不得两个人(即仅仅一男一女)在街上同时，否则一被学校当局看见，即须传去问话，麻烦得很，所以在街上确看不见有这样的现象，顽固习俗可笑，究竟不知道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该校以医工较著名，中国留学生有二十余人，前“大晚报”记者张君也在该校肄业，记者到后，承他引导参观。罗文街上极少车辆，清静安逸，与布鲁塞尔迥异。著名建筑有五百年历史的市政厅、宏丽的教堂及大规模的图书馆等。当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该城被德军占据，有意放火焚烧，连烧三天，烧毁了一千多屋子，存有十五万卷以上名著的图书馆也遭了这个浩劫，大战结束后，屋子已大多数重建，图书馆也重建了(大半出于美国人的捐款)。在德军侵占比境时，比国当局只想到死抗暴敌，并未曾想到一面准备不抵抗，一面把这些宝藏搬移到别处去，这大概因为他们深

知国土一块一块地被暴敌侵占去，国且不国，搬移实藏何用！况且他们没有不平等条约的妙用，没有什么租界可供移藏宝物，这也是比不上我们的！

比利时虽小，最有名的报纸，也有八九种之多，以“晚报”(Le Soir)为最盛，印刷精美，插图尤佳，听说销数每日近百万。该报虽号称“晚报”，每日出版四次，每次遇有最新要闻，即加以补充。第一次约在下午三点半，第二次下午六点半，第三次夜里九点半，第四次半夜，便须在第二晨售卖了，故实际已包办了全日的新闻。至于各报对中国的态度，也学着帝国主义的大国的模样，尤其是学着英法报纸的常态，那就是不登中国的消息则已，一登总是丢脸的消息居多！不过仔细想来，这也不能尽怪别人，因为我们自己，尤其是负政治上责任的人，先要问一问我们自己是不是要脸，先要问一问我们自己干了什么不致丢脸的事情！

最后请谈谈在比的中国人。在比国的中国学生约有二百余人，在安特卫普(Antwerp)当水手的有百余人，青田小贩来来往往的也有四五十人。不久以前有驻西班牙的某比领受贿滥给护照，我国的青田小贩因纳贿而溜入比境者不少，后来这个领事的舞弊情形被比政府发现，革职查办，青田小贩被连累的都被驱逐出境。在这些脑子简单的青田小贩们，认为花了钱得到了护照，有什么错处，故常到中国使馆请办交涉，而中国使馆则以此事在比政府认为违法行为，无法可想，在法律上收贿者固被认为有罪，纳贿者也不是堂皇的事情，弄得很僵，况且做的是中国人，除准备着被驱出境的份儿外，更有什么话可说？

讲到在比的中国青田小贩，去年八九月间却发生了一件趣事。有三个青田小贩同住在一个比国人的家里，那家房

东有三个女儿，正好配上了这三位青田小贩，都发生了关系，其中有一个女儿年龄还在十六岁以下，于是她们的父亲在法院提出诉讼，控告他们。但是房东太太以她的这个丈夫在外面有了一个姘头，平日不但不住在家里，而且置经济于不顾，还是这三位青田仁兄常常接济她的家用，所以到开庭审判的那一天，这位非正式的丈母娘在法庭上大帮这三个青田小贩！那天观审的很多，中国使馆也派有人去旁听。那位房东太太当着大众，对法官口若悬河地大讲她的一大篇大道理！她历数丈夫种种不顾家庭的罪状，极力赞扬这三个中国人如何如何的好！法官问问那三个女儿，也都说母亲的话不错，并且都表示愿嫁给这三个中国人。结果那个父亲大吃瘪，那三位祸中得福喜出望外的青田仁兄各拥着娇妻，凯旋而回！这个案件，比国的报上只字不登，因为如把那位"丈母娘"的"中、比人的优劣论"那一篇大文章发表出来，在他们当然认为是和比国人的体面有关系的。

还有一件事，在布鲁塞尔的大规模的理发店里，请了两位中国的扦脚专家！我们中国洗澡堂里的扦脚情形，想读者诸君都知道的。这两位扦脚专家因为来修脚的多属舞女，享尽艳福，每月各有三五千法郎的收入，一位娶了法女为妻，一位娶了比女为妻。中国人在欧的著名的职业，一为洗衣，一为烧 菜（开饭馆），现在大概要加上了扦脚！在巴黎时，有的法国朋友说，你们中国人的菜当然好吃，因为你们有了五千年的文明，烧菜的研究也有了五千年的历史了！现在出了扦脚专家，不知和五千年的文明也有什么关系没有！

比国人对中国的态度，讲到政治的方面，比国外交向来是亲法的，唯法马首是瞻，法在外交上对中国的态度既不佳，比也可想而知，例如中日事件发生后，比政府的态度即

偏袒日本。讲到一般民众方面，可以说大多数对中国完全莫名其妙，大概看到青田小贩，便认为是中国人的代表，对于中国女子的印象，每以为仍是小脚，穿着他们在博物馆里所见的那种小脚鞋。（寄寒的夫人生得娟秀，在比外交界便很出风头，报上把她的相片登出来，即每有出门，街上行人都要特别注意她，也可以说稍稍替中国女子争得一点面子，至少使他们知道中国的女子和他们殖民地博物馆里所陈列的刚果女子究竟不同！）不过他们里面有一部分人因为本国无所不小，而觉得中国则那么大得吓人：讲面积，一来就是四五百万方哩。（比国面积只一万余方哩）；讲人口，一来就是四五万万人，（比国人口只八百万人）！但是中国那么大，人又那么多，而却又那么无用——至少在现状之下——大概他们不免更觉得诧异吧！

一九三四，五，一四，伦敦。

所谓领袖政治

记者于三月二日上午十点二十七分钟离开荷兰的商业首都阿姆斯特丹，当夜九点三刻到柏林。

到柏林后，常听到德国人互相见面打招呼时，不像法国人之叫“Bon jour”（日安），或英国人之叫“How do you do?”（你好？），却叫着“Heil Hitler!”（大概可译为“希特勒万岁！”）这大概是捧领袖的意思，虽则有些德国朋友私下告诉我，说有许多是在威权压迫之下，要保全自己的饭碗，不得不这样叫一下，在实际上所叫的不是希特勒“万岁”，是他们自己的饭碗“万岁”！

此外在照相馆玻璃窗内所陈列的，满山满谷的形形式式的希特勒的相片；在雕刻铺子或铜铁铸像铺子的玻璃窗里所堆着排着的，也是大大小小无微不至的希特勒的造像，

这大概也是捧领袖的意思。这类相片或是造像里所表现着的希特勒，当然都是威风凛凛，神气活现的态度。他的政敌里面有的竟敢恶作剧，不知怎样弄到一张呆头呆脑的照片，据说是希特勒一岁时候的真面目，拿来各处广发！还有人把他的相片另印一下，在头发上面加一个小小的列宁的相片，和发纹稍稍混乱，使人粗看不知道，略一细视，才看得出，也拿来用秘密方法广播全国，党老爷们（国社党）也许还很热心地帮同推广，以广宣传，后来发觉，极力禁止，却也"宣传"得不少了！

讲领袖政治的，大概都很提倡对于领袖的盲目的奴性的服从。（服从原也有好的方面，如服从真理，服从所信仰的主义，服从正当的规则及值得服从的人物等等，但和盲目的奴性的服从，在性质上当然有很大的差异。）像意大利由法西斯党所办的青年团团员正式加入做党员的时候，必先宣誓"愿无讨论地（Without discussion）执行领袖（Il Duce，指墨索里尼）的一切命令……"我在德国时，也常常听见这里有几万公务员，或那里有几万国社党党员，聚拢来举行大规模的宣誓礼，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绝对服从希特勒"。

无论什么性质的集团或机关，只须是有"群"的形式，在职务上的需要，当然有领袖的必要；就是我们寻常组织一个旅行团，如人数较多，为种种事务上的便利和需要计，我们也常要公推一个适于做团长的人，代表大家的公意和需要，主持一切，他的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能把这一团人所要解决的事情解决掉，倘无法解决而又装腔做势，尽管吹牛，谁来睬他！倘若这个团长仅勾结几个坏蛋，为少数人的私利，摧残大多数团员的福利，用残酷的手段压迫大多数团员，还要以"领袖"自居，认为"领袖"是天生的，你们这般团员活该像

奴隶似的受统治,这又成了什么话呢?

现在德国各校所用的历史教本,除由政府所承认的教本之外,还由政府所选任的"历史家"特著种种补充的读物,最重要的是叙述希特勒的发难和他的"主义",目的在造成"以爱国心、种族的意识和领袖制为基础的更伟大的德意志"。试举其中有一册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三三年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就说"在德国最困苦的时候,在德国正临着深渊的时候,上帝又在希特勒的身上,给德国人民一个伟大的领袖"。这和我国的无知乡民相信"真命天子"的观念有什么分别?不过一方面是在中国乡民中之无知者,一方面是出于素以科学发达闻于世的德国的"历史家"罢了。(注:以上引证语见"每日先驱报",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

现在这种领袖制,德国不但在政治上采用它,并极力输入全国其他的各种组织里面去。例如德政府在一月间新颁的"劳动法"(Labor Law),便把雇主认为"领袖",把他的工人认为"服从者"。这些"服从者"依法虽也有组织所谓"信任委员会"(Confidential Council),但这个委员会的候选人却须由"领袖"——即雇主——会同国社党的"工厂细胞组织"(Factory Cell Organization,即国社党所包办的工会组织)的书记,共同圈定之后,再由职工选举,组成所谓"信任委员会",代表全体职工和"领袖"——雇主——"合作"。由雇主圈定的"信任委员",当然是可以"信任"的了,不过此处的"领袖"却不是"上帝"所"给"的,乃是有资本做雇主的人们!他们的靠山是"上帝"所"给"的那个政治上的大领袖!

我以为这种政治上的领袖是否"上帝"所"给"的,倒不值怎样的注意,我们所要注意的是他能否解决全国大多数人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德国的情形和中国的不同,但大题目

也只有两个：一个是对外问题，尤其是取消“凡尔赛条约”问题；一个是对内问题，尤其是救济失业问题。我觉得“上帝”所“给”德国人民的“政治领袖”所干出的“领袖政治”，对这两个问题，似乎只有“口惠”，实际都没有办法。这层此刻暂且慢谈，后面当有专篇作事实上的分析。

我此时要提出可以注意的几点如下：

（一）上面所述的那种方式的政治领袖，也决不是像天上凭空掉下来的一件东西。例如德国的希特勒，去年一月间所以得一跃而上政治舞台，实当时实际环境所凑成。德国自社会民主党秉政以来，不主张彻底改革，只在现社会组织下努力，始终为资产阶级利用，后来资产阶级鉴于劳动阶级的声势日大，深觉社会民主党之不足再供利用，乃索性揭开假面具，利用国社党，作明目张胆的压迫，以作最后的挣扎。

（二）这种所谓政治领袖，在未上台以前，要夺取政权，也要用欺骗方法，取得一部分民众的拥护；这种欺骗，所以能有相当的效力，是因为他从有未在政治舞台上有过恶印象留在民间的缘故。倘若早已久执政权，统治得一团糟，信用扫地，要想再用欺骗方法，利用“领袖政治”的新招牌，那更是一件难事了。

（三）在外国所见的这种所谓领袖政治，虽未见他们对国事有何根本的办法，但他们个人方面，还能稍稍顾点面子，不得不做出一点勤廉的样子，像希特勒最近听说连薪水都不要，全部捐作党费，这于社会根本问题的解决当然没有什么关系，并不值得怎样的赞扬，但比之东一个别墅，西一所洋房，穷奢极欲的政治上的所谓“要人”，给人的印象究竟有些不同。

最后关于“领袖”这个东西，还有一点感想要附带地说

一说：我在柏林的时候，屡次听见有中国友人看见德国有一班人大捧他们的领袖希特勒，便慨乎言之地说中国人就缺乏这种“美德”(?)，说中国人就不肯拥护领袖，并肯定地断言中国之没有救药，病根就在这里。关于这一点，我却有些不同的感想，我觉得中国人最重视领袖——不过我们所重视的领袖是真能在行动上事实上表现他能为大众牺牲努力的领袖，倘只叫中国人对着挂空招牌的领袖举手行礼高呼“×××万岁！”这玩意儿是弄不来的。关于这一点，事实上的佐证多得很，随手拈来都是。试举一二较近的事实说，在举国民众热烈抗日高潮的时候，马占山将军在嫩江率军血战抗日，全国人民对于他的崇拜的种种表现，实难形容；杜重远先生当时到四川重庆一带去演讲救国运动，甚至看见有人把他的相片排列在祖宗牌位一起，有人希望他有机会做中国的大总统！上海十九路军血战抗日，全国民众对于他们的领袖及士兵们的崇拜，其种种表现，也是出于衷心而为我们所共见的。我当然不是说这些人就可以做中国政治上的领袖，我是要证明中国人所要重视的领袖是在行动上事实上有办法为大众努力的领袖，不是挂着空招牌摆着空架子的领袖。如有人自以为是中国的领袖而怪中国人民不知或不肯拥护他，我要请他问一问自己有了什么，做了什么，足以引起中国人民的信仰和敬重！

一九三四，六，二，伦敦。

工资、工作时间和生产力

记者在上次通讯里，曾经略谈关于莫斯科一个机械工厂的情形。这是我到苏联后第一次看到的工厂，以后还看过好几个工厂，当顺序就观感所及，陆续记出来。但工厂规模虽有大小，工业部门虽有不同，而在管理上、待遇上可算是大同小异，所以我在记述一个工厂之后，就想先把几个关于工业及工人生活的要点提出来谈谈，俾读者诸友对于这方面更易获得明晰的概念。在本文所要谈的是工资、工作时间和生产力。

就理论上说，在一个已达到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没有市场，也没有金钱，因此在分配上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工资也不会存在；每个工人只须从分配的中心领受他所需要的产品。但是在现在的苏联，这种布置还是不可能，因为尚在

过渡的时期，市场还存在，工人们还须用金钱作购买的工具，才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所以在目前还有以金钱计算的工资之存在。但这不过是工人们藉以得到一部分产品以满足生活需要的“一个形式”——只是一个，此外还有其他的形式，例如除了金钱的工资之外，还可受到所谓“社会化的工资”的种种利益，其内容当在下一次通讯里再谈，这里只先谈金钱的工资。

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有工资的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期间的国家里也有工资的存在，这两方面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苏维埃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两方面确有根本的不同。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之下，所谓“工资劳动者”是本身没有生产工具而不得不把劳动力出卖给占有生产工具的人们；在苏联，国家是全体工人的组织，生产工具是为全体工人所公有，所以工人所受的工资所含的意义也有根本上的差异。可是在形式上这两方面还有个易于混淆的疑点：那便是在别的国家里，工人所得的工资并非包括他的劳动的全部，而在苏联工人所得的工资也仅能包括他的劳动的一部分。但在性质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在苏联，工人劳动的“未付的”部分并不归入别一阶级的手中，成为私人的“利润”，却是由工人的国家用来发展有益勤劳大众的种种建设，终究的利益还是属于全体工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的性质既如上述，其次我们要研究的是工资何以还有多寡的差异？尤其是当我们想到在社会主义制度里面应有平等的待遇才对。这个回答是只有在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代，工资的差异才能消减；在社会主义正在建设的过渡期间，工资的差异还是要存在的。这理由是人材还不够用，各人能力的差异还很大；工

程师等的专门人材固不必说，即工人中也还有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差异。一方面要对于已有的工作人材在待遇上加以勉励，一方面要对于未成的工作人材督促上进；不得不在此过渡期间，根据技能、训练和职务上所负责任的差异，采用差异的工资制度。苏联原来是个落后的国家，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的缺乏是建设中最困难的问题，在前三四年各厂工人的频频变动，妨碍建设的进行很厉害，所以苏联为加速推进建设工作起见，更有毅然采用这个方法的必要。（工资较多的人，是否要渐渐养成如西欧各国中所谓“中等阶级”，这和要建设“无阶级的社会”的目的很有关系，倒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但经研究的结果是不会有，说来话长，只得另篇再谈了。）

上面所说的是关于工资的性质和差异，其次要谈到决定工资的要素也有根本上的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决定工资的要素是：用最小限度的工资使工人的劳动力能不断地从事工作，因此使“剩余价值”能不断地创造出来。而且如果劳动的供给有得多余，即失业的工人多，不怕没得补充，那末资本家连这“最小限度”都无意维持，因为他的唯一目的只在榨取“利润”。在苏联是由工人阶级统制工业，是为全体勤劳大众谋福利的，所以时在努力图谋工资的增加，使工人的生活和文化的水准逐渐提高；这种提高的工作是由代表工人阶级的机关——包括政府中的专部和工会——根据工人需要和全国经济做标准而努力进行的。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间，“名义工资”比一九一三年高百分之一百九十，“实质工资”高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三〇年平均工资较前一年增百分之十二点零六，一九三一年又较前一年增百分之二十三点零五（这还只是直接的金钱工资，“社会化的

工资”还未计算在内;倘也计算在内,一九二九年的实质工资比大战前增百分之六十九,一九三一年的比大战前约增两倍。以上统计均见约瑟夫·弗利门著“苏联工人”,第一八八页)。

决定工资的要素,也须包括全国经济的考虑,这是因为工资所以有增加的可能,也要靠生产力的增加。倘若工资增加而生产力却仍旧,那末全国经济便要陷入危境;而全国经济的发展却是工人的福利所依靠(这当然是指努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因此苏联的经济,从开始就十分注意生产力的增加。要使生产力增加,最重要的当然是要大规模地运用最进步的技术和机械,这也是五年计划中很注重的一点;而尤其重要的是工人们知道剥削制度已不存在,由工会、工厂委员会和生产会议的组织,自动地作空前兴奋的参加和努力;于是“社会主义的竞赛”哪,“突击队”哪,工人的发明哪,都成了增加生产力的要素。

生产力增加,不但“名义工资”和“实质工资”随之俱增,而且工作时间也随之逐渐减少,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中最短的工作时间了。在大战前,他们的每日工作时间为十一小时至十二小时;在有些工业里甚至高自十六小时至十八小时。苏维埃政府得到政权之后,即实行八小时制(地下矿工为六小时),后来改为七小时。

简单地说一句:工资随生产力的增加而增加,工作时间却随生产力的增加而减少。

一九三五,二,三,晚,伦敦。

谒列宁墓

八月九日下午参观了布尔穴俘公社之后，由莫斯科的郊外回到城内，顺便弯到红场，去看列宁的墓，因为这墓在下午五时后才开放给大众看。每次在这样开放的时候，往往有两三千人在墓前的红场上排成蜿蜒曲折的双人队，顺序等候着走入墓门去瞻仰这位革命领袖。我们这天共乘着三辆特备的公共汽车，到红场时，已见有几千人排着双人队在那里等候着。他们向例对外国来宾特别优待，可不必在这长队中等候，先行进去。所以我们这三大辆汽车装到的八九十个"外国来宾"占着便宜，下车后另外排成一个双人队，先行进去。

列宁墓背着克里姆林(Kremlin)的高墙，前面便是叫做"红场"的大广场——遇有阅兵或是其他游行大会，都在这

里举行。墓的全部是用深红色的大理石建造的，虽不甚高大，而气象却非常严肃。门口有红军的兵士两个持枪守卫。矮矮的门上刻着俄文“列宁的墓”字样。进门之后，有石阶引着向下走——向地窖走。向下走时，转过两三个弯，在每一个转弯处也都有红军的兵士持枪守卫着。我们这两人一排的队伍很静肃地向下走，最后走到一个地窖，靠墙的周围是略凸的两人一排可以通行的行人道，中央便是列宁的玻璃棺所在处。这玻璃棺是三角形（寻常的棺材是长的四方形，棺材头是四方形，列宁的玻璃棺是长的三角形，棺材头是个三角形），全部是玻璃造的，里面有电灯很亮地照耀着，腰以下有绒毯罩着，腰以上全部现出；身上穿的有人说是工人的衣服，看上去是古铜色的哔叽制的，形式和在中国所谓中山装”的一样。两臂都放在外边，一只手放在腰际。枕头是红绸制的，头上没有戴帽，可看见红黄色的头发，中央已秃。宛然如生，完全像闭着眼在睡觉。棺的两头各有一个红军的兵士持枪立正着，气象很严肃。我们想到列宁虽死，他的后继者仍能本他的主义和策略，努力向前干，天天在那里建设，时刻在那里发扬光大，他虽死而未死，中国成语所谓“虽死犹生”，他很近似，所以就算他不过是闭着眼在睡觉，也未尝不可。

我们两人一排的长队，很静肃地在这玻璃棺的四围走过，大家的眼睛当然都齐集在这玻璃棺里的“闭着眼在睡觉”的那位人物。出来的时候，还看见红场上成群结队的数千人在那里等候着。

在归途中，萦回于我的脑际的，还是财才看到的在那玻璃棺里的“闭着眼在睡觉”的那位人物。在苏联的建设得着了成功的今日，我们也许很容易想到他的成功，但我在此时

却想到他在失败时期对于艰苦困难的战斗和克服，却想到他的百折不回屡败不屈的精神。

他的三十年的政治活动可当作一部战斗史读。

读过俄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在革命斗争中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对立；前者是由列宁领导的。他对于孟什维克始终不肯马虎迁就（因为他看准了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正确，孟什维克路线的错误），在当时却有不少人希望这两派能合作，怪列宁固执，责他毁坏了党，甚至于说："假使他在什么地方失踪，死去，那是党的多么的幸运！"孟什维克的健将丹因（Dan）也说过这样的愤语，列宁的一位最忠实而勇敢的老友克立成诺夫斯基（Krzhizhanovky）曾对丹因问道："一个人怎能毁坏全党，而且他们抵抗这一个人就那样地无用，以致诅咒他快死？"丹因回答得很妙，他说："因为没有别一个人像他那样每天二十四小时都为着革命忙，除想着革命没有别的念头，甚至在梦中所见的也只是革命。你想像这样的一个人，你能奈他何呢！"

说列宁能继续不断地奋斗，这固是事实；但我们如不再作进一步的研究，这种说法仍近于肤浅。尤其重要的是他的革命的行动——百折不回的斗争——是根据于他对于主义的彻底的了解和信仰；他拿住了这个舵，无论遇着什么惊风骇浪，别人也许要吓得惊惶失措，在他却只望清彼岸，更加努力向前迈进。他在无论如何困难、艰苦和失败的时候，他的信仰从来没有丝毫动摇过——我认为这是他所以不受失败沮丧的最大原因。

当一九〇六年全党代表在斯德哥尔摩开会的时候，孟什维克占多数，列宁所领导的一派失败，他的信徒有些不免垂头丧气的，列宁咬紧牙根，对他们说道：不要埋怨，同志

们;我们断然要获得胜利的,因为我们是对的。”他在失败中认为“断然要获得胜利”,这不是空中楼阁,是有“对的”根据。有正确的主义做根据的策略,才是“对的”策略。

但是“对的”政策却也不能自动——不能由袖手旁观而坐待其成的——必须有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努力,才有达到目的的希望;列宁在被刺的前一刹那,在米契尔生工厂(Michelson)里工人会议中演讲,最后一句话是“非战胜即死亡”,这不是一句空话,他的一生便是这句话的表现。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列宁一生的政治活动,始终不是立于“个人的领袖”地位,却总是代表着比任何个人都更伟大的一个以勤劳大众为中坚 的大“运动”;这运动在他未产生以前就存在,在他死后还继续着下去的。

一九三五,二,十一,夜,伦敦。

言论自由的问题

记者在上期通讯里谈过苏联最大规范的日报——"真理报"——的最新设备。谈到新闻业,我们很自然地要连想到言论自由的问题;换句话说,在目前的苏联是否有言论的自由?

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个立场:从勤劳大众——以工人和农民为联合的中坚——看去,可以说有;从剥削阶级的余孽及其种种寄生虫——例如牧师、教士,帝俄时代做过秘密侦探及压迫革命的警察、官僚,以及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等——看去,可以说没有。在苏联的当局以及从事新闻事业者,坦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代,还不能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完全的言论自由,须等到没有阶级的社会实现之后才能办到。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和资本帝国主义所侵略的殖

民地，只有少数人享到自由言论的权利，因为强有力的言论机关都在这少数人的掌握中，或至少是在这少数人威迫之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却有多数人享到自由言论的权利，因为强有力的言论机关都在这多数人为中坚的政权统辖之下。这两方面不同之点便是一方面是少数，一方面是多数。虽这两方面都不能说是“完全”，但“多数”已比“少数”进一步，却是无疑的事实。

当一九二七年美国的工人代表团到苏联观察的时候，和斯大林有过一番谈话，很直率地提出许多问题问难（详见约瑟夫·斯大林：“与外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三四年版）。在这些问题里面，有一个代表问到：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意见，如有和党的意见不同的地方，怎样可以得到合法的表现？有另一个代表来接着说：这种意见可在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如工会之类的机关里表现出来。斯大林认为是对的。他认为在工人和农民里面确有不同意见的存在，这种不同的意见，可在各种会议、各种工会、合作社、苏维埃选举等等里面作合法的表现。不过他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意见的冲突，和十月革命以前的意见的冲突，有个根本的异点：在以前，工人和农民间意见的冲突是关于推翻地主、俄皇暴政、小布尔乔亚，以及打破全部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问题；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意见的冲突却不是集中于推翻苏维埃政府，打破苏维埃制度的种种问题，却是集中于如何改善苏维埃政府的机关和工作的种种问题。

我引这一段话，尤其是最后几句，因为就我在苏联的实际观察，觉得这确是他们言论自由的范围。在苏联特重所谓“自我批评”，对于政府各机关和各种实业机关的具体事实和利弊，都得尽量批评；不但在社会的日报上，即各工厂、各

学校及种种机关由职工自己编的壁报,对于本机关的负责人和一切事务都尽量地批评,毫不忌讳。乌克兰有个农民曾经这样说过:"倘若我们本地的苏维埃主席是个酗酒之徒,或是一个侵吞公款者,我们要告发,要改换,那比在俄皇时代对付官僚容易得多了;但是如果要说集体农庄的政策不对,应该要让我们农民各有个人的农场的权利,要发表这样的思想却没有多大的机会。"换句话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要想根本推翻这种组织和其根本政策的言论,当然无自由之可言;不过在这根本组织和政策的大目标之下,对于具体的办法和流弊加以批评,力谋改善,却很可自由。其实苏联现在的根本组织和根本政策,既以勤劳大众的利益为中心,他们——大众——所研究讨论及批评矫正的,却也只在这大目标下的具体办法方面努力求进步,并无意于推翻根本组织和根本政策。例如我们和苏联工厂里的工人作私人的谈话,他们所津津乐道和商榷的是如何如何更改善工作的环境和待遇;如何如何更增加工作的效率和生产的进步;从未听见他们疑到五年计划的不该实行,或是以工人阶级为过渡政权的中心是错误的。他们所需要的言论自由,似乎也正在彼而不在此。

在苏联的各日报上还有一个特色,便是积极提倡和鼓励"工农通讯员";这些所谓"工农通讯员",是来自全国各工厂里的工人、各农场里的农民和红军里的兵士,把他们所见闻的关于各本地的建设的情形及或有的弊端,尽量写成通讯,寄登日报上。据说现在这样的"工农通讯员"已在两百万人以上,这是多么广大的一个民众发表意见的机关!

关于言论自由,就各国的现实情形说,大概不外三种现象:一种是在法西斯的国家,其作用是替日暮途穷的资本主

义制度挣扎，实际只替少数特权的阶层说话，在大多数人方面看来固然是绝对没有言论自由，即替少数特权阶层作传声筒的人们也说不上有什么言论自由。一种是在号称民治主义的国家，尤著的是英法两国，这些是多党政治，大规模的言论机关当然也在少数特权阶层中人的掌握，但在某些范围内还许一小部分替大多数人发表的言论有出版的可能，在表面上，似乎稍为宽容，但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并不是性质上的不同。还有一种便是政权已在勤劳大众自己的手中，言论自由为大多数人所享有，只有少数人不能享得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且所谓言论自由，也有它的相当的范围，不是无限制的，关于这一点，记者在上面已有过大略的说明了。

一九三五，三，二十三，夜，伦敦。

从伦敦到纽约

记者于今年五月十一日由伦敦乘德船欧罗巴号赴美，五月十六日到纽约。德国船很清洁，仆欧都是用德人，服务都很周到，都很有礼貌。在欧遇着惯于旅行的朋友，都说清洁和有礼貌，以德船为最，依我此次所经历，觉得不错。同船的中国人，只记者一个。船上有三个日本乘客，总是三个人在一起，从未看见他们和其他乘客谈过话，或参加任何社会性的聚会或游戏。除在餐厅里看见他们外，不很看见他们的影踪。我本想不妨和他们谈谈，但他们每次遇到我的时候，总是用斜眼睨视，那一副面孔表现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气；在餐厅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占着一桌，仍是用斜眼远远地向我睨视，同时鬼鬼祟祟地说长论短，那一种情形，断绝了我要和他们谈谈的念头。

和我在餐厅里同桌的有三个人:一个是久住英国的美国人,他是个机械工程师,年已在五十以上了;一个是由纽约往欧洲接洽营业完毕回去的美国人,他也是个机械工程师,却是个近三十岁的青年;还有一个是久在纽约经商,由希腊回纽约的希腊人。那位老工程师鉴于所亲见的英美两国失业问题不但无法解决,而且日益尖锐化,认为旧社会制度已确然破产,无可挽回,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能解决,但他的觉悟就至此而止,问他怎样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他却含糊不能自圆其说地坚执和平的办法——也就是维持现状,所以他尽管满嘴大提倡其“旧制度破产论”,而他的主张在实际上却是在积极维持这个“破产”的“旧制度”,这种显然的矛盾,在他并不感觉到,或虽感觉到而亦不愿或不能作再进一步的分析。那位青年工程师的认识却比较地进一步,以为非根本把障碍物除掉,要实行社会主义是梦想。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影响于全世界的局势非常重大,所以他对于中国前途的热望,也异常地殷切。同是工程师,而在认识上有这样的差异,仔细一想,却也不无他们的颇堪玩索的经济背景。原来那位老工程师多少是一位功成身退的工程师,这所谓“功成”当然是从他个人着想;他已有了相当的盈余,在英美两国都有他所开的工程公司,他自己已不必多管事,只须随意看看,过他的舒适的晚景;那位青年工程师却是个初出茅庐的脚色,在经济上对旧制度无所依恋。诚然,也有人不因地位的关系而仍能加入革命战线的,但这究是例外,就一般说,经济的背景决定个人的意识和认识的力量是很大的。那位经商的希腊人,还够不上做资本家,多少还只是小商人的地位,他只是唯唯诺诺,不加可否,意思是只守中立的态度;其实中立的态度就等于参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挣扎,

在形式上尽管好像中立,实际上还是等于“助桀为恶”。时代的巨轮一天一天更猛烈地向前推进着,只有革命和反革命的两条战线,没有什么中立的余地了。我们在船上共餐了五六天,谈话的机会自然很多,在认识上和信仰上的分野,无意中流露的,已显然有截然的界限。除公然倡言维持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特权阶级的“死硬派”外,上面所谈到的三个人的态度,很可代表现社会中的三种人的态度。

在船上看书的时间居多,有一次在吸烟室里看书,无意听到隔桌有两对夫妇在谈话;一对的口音像美国人,一对的口音像移居美国而仍未脱去原来口音的德国人。前者年龄约在四十以上,后者约为三十许人,听他们的谈话内容,知道那纯粹美国人是久在印度干什么职业而因例假回国旅行的;那美籍德人是已获得一种印度位置,不久要往印度去的,很恳切地探问关于印度的生活情形。最可注意的是那位“老印度”告诉他的一段话,他说欧人(他说 European,其实他的含意就是指白种人)在印度的生活不得不阔绰,因为必须这样才能维持欧人的尊严;他有一妻一子,须用园丁、阍人、厨子、女仆等等,并告诉每月须支付各个的工资若干。这“老印度”侃侃而谈,说明维持欧人在殖民地的尊严的必要,那位未到过印度的后进凝神屏息静听他的经验之谈;一面言之谆谆,一面也听得津津有味。他们未曾梦想到用阔绰生活来维持尊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利用剥削所得以实行阔绰生活,正是自掘坟墓的行为,正是引起鄙贱的行为,还有什么“尊严”可以“维持”呢!但这位“老印度”的“人生观”却很可以代表所谓“优越民族”对待“劣等民族”的心理。

当然,反过来看,我们的意思也并不是说穷苦生活的本身有什么可以尊尚的价值,而且在人剥削人的制度未消除

以前，徒然提倡“安贫”，正是替剥削阶层放烟幕弹！我们看到欧美各国的一般人的生活，拿回来和中国人的生活比较比较，没有不感觉到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简直不是人的生活。我们倘不努力使一般人的落伍的、非人的生活改善而为健全的、合理的、人的生活，这是我们的莫大的耻辱，这种耻辱决不是把古人的死尸抬出来，提倡什么“安贫”的“道德”所能掩饰的。我们要铲除剥削多数人而造成少数人享用的不平等制度，树立共劳共享的平等制度；目的还是在积极方面，不是在消极方面。

五六天的大西洋的海程很快的过去，五月十六日下午三点钟便驶进了纽约的哈得孙河(Hudson)，渐渐地靠近纽约的码头。据由美国到欧的中国朋友谈起，在西雅图或旧金山上岸的黄种人，上岸前由移民局人员问话的时候，向例黄白分成两队，不许混杂，白队享着先问的权利，黄队却须等在后面。我后来到美国旧金山的时候，遇着一位到美刚两个多月的中国留学生某君，据说他到美在旧金山上岸时，日本人得夹在白队里同享先问的权利，中国人还是另列一队在后面“恭候”着。从欧洲赴美的中国人不多，就是要另列一队也列不成功，所以记者这次到纽约上岸前，还得随便夹在乘客中经移民局人员问话，又因为伦敦美领署的公文已到，所以略谈几句便算了事，未曾受到什么留难。

驶进纽约，最初印入眼帘的是自由神像和四五十幢好像成群结队似的矗立着的摩天高楼。这个自由神像是在纽约海港离曼哈吞岛约一哩余的柏得罗小岛(Bedloes Island)上面，由底到顶，高一百五十五尺，高撑火炬的右臂达四十二尺，头上可立四十人，火炬上可立十二人。这神像是法国赠与美国的。自由诚然是人类所渴求的宝物，但在这金圆帝

国的自由属谁,到如今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遥望着这个高撑火炬的自由神像,所获得的感想,似乎要替这"自由神"觉得惭愧了。

许多摩天高楼确是很奇突的现象。从欧洲来,尤其是从守旧著名、屋宇陈旧的伦敦来,使人感到伦敦无所不小,纽约无所不大的印象(这当然是比较的,伦敦的房屋当然有它们的古香古色,也不很小)。在百老汇路的武尔华斯大楼(Woolworth),六十层,高七百九十二尺,以前已算是世界上第一高的高楼了;而现在最高的却要推第五路第三十四街的帝国大厦(Empire State),一百零二层,高达一千二百五十尺。高达一千尺以上的还有勒辛吞路第四十二街的克赖斯勒大楼(Chrysler,七十七层)。此外有八九百尺高的,有七八百尺高的,有五六百尺高的。这却是纽约特有的现象。这不仅是由欧洲到美游历的人所注意的现象,即美国各处的人民到本国东方游历的也要看看纽约的摩天高楼。在美国繁盛的时代,像最高的帝国大厦,每日游览者平均达四五千人(这高楼第八十六层和第一百零二层都有瞭望的设备,四面有石栏,全城一望无余,其余为各种店铺),租户达两万户。但自一九二九年经济恐慌之后,大半空着,没有人租,游客也寥寥无几。可是这种大规模的房屋,维持费很大(像帝国大厦仅游客乘的电梯有六十四架,运货物的电梯还不在内),便陷入很困难的地位。这种摩天高楼的可能,是由于钢骨建筑和电梯造法之精进,依记者所见到的内部建造情形,都是用很精美的人工大理石造成地板和墙壁,乘着一千尺高度上下的电梯只须三分钟的时间,而且非常安定平静,毫不使人感到不舒服。科学技术的进步,实可惊羡。莫大的缺憾是这些摩天高楼都在华尔街的少数金融资本家的掌握,

用剥削所得的大量资本(像帝国大厦一所高楼的价值就达三千万金圆之钜),建造这类高楼,目的仍在获得更多的利润,所以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没落的时期,摩天高楼也随着萧条下去了。我们若仅从外表看去,摩天高楼仍然巍峨宏丽,好像金圆帝国仍在那里顾盼自豪,但稍稍研究其实际,便知道是外强中干,时在飘摇中过日子。其实在猛烈转变过程中的全世界,在资本主义制度仍在挣扎图存中的各国,都有这同样的象征,不过在资本主义发展得尤其蓬勃,大量生产哪,高大建筑哪,无所不大,倒起楣来,也就愈益显露罢了。

我们寻常所称的纽约,在美国有纽约州(New York State)和纽约城(New York City)之分,他们在文字上尤须写清楚,虽则在口头上他们通常提起纽约这个名字,都是指纽约城而言。就是这纽约城,最热闹的中心还只是一个小岛,名叫曼哈吞岛(Manhatten Island),摩天高楼以及重要的金融业和商业等区域都在这个岛上。纽约(指纽约城,下同)包括五个郡:第一是最重要的曼哈吞岛,这个岛好像一把中国老式菜刀的形式,向西的刀背方面由一条哈得孙河和新泽西州(New Jersey)隔离,向东的刀锋方面由一条东河(East River)和长岛(Long Island)隔离,向北的刀柄由一条哈伦姆河(Harlem River,这是接连哈得孙河和东河的一条小运河)和大陆隔离,向南的刀头便是由大西洋进口处。第二是在曼哈吞之南隔着水的司推吞岛(Staten Island)上的立屈孟郡(Richmond)。第三和第四是在曼哈吞之东隔着水的长岛上的卜鲁克林郡(Brooklyn)和奎因斯郡(Queeens)。第五是曼哈吞之北隔着水的在大陆上的卜浪格斯郡(Bronx)。纽约包括这五郡,但是在一般美国人心目中所说的纽约,实际却只是曼哈吞,这大概是因为最热闹的部分都集中于曼哈吞。且

说这几乎取纽约而代之的曼哈吞,它的面积,南北的长只有十三哩,东西的阔只有两哩。这小小区域,却是握着全美国经济权,统制着全美国经济生活的金融资本家的大本营——华尔街的所在地。关于华尔街的内幕情形,说来话长,当另文记述,现在仅想先谈谈关于纽约在表面上看得见的一些状况。

纽约的繁华是有名的,而最繁华的街道要推百老汇路。有人说只有两件东西造成百老汇路,一是戏院,二是霓虹光。尤其是在第四十二街以上到第五十几街,在那广阔的马路和广阔的人行道旁,无数摩天高楼上装满了形形色色的霓虹光,在夜里辉煌如昼。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着无数的男女。听说这段街上所用的霓虹光达七八万尺,每小时用电达二百三十余万瓦特。有许多"自助菜馆"(他们称 Cafeteria,也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特别情形,将来再详谈),在外面所装设的霓虹光装饰,所费比里面的装饰和设备还要多。有的在外面的霓虹光的招牌及其他装饰所用的墙上面积,其租费比全层的租费高两三倍。据说在这段街上的屋外的招牌装饰所用面积的租费,每年装入地主腰包的近四十万金圆之钜。在这样电光辉煌的夜里,你也可常常看到男女追逐勾引的怪现象。不过在柏林、伦敦等处的热闹街市上,在夜里常可看到无数对人做媚眼叫"达灵"(darling)的女子,在美国却很少看见,这也许是因为受经济恐慌的时期较短。但虽没有那样公开,据"老纽约"的朋友所谈,私娼人数的逐年增加,却有加速率的进步,听说在百老汇路最热闹的一段的旁路里就有五十多处"秘窟"。在欧洲都会有"街女",对东方人也常叫其"达灵",在美国却不常见,大概就是"街女",在公开的表面上还要保持着"优越民族"的"尊严"吧。

在戏院方面，歌舞戏院、影戏院是普通都知道的，也许有人还听到纽约的“大腿戏”，这在他们称为“Burlesques”，沿着百老汇路或附近有几处。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里性的诱惑之尽量的被人作为剥削的一种工具。在这里你可以看见成群的年青女子几乎是完全裸体，在台上作各种舞蹈，还有单独的女子最初穿着舞衣在台上依音乐步行，逐渐把衣服脱去，脱得几乎一丝不挂。这些女子为着生计，每天自午时到深夜要很吃力地舞蹈歌唱无数次。你可看出她们的憔悴的容态，强笑的哀音，涌流的热汗，使你感觉到她们是在悲惨的情况中受人利用为谋利的工具——在经营这种戏院的老板们当然要认为千该万该的！这样的歌女所得并不足以维持生计，所以常须零星把自己的身体“出卖”，以资贴补，有不少资本家是以玩玩歌女为一种不可少的娱乐的。在不合理的社会中，女子被人当作商品出卖，这是一般人所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现实。在惊慕纽约繁华世界的人们，也许还认为这是纽约的一个特色，我看后所得的印象，是好像处身屠场，和我以后在芝加哥所看见的杀猪宰羊的屠场，竟不觉得有什么两样。

但是在另一方面看，纽约却是美国革命运动进行最猛烈的区域，在南方的反动区域的反动分子，倘若听见你是从纽约来的，往往对你要另存戒心！所以关于纽约，还有些情形可以谈谈。

再经华盛顿回到纽约

我在美国南方视察的情形，在前几次的“忆语”里已说得差不多了。我由塞尔马回到北明翰，于六月底经华盛顿回到纽约。离开北明翰时，最难舍的当然是几位美国男女朋友的深挚的友谊。我临走时向他们问通信处，才知道他们不但开会的地方常常更动，住的地方常常更动，就是通信的地方也是要常常更动的。他们在工作上的技术的细密，于此可见一斑。最后 M 女士终于给我一个通信地址，这地址就是邮政局，他们叫做 General Delivery，由她在邮局留下一个姓名，邮局把她所留下的姓名依字母编列备查，以后便可由她自己到邮局取信，不必由邮差送给她，这样一来，她的地址便不会给任何人知道了。可是如果有人知道了她在邮局所留下的姓名，却尽可以到邮局去冒领她的信，因为邮局只照

来者所说的姓名付信，并不认人的。所以就是她在邮局所留下来的姓名（当然已不是她的真姓名），也是严守秘密，不轻易告人的。我存着这个通信处，到纽约后屡想写一封信去谢谢他们，但是有许多美国朋友知道南方情形的，都劝我如果没有特殊事件时还是不写的好，因为非常反动的南方，对于纽约来信是检查得很严的。

我临走时，他们都紧握着我的手，许久许久不放，再三叮咛，郑重而别。十几天相聚的友谊，竟使我感觉到是几十年患难交似的。为着环境的关系，他们当然都不能到车站来送别，所以我是一个人到火车站去的。我起先并不知道由北明翰往华盛顿的火车有两种，一种是装有冷气管的（他们叫做 air - conditioned），一种没有。有的要加多几块钱车费。我只注意到华盛顿的时间，糊里糊涂地买了一张“冷气火车”的车票（买的时候并不知道），无意中尝尝美国较近才有的“冷气火车”的滋味。上车的时候，是在夜里，气候还不怎样热，但是进了火车，就觉得格外的凉爽。我“阿木林”似的，最初很觉得诧异，何以气候变得那样快，后来仰头看到车里壁上的广告，才恍然知道这是美国新近的“冷气火车”，才知道是此生第一次坐在有冷气管的火车里，不禁惊叹物质文明的日新月异。同是“冷气火车”，仍然是黑白分明，即白人乘的那几节车，黑人不敢进来，黑人是另有一节车的。我是非黑非白的黄种人，但依例却坐在白人的车里，这是在以前就说过的。我屡次看见黑人上车后跑错了，直闯到白人的车里来，但是当他们的头一钻进之后，知道错误，立即飞快地回头；有的不提防地向里走了几步才觉察，觉察后就三步作两步地向外奔，好像犯了什么罪恶似的。那种踉跄的滑稽态，初看起来令人觉得好笑，但是仔细思量之后，却是很可悲悯

的。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在精神上是有着很大的刺激,黑人里面略有觉悟的人没有不对你表示痛心疾首的。黑人所以遭到这样的惨遇,无非因为他们是被压迫的民族。我看着这样的情形,想到自己祖国当前所处的境遇,真是百感丛集,在火车里一夜都没有睡着。我买不起卧车票,原来是预备坐着打瞌睡的,这样引起了万端的心事,想来想去,连瞌睡都打不成了。挨到天亮,等一会儿,由窗口望见炎日当空,烈光四射,可是因为车内有着冷气,还是凉飕飕的,没有想到外面的气候已热到什么程度。但是因为一夜没有睡,心绪又不好也没有想到坐在这冷气里有着怎样的受用。

下午到了华盛顿,一踏出了车门,才感觉到外面气候的奇热,和车内比起来好像是两个世界。我的疲倦的身体,好像在炎夏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什么东西,一冷一热,在刹那间趋于极端,倏然间觉得头昏目眩,胸际难过得厉害。勉强提着一个小提箱,孤零零、懒洋洋地走出车站,简直好像就要立刻昏倒似的。我心里想这样死去,未免死得太冤吧,赶紧转一个念头,勉强跑到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去,一踏进房里,就不顾一切地躺在床上,好像昏去似的躺了两三小时,才渐渐地恢复转来。

在华盛顿因为要调查侨胞的生活,又耽搁了两天。在华盛顿的华侨约有六七百人,也有所谓唐人街。其实不过在一条街上有着十几家中国人开的店铺。在唐人街的一般现象是洗衣作坊、菜饭、中国式的药材铺和中国式的杂货店。华盛顿也不能例外。这里有一家较大的杂货店,店面有着似乎中国庙宇式的建筑,漆得红红绿绿的。据陪我同去视察的朋友说,这家铺子的老板是华盛顿唐人街的一个重要领袖,娶

了一位美国妻子。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已近午时，他才从床上起来。我和他谈谈当地侨胞的状况。提到赌的情形，他说最近赌这件事可说是没有的了。一踏出了他的门口，陪我同去的那位朋友就不禁失笑，因为他是很熟悉当地情形的，并且很知道那位“重要领袖”的生活；据他所知道，那位“重要领袖”到午时才起来，就是因为他前一夜是赌到深夜才睡觉的！我说大概做“重要领袖”的人不得不顾面子，可是欺骗不过熟悉内部情形的人。

赌在唐人街的流行，当然也有它的原因。美国人要想发财，可以在做“大生意”上转念头，中国人因资本微薄的关系，虽有极少数的三两个人也走上这一条路，但是大多数都不过是做小生意的，从小生意里发大财是很难的，于是往往视赌博为发财的唯一捷径。而且他们缺乏相当的娱乐，赌博也是一条出路。所以有许多都在这里面寻觅他们的桃源。但是在那里的赌博却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是有着“堂”的“领袖”们包办的。由这里面引起的纠纷，往往发生所谓“堂斗”。“堂斗”发生的时候，美国的当地官署势必出来干涉，于是在“堂”方面便派出所谓“出番”者（据说就等于“外交家”），和美国的当地官署接洽，用运动费来和美国的当地官署狼狈为奸，他便可从运动费中大赚其“康密兄”（Commission，佣钱或回扣）。这种“出番”当然是“肥缺”，所以都是由“堂”的“领袖”担任。因此“堂斗”发生，便是“领袖”们发财的机会。即是“斗”，当然需要打手，这类打手，他们叫做“斧头仔”；追究这名词的所由来，是因为在数十年前，他们用的武器是斧头，后来物质文明进步，有手枪可用了，但是他们在名词上还是同情于复古运动，所以仍用旧名。这类打手最初多为失业的人，由堂的“领袖”时常借钱给他，债务渐

积渐多起来，无法归还，便须听受“领袖”的指挥，遇着有事需要打手的时候，便被使用。打死一人，还可得到酬报一千元或五百元。打死别堂的“领袖”，可得到酬报万元。

据说在华盛顿半年来（就当时说）也有了几个中国妓女，堂的“领袖”们不但包办烟赌，而且也包办妓女，所以堂的“领袖”往往也就是老鸨！美国因受经济恐慌尖锐化的影响，近年来妓女的数量大增，因人数大增，出卖的价格也不得不特别减低。据说在华盛顿的美国妓女（美国没有公娼制度，所以都是私娼），从前一度春风须四五个金圆的，近年已减低到两个金圆了。但是在那里的中国妓女因为不是“自由”的身体，多受一层剥削，仍须四个金圆。不能和美国妓女竞争，生意也不及以前了。

我和华盛顿相别了，但是我和华盛顿相别的时候，不及对于北明翰的那样依恋不舍，虽则华盛顿比北明翰美丽得多。这无他，因为在北明翰所遇着的几位美国男女朋友的深挚的友谊使我舍不得离开他们。我由华盛顿回到纽约的途中，坐在火车里，种种念头又涌现在脑际。最使我想到的当然是这次在美国南方所看到、听到的关于“变相的黑奴”的生活。在美国的劳工大众受着他们资产阶级的榨取和压迫，诚然是很厉害的，关于这方面的种种情形，我以前和诸君也谈过不少了。但是在美国的黑人（最大多数都是属于劳工阶级）所受的榨取和压迫更厉害得千百倍，因为他们在表面上虽称美国为他们的祖国，但是他们的民族实在是整个的处于沦亡的地位，他们在实际上实在无异做了亡国奴。所以他们在法律上、经济上、文化上以及一切的社会生活，都不能和美国的白种人立于平等的地位。在美国南方贯穿十几州的所谓“黑带”；黑色人口只有比白色人口多，但是因为等于

做了亡国奴,人口虽多,还是过着那样惨苦的生活。可见领土和主权不是自己的时候,人数虽多还是无用的。这是我们所要注意的一点。黑人里面有不少觉悟的前进分子,已在积极主张“黑带”应该自立,成立一个独立的黑人国,这件事说来容易,要真能使它实现,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既经没有了的领土和主权,要再得到是很难的。这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又一点。想到这种种,已使我们做中国人的感到汗颜无地了。我回想所看见的黑人的惨苦生活,又不禁连想到在中国的黄包车夫(或称洋车夫)的生活。老实说,人形而牛马其实的黄包车夫生活,比美国南方的“变相的黑奴”的生活,实在没有两样!我们只要想想,在炎日逼迫之下,或是在严冬抖战之中,为着一口苦饭,几个铜子,不得不弯着背脊,不顾命地奔跑着。这样的惨状,人们见惯了,也许熟视无睹,但是偶一回想,就是那些在“黑带”做“变相的黑奴”的苦作情形,也不过这样吧!都是把人当牛马用!我坐在火车里独自一人默念到这里,虽然这躯壳是夹坐在“白”的车厢里,望望那“黑”车里的黑人们,却不免感到说不出的惭愧,因为大多数中国苦同胞的“命运”(做苦工过着非人生活的当然还不限于黄包车夫),并不比他们高明些!

回到纽约了,好像回到了临时的家乡,但是再耽搁一星期又要和它离别了。在离别前,除继续搜集研究材料外,对于那里的华侨情形,也做了比较详细的调查。

关于纽约唐人街的情形,我以前已略为谈过了,现在只想再谈谈关于组织方面的大概。我在上面提及“堂”,在纽约有所谓安良堂与协胜堂。推溯这两“堂”之所由来,听说最初到美国去的华侨格外穷苦,加以美国移民律限制苛刻,各人

当然都无力带妻子同去，成为无家可归的人。穷苦和无知又往往结不解缘，他们在偷闲的时候便聚赌，一言两语不合便在赌场里打架。后来有些人积下了一些钱，由不顾一切的穷光棍而变为有些钱的商人了，于是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计，觉得有镇压一班穷光棍的必要，便联合他们的一派组织安良堂；一班穷光棍也组织协胜堂以为抵抗。所以最初协胜堂颇有反抗压迫的意味。但是后来各堂各占一街（在纽约的唐人街就只有两条街），认为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包庇烟赌和娼妓，同样地由少数人所操纵而腐化起来。华侨的总组织有所谓中华公所。中华公所的董事会在表面上是由各团体（主要的是各会馆）分派代表及所选出的主席、书记和通事所组织，在实际上却是由两个主要的团体轮流主持。一个是宁阳会馆，由最占势力的台山人组织的；一个是联成公所，是由台山以外的数十县的广东人和少数他省人组织起来的。所谓主席、书记、通事等等，都由这两团体轮流分配。所谓“堂”却在后面操纵各团体，由此操纵中华公所的一切。就一般说，堂是任何人可以加入，会馆则有的以几县的区域为范围，有的以族姓为标准，有的在一个会馆里还分派。简单说一句，他们的组织还是道地十足的封建的遗物。堂的“领袖”以前称会长，中国“革命”后，主席盛行，他们也改称“主席”，各堂内还分有小派。

两个“堂”各据一条街，做各个的势力范围。例如有甲堂的人在乙堂的势力范围内开一家店，乙堂便出来干涉，甲堂同时要出来保镳，先来调解，讲条件，条件讲得不合，便是堂斗的导火线，大家派出打手来打个你死我活。这种“地下”的权力是出乎美国警察势力范围之外的。堂斗厉害的时候，唐人街都不得不罢市，美国人也相戒不要到唐人街的范围里

面去。受损失最大的当然是华侨群众；无论谁胜谁负，群众都得不到什么好处，分赃的好处只是归于少数所谓“领袖”。在只求安居乐业的华侨群众是用不着堂斗的，是不需要堂斗的；但是因为组织为少数人所操纵，只得眼巴巴望着他们胡闹。这好像国内的老百姓用不着内战，不需要内战，而军阀们却用内战来为少数人争权夺利一样。大多数的华侨群众都是很勤俭刻苦的老实人，徒然供少数人的榨取剥削罢了。美国的劳工界的组织，如美国劳工联合会及若干分会之类，也在少数官僚化的人们的手里，近数年来美国劳工运动的重要趋势是“群众运动”(rank and file movement)，就是要把组织从少数人手里夺回到群众自己的手里来。其实华侨的组织也有这种的必要。华侨的组织不健全，当然不就是大多数华侨的不兴，犹之乎美国劳工组织的官僚化，不就是大多数美国工人的不兴，这是要分别清楚的。据我所知道，纽约华侨的团体中有个新兴的衣馆联合会，已有四千家衣馆加入(纽约一向有华人开的衣馆六千家)，还在继续进行，便是一个由群众自己组织的团体。可见“群众运动”在他们里面也略有端倪了。

ISBN 7-5405-1815-4



定价（全8册）：76.80元



（第一辑）